國　立　中　央　大　學

歷 史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陳　毅　之　研　究

研 究 生：黃玉芬

指導教授：齊茂吉教授

中　華　民　國　九十六　年　七　月



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
碩博士論文電子檔授權書

(95 年 7 月最新修正版)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全文電子檔(不包含紙本、詳備註 1 說明)，爲本人於國立中央大學，撰寫之碩/博士學位論文。(以下請擇一勾選)

(V)同意 (立即開放)

( )同意 (一年後開放)，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

( )同意 (二年後開放)，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

( )不同意，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

以非專屬、無償授權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與國家圖書館，基於推動「資源共享、互惠合作」之理念，於回饋社會與學術研究之目的，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紙本、微縮、光碟及其它各種方法將上列論文收錄、重製、公開陳列、與發行，或再授權他人以各種方法重製與利用，並得將數位化之上列論文與論文電子檔以上載網路方式，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研究生簽名: 黃玉芬　　　學號： 93135011

論文名稱: 陳 毅 之 研 究

指導教授姓名： 齊 茂 吉 博士

系所 ： 歷 史 研 究 所　　　□博士班 ■碩士班

日期：民國 96 年 7 月 10 日

備註：

1. 本授權書之授權範圍僅限電子檔，紙本論文部分依著作權法第 15 條第 3 款之規定，採推定原則即預設同意圖書館得公開上架閱覽，如您有申請專利或投稿等考量，不同意紙本上架陳列，須另行加塡聲明書，詳細說明與紙本聲明書請至 http://blog.lib.ncu.edu.tw/plog/ 碩博士論文專區查閱下載。
2. 本授權書請塡寫並親筆簽名後，裝訂於各紙本論文封面後之次頁（全文電子檔內之授權書簽名，可用電腦打字代替）。
3. 請加印一份單張之授權書，塡寫並親筆簽名後，於辦理離校時交圖書館（以統一代轉寄給國家圖書館）。
4. 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上列論文，應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辦理。

國立中央大學碩士班研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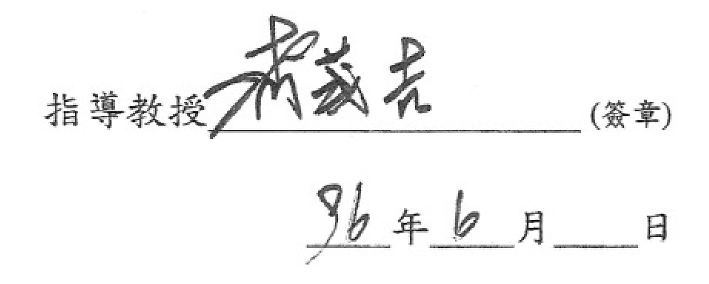
論文指導教授推薦書

历史學系/研究所黃玉芬研究生所

提之論文

陳毅之研究

係由本人指導撰述，同意提付審查。



指導教授＿＿＿＿＿＿＿＿(簽章)

96年6月＿＿日

國立中央大學碩士班研究生

論文口試委員審定書

歷史 研究所 黃玉芬 研究生所提之論文

陳毅之研究

經本委員會審議，認定符合碩士資格標準。

學位考試委員會召集人 吳振漢

委　員 [illegible]

吳振漢

傅紅[illegible]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七月十日

陳　毅　之　研　究

摘　要

陳毅是中共「十大元帥」之一。由於他的國學基礎極佳，平素喜歡寫詩作文章，因此有「元帥詩人」之美譽。而陳毅在中共建國不久之後擔任外交部部長，所以他又有一享譽全國美稱——「元帥外交家」。

陳毅本想走上文藝青年的道路，弱冠之年考上了公費留學法國「勤工儉學」，因而接觸了「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等思想，在被迫中斷學業押解回國後，他透過留法同學的介紹，在 1923 年正式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員。

入黨不久後的陳毅，在與國軍的鬥爭中歷經無數次戰火的考驗，焠鍊出視死如歸、臨危不懼沙場戰將的膽識，因而在中共建國的戰鬥過程中得到毛澤東、周恩來委以重任，在土地革命時期，參與領導創建和保衛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並在中共主力軍長征後，留在南方堅持了三年極其艱苦的游擊戰爭。在對日抗爭時期任新四軍代軍長率部挺進江南抗日前線，繼續領導華中軍民進行「反掃蕩」、「反投降」的鬥爭。國共內戰開始後，他負責指揮華東戰場，任華東野戰軍司令員。1948 年夏天，他擔任中原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同劉伯承、鄧小平一起率中原野戰軍參加淮海戰役(國軍稱為徐蚌會戰)為中共創下彪炳戰功。中共建國後陳毅是為上海市首任市長，領導對舊上海的改造和經濟恢復工作，創造軍政全勝的紀錄。1954 年，陳毅奉調北京擔任副總理、1955 年獲得中共建國「十大元帥」之殊榮後,進一步擔負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的重責大任，陪同周恩來總理出訪亞非等國家，開拓國際外交空間。「文革」開始後，他以敢發言抨擊「文革」的錯誤，成為當權派視為眼中釘「二月逆流」的「黑將軍」，但是他不畏外交部造反派的批鬥，為在文革中的外交部抵擋一陣又一陣的風暴。1969 年他在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仍當選為中央委員，並在毛澤東、周恩來的安排下參與國際形勢問題的研究，做出打開中美冰凍關係的建議。

1972 年 1 月 6 日，陳毅因罹患腸癌病逝於北京。1 月 10 日下午，舉行陳毅追悼會時，毛澤東突然臨時決定參加，在哀樂聲中，毛澤東清淚兩行握著陳毅妻子的手說：「陳毅是個好人、是個好同志」這一破例舉動，不僅表達了難得的戰友之情，也是對陳毅一生最好的肯定。

The Research on Chen Yi

Abstract

Chen Yi was one of the grand ten marshals of Chinese Communists. Due to his profound knowledge in Chinese literature, he got his character as a Poet of the Marshal. Not long after the Chinese Communists had establishe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en Yi became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Therefore, he had another national wide laureate—Diplomatist of the Marshal.

Originally, Chen Yi planed to engage in literature and art creation. But at the age of twenty, he got the qualification to study abroad at public expense in France. It made him get a lot of chances to know about Marxism and Socialism, and so on. When he was forced to break off his school and be sent back under escort to China, he soon became a member of Chinese Communists in 1923.

Soon after Chen Yi joine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he experienced a lot of battles with national troops. These experiences made him cultivate his uniquely revolutionary personality of courage and will. Thus, he was charged with grand responsibilities by Mao Ze-dong and Zhou En-lai during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Land Revolution, Chen Yi guarded their revolutionary base and stayed in the south to have extremely hard hit-and-run attack for 3 years. During the war against Japanese militarism, Chen Yi led the New Forth Troops to push forward the front-line around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Afterward, he continuously led the armed force and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to go on the conflicts of anti-sweep and anti-surrender. After the Chinese civil war begun, Chen Yi, Deng Xiao-ping and Liu Bo-cheng led their troops to win the battle in the Huai River area. Chen Yi was the first mayor of Shanghai afte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d been established. He reformed the old city and restored the economy and created a splendid record. In 1954, Chen Yi was transferred to Beijing to bore the vice premier. In 1955, he was awarded one of the grand ten marshal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n bore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and kept company with Zhou En-lai to visit some Asian and African countries to develop their international diplomacy.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ad begun, the authorities were not fond of Chen Yi's speech and ideas, but he was not frightened. He warded off a lot of conflicts instead. In 1969, he was still elected to be a central commissioner and be arranged under Mao Ze-dong and Zhou En-lai's will to join the research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ditions. Chen Yi suggested open up the frozen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tied States and China.

On the 6th January 1972, Chen Yi died of cancer in Beijing. When his funeral was held on the 10th Jan , Mao Ze-dong appeared suddenly. In the music of lament, Mao was in tears and said to Chen Yi's wife: "He was both a good man and a good comrade." Mao's exceptional act not only conveyed their friendship of battle companion but also the best praise for Chen Yi's whole life.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一、　研究動機

中共建國以來，毛澤東（1893-1976）參加過兩次追悼會。第一次是 1950 年參加任弼時（1905-1950）的追悼會，另一次就是抱著病軀、冒著嚴寒參加陳毅（1901-1972）的追悼會。追悼會後不久，受了風寒的毛澤東由於肺心病加重和缺氧，突然休克，經全力搶救，才甦醒過來。陳毅是何許人也，竟能讓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在風燭殘年親自參加追悼會？而毛澤東的親臨，已充分說明他與陳毅的的情誼以及對他一生的肯定。毛澤東與陳毅，在中共建國史上都可說是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與詩人。世人對毛澤東的認識如數家珍，專書、期刊的研究可說是汗牛充棟。然而身爲毛澤東井崗山時期的戰友、中共開國的元老、十大元帥之一的陳毅，在中共黨史、軍史上亦是佔有一蓆之地，另外，他在中共建國後擔任經濟重鎮——上海市市長以及 60 年代擔任中共外交部部長的重要職務，可以推論他當時受到毛澤東倚重的情形。

然而在「文革」時期，由於陳毅生性率直、好發異論，在文革中屢屢放炮，抨擊時政，成爲文革中著名的「老右」，以致得罪了以江青爲首的四人幫及林彪集團，被誣爲「二月逆流」而遭到批鬥、打壓，在亂局中危及其所主管的外交系統，然而幸得周恩來以身作盾，撐起大樹護英華，渡過一次又一次的難關；並在周恩來刻意的安排下負責研究國際形勢，分析了中、美、蘇三大力量的關係，判定：「中蘇矛盾大於中美矛盾，美蘇矛盾大於中蘇矛盾」，[1]作出打開中美關係的建議，讓陳毅在生命結束的前一刻，仍有機會竭殫心力於風雲詭譎的國際外交戰場。在毛澤東所主導「文化大文革」[2]全面奪權的日子裏，是否真如陳毅自己所說的：

---

[1] 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2006 年），頁 191。

[2] 毛澤東所主導的文化大革命本是一場思想革命，要用社會主義的文化、思想、風俗、習慣，取代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舊文化、舊思想、舊風俗、舊習慣。陳永發 ，《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冊，頁 25。響應文化大革命的紅衛兵和造反派絕大多數都是毛澤東的崇拜者。毛澤東對發動文化大革命下了很大決心，要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毛澤東寫給江青的一封信〉，1966 年 7 月 8 日寫，1972 年 9 月發表，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中

「1966 年 8、9 月份，只要我陳毅不吭氣，住在中南海是不成問題的！」[3]而他的一生是否也真的如周恩來在起草追悼詞中所說的「有功有過」，[4]毛澤東在陳毅追悼會中所說的：「陳毅是一個好同志！」、「陳毅為中國革命、世界革命作出貢獻，立了大功勞的」，[5]到底是肺腑之言，還是別有用心？我們可以透過對陳毅一生重要經歷的研究分析，找到較爲中肯的答案並給予陳毅較客觀的歷史定位。

二、　題目界定

本論文的題目是〈陳毅之研究〉，在此就題目中的關鍵詞彙、研究範圍與時間做一番界定。

本文主角陳毅是位戰功彪炳的中共高層政治人物，他在民間享有卓著的聲譽。在他死後，醫院門口自發地聚集了不少從四面八方聞訊趕來的人群。他們站立在寒風中等候，久久不肯散去，堅持要向陳毅的遺體告別。[6] 爲什麼陳毅會如此得人心，弄到最後毛澤東只得親自出席他的哀悼會呢？原因就在陳毅在人們的心中是個「儒將」，自青年時代即有文學的慧根，即使後來封爲元帥，仍然喜歡吟詩作對，學識淵博又親民的形象深入人心。所以在研究陳毅時，除了他在軍中的資歷外對於他的家世、國學基礎亦要多所著墨。此外，陳毅在中共歷史上活躍近 40 年的時間，在此期間若非與中共主要領導人物毛澤東、周恩來互動頻繁，就不會在建國前後受到毛周二人之重用，以及在「文革」中受到周恩來以身作盾，死命保護陳毅的史事發生。所以對於毛、周二人在陳毅一生的研究中實在是不可不提的重心人物。至於陳毅在建國後所擔任上海市長、外交部部長的職務到「文革」後被亂流所蓆捲的困局，正是見證陳毅一生由最高峰掉到最低潮的一段關鍵時刻，自然也是此研究的重心之所在。鑒於陳毅由青年到死後的哀悼會都構成其

共機密檔彙編》（臺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78），頁 38~40。

[3]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 年 8 月），頁 330。

[4]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5 年），頁 238。

[5]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4 年），頁 522。

[6]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366。

精采不凡的一生，因此本研究並沒有強加時間斷限，而是採取俯瞰陳毅一生的角度，對陳毅這個人做一縱貫全局的檢視，不希望忽略掉發生在陳毅身上每一重要的歷史關鍵。

三、 研究回顧

由於筆者以陳毅之研究爲主要問題處理對象，因此對於陳毅一生的相關經歷有關的研究，都有必要加以回顧與檢討。目前雖然有當代中國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之編纂，但是尚無以「陳毅之研究」爲題之學術論文來討論陳毅崛起之背景以及他在中共建國前後重要的經歷。

而與陳毅生平傳記有關的論著，基本上都還是侷限在爲中共人物宣傳框架中作敘述的，如: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編的《陳毅傳》、蔣洪斌的《陳毅傳》、[7]劉樹發的《陳毅年譜》、[8]羅英才的《陳毅的非常之路》、[9]譚震林《陳毅》[10]等。

至於著重陳毅在軍事鬥爭時期的論著如：張日新、李祖榮的《紅軍時期的陳毅》、[11]曹宏《第三野戰軍》、[12]石言、吳克斌的《陳毅北渡》、[13]安徽省軍區政治部主編的《新四軍在安徽》、[14]管文蔚的《陳毅在大江南北》、[15]楊尙奎的《陳毅在贛南》、[16]計高成的《陳毅在鹽城》[17]等；此外重點放在陳毅在中共建國後的重要經歷的著作有：何曉魯、鐵竹偉的《從沙場走向十裏洋場》、[18]何曉魯的《元帥

---

[7] 蔣洪斌，《陳毅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8] 劉樹發主編，《陳毅年譜》上、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
[9] 羅英才，《陳毅的非常之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
[10] 譚震林、栗裕等著，《陳毅》（香港 : 廣角鏡出版社, 1976 年）。
[11] 張日新、李祖榮，《紅軍時期的陳毅》（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 1991 年）。
[12] 曹宏，《第三野戰軍》（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8 年）。.
[13] 石言、吳克斌《陳毅北渡》（北京 : 戰士出版社, 1983 年）。
[14] 安徽省軍區政治部主編，《新四軍在安徽》（合肥市：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 年）。
[15] 管文蔚、《陳毅在大江南北》（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16] 楊尙奎，《陳毅在贛南》（北京：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1978 年）。
[17] 計高成，《陳毅在鹽城》（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1 年）。
[18] 何曉魯、鐵竹偉，《從沙場走向十里洋場》（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6 年）。

外交家》、[19]杜易的《大雪壓青松——文革時期的陳毅》、[20]鐵竹偉的《陳毅元帥的最後歲月》[21]、馮小敏主編的《現代上海研究論叢》[22]等。

至於與陳毅相關的期刊和報導，主要都是中國大陸方面的資料，內容仍是帶有替陳毅這位主要人物宣傳的特色，如: 袁鷹在〈陳毅元帥的詩人風範〉[23]中主要是提及陳毅自幼就奠定深厚的國學基礎，自踏入軍旅後人不忘作詩自娛，尤其是當陳毅每次遇到危難時，他就用詩來表達自己的心境，例如膾炙人口的〈梅嶺三章〉，令人讀起來動容，對陳毅將生死置於度外的勇氣佩服不已。

胡兆才在〈陳毅對黨的三次重大貢獻〉[24]中主要提及陳毅在三河垻分兵保留了革命的種子、在紅軍九大前維護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聯李反韓打開蘇北對日抗戰新局面對黨的三次貢獻。曾讓譚震林（1902-1983）在 1954 年 4 月 2 日華東局擴大會議上說忍不住，公開讚美陳毅。

李大清在〈陳毅同志對古田會議的歷史貢獻〉[25]中，主要提及陳毅對古田會議的貢獻主要有:一、及時反映紅四軍的情況，正確反思毛澤東的主張，爲中央指示提供可靠依據，確立了古田會議的指導思想。二、正確把握中央精神，執筆起草「九月來信」，爲古田會議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礎。三、耐心做好解釋說服工們，爲古田會議奠定了組織基礎。四、參加「新泉整訓」，人力協助毛澤東做好會前準備工作。

袁德金在〈毛澤東與陳毅〉[26]中主要提到陳毅與毛澤東初識於在井崗山根據地，而後發展出長達四十年情誼，其中經歷無數次風風雨雨，有相知亦有相左的矛盾，但是毛澤東與陳毅總是能夠藉著詩詞往來展開心靈的對話。

劉建美在〈五次蒙受奇冤的陳毅〉[27]中提及陳毅在蘇區肅反運動中有五次蒙

---

[19] 何曉魯，《元帥外交家》（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5 年）。
[20] 杜易，《大雪壓青松——文革中的陳毅》（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 年）。
[21] 鐵竹偉，《陳毅元帥的最後歲月》（北京 : 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2002 年）。
[22] 馮小敏主編，《現代上海研究論叢》（上海市 : 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4 年）。
[23] 袁鷹，〈陳毅元帥的詩人風範〉，《炎黃春秋》，期 5（2003 年），頁 10－11。
[24] 胡兆才，〈陳毅對黨的三次重大貢獻〉《黨史文匯》，期 6（1994 年），頁 16-19。
[25] 李大清，(陳毅同志對古田會議的歷史貢獻)，《龍岩師專學報》期 6（2000 年）頁 93-96。
[26] 袁德金，(毛澤東與陳毅)，《湖北檔案》，期 3（2004 年），頁 9。
[27] 劉健美，〈五次蒙受期冤的陳毅〉，《文史精華》期 7（2002 年），頁 4-11。

受冤枉包括：被誣指爲「AB 團」的團長、南方紅軍游擊隊改編中的「投機份子」、整風中的「黃花塘事件」、二月逆流的「聯絡員」、廬山會議的「二陳合流」。

周蕙、儲文瑞在〈陳毅與黃花塘事件〉[28]中提及陳毅在 1943 年在黃花塘新四軍軍部與中共華中局代理書記、新四軍代理政治委員的饒漱石（1903-0975）之間的紛爭，並爲此特別到延安與毛澤東見面的過程。

胡居成在〈陳毅與外國領導人交往二三事〉[29]中提及陳毅在擔任外交部長期間與赫魯雪夫（Nikita Sergeyevich Khrushchev，1894-1971）等外國元首之間的互動情況，尤其是陳毅與赫魯雪夫的會談中出現非常精采的對話與舌戰，讓赫魯雪夫氣急敗壞，而怒罵中國是「好鬥的公雞」。[30]

唐舒的〈陳毅在上海〉[31]中提及陳毅青年時期三度來到上海的機緣，而後在國共內戰 1949 年 5 月間，他率領第三野戰軍發起攻佔上海的戰役，以及後來陳毅在擔任上海市長任期內如何接管上海、改造上海、建設上海的艱苦歷程。

姚會元在〈陳毅領導上海解放之初的經濟恢復工作〉[32]中提到陳毅是上海解放後的第一任市長。陳毅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爲恢復和發展上海經濟做出了歷史性貢獻，完成了中共中央目標：與進步的產業界和一切愛國民主人士通力合作，克服困難，恢復生產的任務。

宗道一在〈文革中的陳毅與周恩來〉[33]中提到陳毅成爲周恩來總理外交上最得力的助手，他們之間建立生死之交的情誼，尤其是在史無前例的「文革」中，陳毅遭到造反派的攻擊，周恩來挺身而出保護陳毅。爲了幫助陳毅「過關」，周恩來用心良苦，費盡心血。

宗道一在〈王力“八七”講話與外交部奪權鬧劇〉[34]中提到 1967 年 8 月 7 日「文革」幹將王力（1922-1996）在釣魚台接見外交系統「造反派」發表了臭名昭

[28] 周蕙、儲文瑞，〈陳毅與黃花塘事件〉上，《江淮文史》，期 2（1994 年），頁 71~86。
[29] 胡居成，〈陳毅與外國領導人交往二三事〉，《陳毅與外國領導交往二三事》，期 10（2006 年），頁 58-61。
[30] 胡居成，〈陳毅與外國領導人交往二三事〉，《陳毅與外國領導交往二三事》，頁 59。
[31] 唐舒，〈陳毅在上海〉，《人才開發》，期 3（1999 年），頁 4-5。
[32] 姚會元，，(陳毅領導上海解放之初的經濟恢復工作)，《當代中國使研究》，期 3（2003 年），頁 23-29。
[33] 宗道一，(文革中的陳毅與周恩來〉，《文史精華》，期 12（2001 年），頁 33-39。
[34] 宗道一，〈1967 年夏季中國外交部的奪權鬧劇〉，《黨史博覽》，期 11 （1998 年），頁 51-59。

著、後來被毛澤東憤怒地譴責爲「大、大、大毒草」的「王八七講話」。在「王八七講話」發表後,全面宣告外交部可以奪權，造成火燒英國代辦處，演出中國外交史上最荒唐的一幕。

叢文滋在〈陳毅元帥召集 1969 年務虛會〉[35]中提到從 6 月 7 日至 9 月 16 日，在陳毅的主持下，老帥們先後開了 23 次國際形勢務虛會。討論的重點是中、美、蘇三國實力、利害關係的鬥爭問題。4 位老帥通過閱讀人大量參考資料和外交部送的有關電報檔，從戰略的高度，認真分析研究當時的國際形勢，在取得一致認識的基礎上，先後寫了兩份有獨特看法和建議的調研報告。

湯雄在〈病危中的陳毅〉[36]提到陳毅從 1971 年開始身體就出現不適的狀態，後來在就醫過程中遭到誤診以及在 301 醫院受到刁難的困境，在周恩來出面後，由腸癌專家作治療，可是仍然挽不回陳毅的性命。1972 年 1 月 6 日，在陳毅病危之際，葉劍英（1897-1986）趕到醫院，俯在陳毅耳邊告訴他說，毛主席和黨中央要他安心養病，毛主席要爲你平反，大家不要講二月逆流了！

關於上述相關著作的回顧，發現研究陳毅的期刊，雖然仍擺脫不了對主要研究對象高度頌揚，呈現過於渲染陳毅的功績或是對林彪集團、江青四人幫等人罪狀的撻伐，在這樣的宣傳框架中所描寫的內容，難免會出現與史實有所出人的地方，值得再去深入還原和探討。

四、資料運用與研究方法

在資料運用方面，凡是與陳毅相關的資料，將是蒐集上的重點，並試圖利用一些中共已開放的檔案資料、相關的黨史著作。有關的專書和期刊論文，來瞭解陳毅的家世、崛起的背景、軍事資歷以及在中共建國前後所扮演的角色與文革後的處境。

[35] 叢文滋，〈陳毅元帥召集 1969 年務虛會〉，《外交學院學報》期 4（2001 年），頁 5-11。
[36] 湯雄，〈病危中的陳毅〉，《山西老年》期 1（1995 年），頁 4-6。

由於中共歷史檔案目前開放的程度還不很高，在查閱檔案還有種種限制，因此在研究上有一定的困難。誠如楊奎松在〈淺談中共歷史檔案的利用與研究〉一文中所說：

> 一般的研究者，包括海外的研究者，要想直接利用第一手的檔案資料全面地研究中共的歷史，幾乎是不可能的。而離開了所需主要檔案資料，要想對自己的研究對象，無論是對事件的經過，還是對傳主的經歷，做出客觀和準確的說明。通常都會變得極困難。……有相當一部分原因就是因為他們能看到的第一手檔案資料太少，以致於不能不更多地利用主觀的推測或並不可靠的各種二手資料。當然，現狀如此。不等於不能研究。畢竟，即使就中共歷史檔案而言，其開放程度較前已有相當進步，……而在大陸，相關的檔案資料除了北京的有關機構陸續在公佈以外。各地的檔案館這些年也以地方檔案的形式。先後公佈了大量的檔案資料。[37]

既然直接查閱原始檔案有其困難性，因此利用經過整理編輯的已出版檔案資料，就成了研究中共歷史的一種重要選擇。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共文件、公報、指示等類的材料，是研究文革極爲重要的歷史文獻。而這裡所指的報刊社論主要是：《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兩報一刊是中共指導全國運動，公開的、理論性的方針；相對而言那些中央文件、指示往往是屬於內部的、政策性的具體指導。是瞭解文革領導者指導每一階段運動的最初意圖，政策變換和內部鬥爭更是必不可少的原始檔案。因此在史料檔案方面有關文革的資料，宋永毅主編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38]收錄了大量文革時期已開放的一手檔案和資料，在其中可以看到有關中共中央的指示、重要人物的講話紀錄和批示等、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群眾運動重要文獻、文化大革命中的異端思潮重要文獻。此外，中共

---

[37] 楊奎松，〈淺談中共歷史檔案的利用與研究〉，《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 27 期（1993 年），頁 137。

[38] 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2002 年)。

研究雜誌社編輯部編的《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彙編》，[39]也蒐集了文革期間相關的中共中央檔案資料。

至於中共建國後的一些重要的史料。也需要加以注意，如: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40]內容包括從 1949 年到 1965 年，中共中央的指示、政令宣導、政策說明、重要人物的講話紀錄和批示等;另外，中共中央黨史館編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4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42]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的《中共機密檔彙編》[43]等也都收錄了部分中共建國後的一手檔案資料。

在相關人物傳記、年譜，以及中共的黨史相關出版品方面，提供我們相當多的資料，但在參考運用方面，要注意與其他史料作一比對，以免陷入編纂者個人意識形態或情感等因素，造成失真的陷阱。此類的資料如: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年譜組編的《毛澤東軍事年譜 (1927-1958》、[4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 《周恩來年譜(1949-1976》、[4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鄧小平年譜(1975-1997》、[46]逄先知、金沖及編的《毛澤東傳(1949-1976》、[47]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編的《陳毅傳》、洪斌的《陳毅傳》中共中央研究室編的《中國共產黨歷史》、[48]胡繩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49]等。

其他在報章、期刊方面，文革時期主要的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以及《南方日報》、《文匯報》等，都是重要的參考資料，另外大陸方面的期刊如：《炎黃春秋》、《黨史縱覽》、《黨的文獻》、《黨史博采》、《黨史天地》、《黨史文苑》、《文史精華》、《黨史陣覽》、《理論探討》、《軍事歷史》等，

---

[39] 中共研究雜誌社編輯部，《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彙編》（臺北：上海印刷廠，1973 年）。
[40] 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20 冊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1998 年)
[41] 中央黨史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 (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 年)。
[4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闊題的決議》注釋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
[43]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中共機密文件彙編》（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 78 年)。
[44] 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年譜組編，《毛澤東軍事年譜(1927-1958》(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
[4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上、下卷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
[4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 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年)。
[47] 逄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下冊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年)。
[48]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
[49] 胡繩，《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 年)。

裡面有些相關的文章，有助於瞭解部分陳毅在建國前後的經歷和處境，不過內容多有宣傳和歌功頌德的傾向。在運用上要做適當的取捨、解讀，方能反應真正的事件始末。

另外，還有透過相關專書的蒐集和整理，從中找尋有關的論述，加以整理分析，也有助於瞭解陳毅在中共建國前後所扮演角色與處境，此類的專書有羅英才的《陳毅的非常之路》陳永發編的《中國共產革命的七十年》、[50]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丁凱文主編的《重審林彪罪案》、[51]鄧小平的女兒鄧榕所寫的《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52]曉亮、文軍主編的《十大元帥之謎》、[53]馬繼森的《外交部文革紀實》[54]等。

最後，關於研究方法方面，主要是以歷史研究法來檢視歷史的紀錄和資料，來重建歷史事實，發現其中因果關係。因此透過上述官方的檔案資料、傳記、年譜、期刊，報紙和相關專書的研究和分析，並試圖除去其中宣傳和渲染的部分，予以適當的解讀，藉此來瞭解陳毅崛起的背景與中共主要領導人的關係，並進一步探索陳毅在整個中共建國前後所扮演的角色與文革時期的處境。

五、論文架構

本論文共分成五章，第一章是緒論，第五章是結論。第二章部分是關於陳毅崛起的歷史背景，下分三節:第一節主要探討陳毅的家世背景、國學基礎以及如何在遠赴法國，後來成爲共產黨員在軍事上的建樹。第二節討論陳毅與毛澤東之淵源，主要是介紹陳毅在紅軍創建時期到中共建國前後，與毛澤東在工作上的互動，及兩人在感情上相知又相左的矛盾。第三節是討論陳毅與周恩來堅固情誼的

[50] 陳永發 ，《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冊（臺北：聯經出版社，2004）。
[51] 丁凱文《重審林彪罪案》上、下冊（香港：明鏡出版社，2 004 年）。
[52]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年）。
[53] 曉亮、文軍主編，《十大元帥之謎》上冊 (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年)。
[54]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年）。

源頭、在創黨建國中的互動以及在困境中的患難之交。第三章是關於陳毅在建國後的經歷，下分二節：第一節是討論陳毅擔任上海市長，如何恢復上海的安定繁榮，贏得軍政全勝。第二節討論的是陳毅在擔任外交部長時期如何陪同周恩來至亞非等國爭取盟友，以及陳毅在外交方面所施展的努力與收穫。第四章是討論陳毅在「文革」時期的處境，下分三節：第一節是討論「二月逆流」的前因後果，「三老四帥」是如何大鬧懷仁堂因而被戴上「二月逆流」的帽子，而此時的陳毅在政治上的地位與處境產生何種變化，有待進一步去瞭解。第二節是討論陳毅與外交部的風暴，探討在文革的風暴期、陳毅所主管的外交部如何被造反派所奪權、周恩來在此時扮演的是何種角色？政治立場又如何呢？第三節討論陳毅與國際形勢座談會，探討陳毅負責研究的國際形勢座談會，如何在開了 23 次研究會後作出具體建議，讓毛澤東藉此打破中美冰封的關係。第五章是結論的部分，探討在陳毅死後毛澤東抱著病體，來到陳毅的追悼會上悼念井崗山時期的亡友並說出對陳毅一生肯定的話，此舉到底是真情流露呢？還是爲了收攬人心而故做姿態呢？在此將做進一步的探究與分析。

第二章　　陳毅崛起的歷史背景

第一節　**陳毅家世背景與軍事**

陳毅（1901-1972）是四川省樂至縣人，中共開國元老、「十大元帥」之一。[55]素有「元帥詩人」的美稱，如郭沫若（1892－1978）就曾贊譽他：「一柱天南百戰身，將軍本色是詩人」。[56]此外，毛澤東（1893－1976）亦曾說過：「陳毅同志的詩具有『大氣磅礡』的特點」。[57]他一生喜愛詩詞，也寫了大量詩篇，留有數本著作，[58]回顧其一生，總是與詩詞相伴，無論是身處於順境、困境、或是逆境，他善於用詩賦來表達心境，甚至用來療傷。[59]而最早把陳毅引入古典詩詞殿堂的是他的父親——陳昌禮。由於父親對詩詞歌賦的喜好，因此啓蒙幼年陳毅對詩文的興趣。他在十歲時，又很幸運的在青海寺學堂，遇到國學造詣頗高的陳玉堂老師，他的詩詞格律基礎由此處人門。[60]1913 年，陳毅考取華陽縣德勝鄉高等小學。校長馮湛恩是成都有名的古文家，對陳毅的影響很大。這段時間，他通讀了《古文觀止》、《千家詩》、《唐詩集解》等書籍，進一步奠定了古文的功夫。陳毅在回憶這段經歷的時候說:「我那時的興趣是集中在政治和文學方面。而我少年時代的家庭教育和我在成都遇見的幾個精通中國文學的教師，以及成都周圍富於文學藝術史跡的自然環境，又把我推上傾心於文學的道路」。[61]可是在陳毅高等小學快畢業時，正是「科學救國」、「工業救國」的口號響徹雲霄之際，因此他順勢考進了成都甲種工業學校，開始學染織專業，但讀古書、寫詩文，依然是陳毅課餘最熱衷的雅興。就算在 1921 年年底陳毅從法國勤工儉學被驅逐回國，心情跌到最谷

---

[55] 十大元帥排名如下: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植、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中國人民解放軍六十大事記(1927-1987)》(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8 年 12 月)，頁 552。不過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帥名錄》中，卻依簡體字姓氏筆劃重新排列，陳毅排名提前到第四位。星火燎原編輯部，《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帥名錄》，第一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 年），頁 2-21。

[56] 袁鷹，〈陳毅元帥的詩人風範〉，《炎黃春秋》，期 5（2003 年），頁 10－11。

[57] 毛澤東,《毛澤東文集》, 第八卷（北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頁 421。

[58] 陳毅兼資文武，博學多才。有多種軍事、政治論著和詩詞著作，編爲《陳毅軍事文選》、《陳毅詩詞選集》、《陳毅詩稿》等。

[59] 馮錫剛，〈詩可以療疾ー陳毅詩話〉，《黨史文匯》，期 9（2006 年），頁 27－30。

[60]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 年），頁 3。

[61] 陳毅，〈給羅生特同志的信〉，《陳毅詩詞選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 年），頁 362。

底之際，他也沒有因此放棄做個文學家、詩人的心願。此時的他想要憑藉自己手中的筆，去做一名自由自在的文人作家。在這年春節的夜晚，陳毅聽了母親講述這些年他赴法國後家中經濟上的窘狀，再聯想到自己現今的處境，心潮悲淒難抑，因此寫下了一首隨感絕句:

年年難過啼飢寒，

處處環境亦皆然。

待到一朝風雷震，

誰說苦盡不生甜。[62]

此外，陳毅也為全家棲身的陳氏祠堂寫了一副別具一格的對聯:

年難過，年難過，年年難過年年過;

事不成，事不成，事事不成事事成。[63]

這一副全部由最通俗的白話綴聯而生，樸實無華而又對仗工整的春聯，把陳毅當時的心境、家境以及社會形勢生動地勾畫出來，也顯示了 20 歲的陳毅洋溢的文學才氣和不凡的抱負。時至 1946 年，他在出任第三野戰軍司令員時，還曾對參加軍調處工作的美軍上校說:「我的興趣不在軍事，更不在戰爭，我的興趣在藝術，我願做記者，我喜歡寫小說。當我的書出版時，我將首先送一本給你」！[64]由此可以窺見，做一名出色的文學家、詩人，一直是陳毅青少年時的夢想。然而陳毅究竟為什麼沒有踏上職業詩人的道路，反而成為中共戰績彪炳、功勳卓著的元帥呢？其中最重要的轉折，是在 1919 年，陳毅遠涉重洋到法國「勤工儉學」，[65]成為他革命生涯的起點。在轉赴法國求學前，陳毅先抵達上海等待船期，碰巧遇到了「五四運動」的高潮，各界舉行示威遊行。陳毅被當時的形勢所吸引，在滯留上海的一個半月中常常去聽名流的講演，以及接觸像《新青年》之類的文章，使

[62] 孫文光，《陳毅文學系年》(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 年)，頁 15。

[63] 孫文光，《陳毅文學系年》，頁 18。

[64] 孫文光，《陳毅文學系年》，頁 105。

[65] 勤工儉學主要倡導者是李煜瀛（1881-1973）。李煜瀛的父親李鴻藻（1820-1897）是清末重臣，但極具維新思想，中日甲午戰爭後，他認識到中國必須學習西洋。在父親的影響下，1902 年 8 月，李煜瀛隨同清駐法欽差大臣孫寶琦（1867-1937）赴法。為了鼓勵更多的學生青年以低廉的費用和苦學的精神赴法留學，以達到普及教育、改良社會、振興事業之目的，李煜瀛與蔡元培（1868-1940）等人於 1915 年 6 月在巴黎發起成立了「勤工儉學會」，其宗旨為:「勤於做工、儉以求學」以進勞動者之智識。胡志剛，〈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由來和發展〉，《黨史文苑》，期 4（2006 年），頁 59。

陳毅的思想經歷了第一次大動盪。[66]在 8 月 14 日，陳毅一行登上「麥浪號」輪船離開上海， 10 月 10 日抵達法國馬賽後轉赴巴黎，在蒙達尼中學專爲勤工儉學生開辦的法文補習班學習法文。不久，蔡和森(1985－1931)等也被分配到這裡。從這時開始，陳毅與蔡和森成爲親密的朋友。這時的陳毅處在法國的自由環境，各種思想的學習和爭論十分熱烈。這裡除了有無政府主義派、國家主義派外還有資本主義派以及蔡和森、李富春（1900－1975）等一批湖南籍學生組成的社會主義派。[67]此時陳毅的思想極度的自由開放。幾個月後，陳毅被分配到位於巴黎克裏西門外的一個工廠工作。首先給陳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工廠內階級森嚴且工資分配極不平均」。[68]而像陳毅這樣的外國勤工儉學生，由於能力不強，技藝不熟，語言不通，當然更是處於劣勢。這料想不到的現實，深深刺痛了他。從工廠內承受到極不平等的待遇，他不禁喟然嘆道：「人道的敵人，便是資本主義」、「歐洲資本世界，是罪惡的淵藪」。[69]因此陳毅積極投入工人們舉行的罷工，並且曾帶領留法同學加入在「五・一」勞動節舉行的大規模示威活動。此外，在這段時間中，他也讀了大量的法國及西歐的文學名著，這使他不但進一步加深了對西方世界的瞭解，文學修養也提高了一大步。不過現實是冷酷的 ,由於法國戰後的經濟蕭條和中國國內的舊勢力給勤工儉學帶來的重重障礙。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隨時有被解雇的危機，陳毅深切地感到了「國內舊社會」和「資本制度的罪惡」相加的痛苦。[70]1920 年冬，他參加了「工學世界社」這個組織，而這個組織實際上就是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前身，以信仰馬克思主義和實行俄國式的社會革命爲該社社旨。[71]1921 年，勤工儉學倡導者之一的吳敬恒（1865－1953）在國內宣傳勤工儉學生們既無勤工之能，又無儉學之志，揚言要將他們遣送回國。而北洋政府更以國庫奇絀爲理由，凡留法學生無錢無工者，將被遣送回國。1921 年 2 月 28 日，500 多名勤工儉學生，在陳毅等 11 名代表的帶領下，開赴中國駐法公使館，展開了緊張激烈的鬥爭。這就是留法勤工儉學生爲爭吃飯權、工作權、求學權而掀起的

---

[66] 陳毅，〈選擇革命的道路〉，《陳毅早年的回憶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頁 25 。
[67] 李永春、肖志偉，〈蔡和森赴京與湖南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開展〉，《湖南科技大學學報》，期 1（2005 年），頁 38。
[68] 陳毅，〈我兩年來旅法勤工儉學的實感〉，《陳毅早年的回憶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頁 47。
[69] 陳毅，〈我兩年來旅法勤工儉學的實感〉，《陳毅早年的回憶和文稿》頁 48。
[70] 陳毅，〈我兩年來旅法勤工儉學的實感〉，《陳毅早年的回憶和文稿》頁 49。
[71] 李維漢，〈回憶新民學會〉，《回憶與研究》（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 1986 年 4 月）頁 18。

著名的「二・二八運動」。[72]後來陳毅從一位元元法國工程師處得到了一個驚人的秘密借款消息：北洋政府決定以鐵路的建築權作爲交換條件，向法國政府商借 3 億法郎钜款。陳毅很快通知旅法各華僑社團以及「工學世界社」，於 6 月 30 日在巴黎召開了旅法各界代表組成的「拒款大會」。[73]陳毅在此次活動中擔任宣傳和組織的工作，正可展露他的如椽之筆及才幹，使他在同學眼中建立起威信。而就在此時，又傳來了一個更令同學們憤怒的消息：「里昂中法大學」[74]即將開學，而在法國的勤工儉學生將被拒於門外，他和蔡和森、李立三（1899－1976）等決定發動激烈鬥爭，佔據里昂大學校園。10 月 14 日這群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們遭遇到武裝軍警的逮捕，並直接押赴馬賽港，強行遣送回國之命運。當船一抵上海後，立即組織了以陳毅爲首的「被迫歸國留法勤工儉學學生團」發表了〈被迫回國留法勤工儉學學生一百零四人通啓〉，[75]通過報刊、電台廣泛宣傳被迫回國的事實真相，揭露中外反對勢力加諸勤工儉學學生的各種迫害。此時被押解回國的陳毅，不但不是家人所期待留洋「衣錦榮歸」，反倒是落的連個職業都沒有的窘態，使他飽嚐世態炎涼、人情冷暖。後來陳毅經留法同學蔡和森的介紹，於 1922 年秋天，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這時他的思想已在根本上完成了從資產階級過渡到無產階級的轉化。[76]1923 年 10 月陳毅決定先去北京入學，再與中共組織取得聯系，因此來到了北京「中法大學西山學院」。入學後不久，經過中共北方區委的考察，陳毅從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轉入中國共產黨，成爲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陳毅回顧自己投奔共產黨的歷史時，說過：「一方面是自覺的，一方面又是被迫的，但是主要是看到了新興力量之所在，看清了形勢」。[77]

入黨不久，陳毅擔任了中共北京西部區中法大學黨支部書記。這是陳毅在黨

[72] 劉斌，〈20 世紀 20 年代前後湖南青年在法國的工學實踐〉，《西南交通大學學報》，期 5（2004 年），頁 115－121。
[73] 施春生，〈周恩來反對中法秘密大借款〉，《黨史縱橫》，期 5（2003 年），頁 22-25。
[74] 里昂中法大學是中法大學的海外分部，1919 年在巴黎和會上，中國政府向法國政府提出退還庚子賠款的要求，被大會接受，法國政府於是向中國政府退還了庚子賠款額。當時國內教育界蔡元培、李石曾、吳稚暉（1865-1953）等人建議利用退還的庚子部分賠款建造中法大學，中法大學在國內被稱之爲北京中法大學，後來爲了促進中法文化交流，解決留法勤工儉學學生求學問題，經法國教育部同意，決定在法國設立中法大學海外分部。由於里昂物價比巴黎低得多，符合中國留學生儉工求學的現狀和宗旨，於是蔡元培報請孫中山批准，將中法大學海外分部定在里昂，對外稱之爲里昂中法大學。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公推吳稚暉爲校長，學校於 1921 年 9 月竣工。施春生，〈陳毅組織爭奪里昂大學始末〉，《黨史博采》，期 10（2001 年），頁 10-15。
[75] 施春生，〈陳毅組織爭奪里昂大學始末〉，《黨史博采》頁 10-15。
[76] 這裡所說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實際上當時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 年才改爲「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陳毅，〈選擇革命和道路〉，《陳毅早年的回憶和文稿》，頁 27。
[77] 陳毅，〈選擇革命和道路〉，《陳毅早年的回憶和文稿》， 頁 28。

內擔任的第一個職務。[78] 1926 年 3 月陳毅參與組織北京反對八國通牒大會和遊行，遊行隊伍遭遇先埋伏的士兵槍殺，造成 47 人死亡、189 人重傷，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79] 8 月陳毅在中共北方區委李大釗（1889－1927）的派遣下，到四川楊森（1884－1977）部隊做兵運工作。1927 年 5 月，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分配陳毅到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工作。後來由於汪兆銘（1883－1944）宣佈「分共」、「清黨」，軍校改編爲第二方面軍教導團。在「南昌起義」後，[80]教導團以東征討蔣名義離開武漢，即被張發奎（1896－1980）下令繳械。陳毅召開共產黨組織緊急會議，佈置應變辦法。然後赴南昌，追趕上起義軍。[81]10 日由前委書記周恩來（1898－1976）任命爲第十一軍二十五師七十三團團指導員，之後隨軍南下，參加了起義軍攻擊會昌錢大鈞（1893－1982）部的戰鬥，第一次經受戰火的考驗。9 月隨軍入粵後，該部分守三河壩，歸朱德（1886－1976）指揮。起義軍主力于潮(安)汕(頭)地區失敗後，他挺身協助朱德重新編組部隊，轉戰閩粵贛湘邊界。朱德在隊前宣佈：「今後這支部隊由他和陳毅領導」。[82] 陳毅努力協助朱德，對部隊進行了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耐心說明革命的前途，鼓舞士氣，堅持鬥爭，因此保存了南昌起義部隊的骨幹。[83]粟裕（1907－1984）就曾說過:「那時如果不是朱德同志的領導和陳毅同志的協助，這支部隊肯定是要垮掉的」。[84] 接著陳毅又輔佐朱德，對這支部隊進行了「贛南四整」：天心汗整頓、信豐整紀、大餘整編、上堡整訓，[85]尤其是 10 月底部隊在大餘城的整編，改稱「國民革命軍第五縱隊」，朱德（化名王楷）爲司令，陳毅爲指導員，把一批黨團員分配到大隊（連）工作，建立了連的指導員，從而加強了黨在基層的工作，推進了人民軍隊初創時期的政治建設。[86]1928 年 3 月湘南工農兵代表大會在永興舉行，選舉產

---

[78]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15。

[79] 劉樹發主編，《陳毅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頁 78。

[80] 南昌起義，又稱南昌起事、南昌暴動、南昌兵變，是指 1927 年 8 月 1 日於中國的江西南昌，中國共產黨軍隊針對國民黨的清共政策而發起的武裝反抗事件。由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中共人士領導。南昌八一紀念館，《南昌起義》，頁 89－91、95－96。

[81] 陳毅，〈關於“八一”南昌起義〉，《陳毅軍事文選》（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1993 年），頁 552。

[82] 粟裕，《粟裕戰爭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1988 年 11 月），頁 42 至 45。

[83] 胡兆才，〈陳毅對黨的三次重大貢獻〉，《黨史文匯》，期 6（1994 年），頁 16。

[84] 粟裕，《激流歸大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 7 月），頁 9。

[85] 李元健，（贛南四整），《福建黨史月刊》，期 12（1999 年），頁 13。

[86] 鞠景奇，〈陳毅早期武裝鬥爭思想〉，《鎮江師專學報》，期 2（1994 年），頁 74 。

生了湘南蘇維埃政府，陳毅當選爲執行委員。這是中國最早的地區蘇維埃政府之一。3 月底工農革命軍退出湘南，進一步明確向井岡山地區轉移。後來陳毅曾經回憶說：「正是這個時候，知道毛澤東在井岡山，變更加強了勇氣和信心，於是到井崗山去找毛澤東，變成了我們每一個人的希望」。[87]1928 年 4 月毛澤東率領的部隊與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部隊及湘南農軍會師後，成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6 月，按中共中央規定，改稱紅軍第四軍，簡稱紅四軍）。朱德任軍長兼第十師師長，毛澤東任軍黨代表兼第十一師師長，陳毅任第十二師師長；並選舉毛澤東爲特委書記。接著紅四軍開代表大會，改選陳毅擔任軍委書記。從此，陳毅作爲工農紅軍創建人之一與毛澤東、朱德一起走上了以武裝鬥爭、和土地革命，建立以農村爲革命的根據地，此時爲井岡山全盛時期。[88]1929 年 1 月起陳毅隨朱德、毛澤東所率紅四軍主力轉戰贛南、閩西，開展游擊戰爭，發動群眾，建立蘇維埃政權。4 月 1 日率一縱隊隨朱德、毛澤東抵瑞金，與紅五軍會合後，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龍岩城召開，陳毅主持大會並代表上屆前委作工作報告。經討論，通過〈紅軍第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決議案〉，陳毅被選爲前委書記。8 月赴上海參加軍事會議，向中共中央彙報紅四軍的情況和經驗，支援毛澤東關於工農武裝割據、紅軍行動策略和用無產階級思想建軍的主張，陳毅被中共中央指定參加以周恩來爲召集人的「三人委員會」，研究紅四軍的工作，並代中共中央起草了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來信〉)，[89]經周恩來審定、中央通過後，帶回紅四軍向前委傳達，並請回毛澤東主持紅四軍前委工作。12 月，協助毛澤東召開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通過了建黨建軍的綱領性文獻──〈古田會議決議〉。[90]系統地總結了建黨建軍方面的經驗教訓，從組織上加強了黨的領導，陳毅在整個過程中具備特殊的作用，在中共黨史上有著不

---

[87] 陳毅，〈關於“八一”南昌起義〉，《陳毅軍事文選》，頁 319－320。

[88]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38。

[89] 喻國榮，〈中央“九月來信”與紅四軍建設〉，《長沙交通學院學報》期 4（1996 年），頁 29-31。

[90] 傳統上，中共建軍一向堅持兩大原則，一是黨指揮槍，一是軍隊具有多重功能性。在以黨領軍的原則上，中共師法蘇聯，雙方並無二致。都是經由黨委制、政委制、政工制來維持黨對軍隊的控制，可是在組織結構方面，雙方 卻不盡相同。蘇聯紅軍採取的是一元制，也就是所謂一長制，以軍事指揮員爲部隊首長，政工則爲副手;而中共軍隊則是經由三灣改編和古田會議以來所發展出來的特殊領導制度──黨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也就是軍政首長並重的二元制。至於在軍隊的角色功能方面，中共自建軍以來，軍隊不僅要執行軍事任務，而且也要執行非軍事性的政治任務，這種特色倒是蘇軍付諸厥如的。事實上，中共一直對軍隊施加澈底的政治訓練，試圖將軍隊意識形態化，以便產生「爲誰而戰，爲何而戰」的革命意識，進而達到奪取政權，鞏固政權的目的。齊茂吉，《毛澤東和彭德懷、林彪的合作與衝突（1954-1971）》（台北：新新聞出版社，1997 年），頁 33。

可磨滅的貢獻。就如譚震林（1902－1983）在 1954 年 4 月 2 日的華東局擴大會議上發言說：

> 七次大會到九次大會之間是中國革命很重要的關鍵，……如果沒有他〔陳毅〕到上海把中央的精神帶了回去，中國今天究竟怎麼樣就很難說。從七次大會到九次大會的開始，除了毛主席之外主要是他。[91]

古田會議結束後，紅四軍黨內立即開展了傳達貫徹會議決議的活動，把決議視爲紅軍法規。從此，部隊紀律、內部團結更爲鞏固，戰鬥力也進一步提高，全軍面貌爲之一新。因此古田會議的歷史意義在於，全面總結黨建設的正反面經驗，奠定了黨建設的原則和基礎。[92]

從 1930 年以後陳毅歷任紅六軍(後改爲紅三軍)政治委員，中共贛西南特區委書記，紅二十二軍軍長，江西軍區總指揮兼政治委員，參與領導中央蘇區建設和反圍剿鬥爭。曾兩次當選爲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兩次獲頒紅星獎章。直至 1934 年 8 月 28 日陳毅在江西興國老營盤指揮作戰時負重傷， 10 月 9 日紅軍和中央機關即將長征，中央將率中央紅軍撤離中央蘇區，決定任命陳毅爲中共中央分局委員、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中共中央賦予中央分局和中央軍區的任務是：留在蘇區領導鬥爭、掩護中央主力紅軍長征、在中央蘇區及其周圍進行游擊戰爭、恢復和發展蘇區[93]。然而當時留下來的正規部隊約只有 16000 人左右，中央蘇區鬥爭形勢十分嚴峻。而國軍派了兩個縱隊去追擊主力紅軍，其餘幾十萬大軍依然留在中央蘇區圍剿。紅軍長征不到兩個月，中央蘇區淪陷。陳毅向項英（1898－1941）提出建議，要敢於承認失敗，迅速轉變戰略思想，廣泛發動群眾，開展分散的靈活游擊戰爭，採取正確政策和得力措施，粉碎敵人的清剿行動。此後，中央分局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實現從正規戰爭到分散的游擊戰爭的戰略轉變：在政治上，宣傳發展廣大的群眾游擊戰爭；在軍事上，積極擴大地方游擊武裝，培訓游擊戰爭骨幹；在組織上，調整各地領導幹部，加強游擊戰爭的領導。

---

[91] 李大清，〈陳毅同志對古田會議的歷史貢獻〉，《龍岩師專學報》，頁 90。
[92] 李大清，〈陳毅同志對古田會議的歷史貢獻〉，《龍岩師專學報》，頁 90。
[93]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 1989－1949》，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89 年），頁 278。

[94]1935 年 2 月 5 日，遵義會議後的黨中央給項英和中央分局發來了指示電，中央要分局必須立即改變組織方式，使與游擊戰爭的環境相適合，提出：占領山地，靈活機動，伏擊襲擊，出奇制勝游擊戰爭的基本原則。[95]2 月 17 日，中央分局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將部隊成九路，向閩西、閩贛、尋南、三南、湘贛、湘南等方向突圍，開展游擊戰爭，3 月 9 日，項英、陳毅率領紅軍第二十四團最後撤離中央蘇區。行前，項英向中央發電報告突圍部署，接著，埋掉電台，燒毀密碼。從此，他們便同黨中央失去聯絡達三年之久。3 月 11 日，敵軍侵佔上坪，中央蘇區最後一塊蘇維埃區域淪陷。項英、陳毅決定改變突圍方向，歷盡艱險，終於在3 月底抵達了贛粵邊游擊區的中心——— 油山，陳毅說：「過渡時期結束了，新的鬥爭方法———游擊戰爭開始了」。[96]之後與項英在大餘長嶺召開幹部會議，確定了長期堅持游擊戰爭，並將贛粵邊劃分油山、北山、信康贛、南山與上猶崇義 5 個區，將突圍來的 1300 餘人分爲 5 個游擊大隊。以油山爲中心建立秘密的交通聯絡網。陳毅來往各游擊區，組織和指揮游擊隊挺進山外打擊敵人，組織群眾，長期堅持在贛粵邊進行游擊戰爭。

1935 年 3 月，蔣介石對油山游擊根據地實行大規模的「清剿」，準備在三個月內消滅游擊隊。針對國軍大規模的清剿，項英、陳毅採取了小規模的、分散的、群眾性的游擊戰，用以粉碎敵人軍事清剿的目的。1936 年冬天在梅嶺時，陳毅被國軍包圍了 20 多天之久。苦慮不得脫身，因而寫下了膾炙人口的〈梅嶺三章〉，生動的描繪出他在戰爭年代出生入死的寫照：

斷頭今日意如何，創業艱難百戰多，

此去泉台招舊部， 旌旗十萬斬閻羅。

南國烽煙正十年， 此頭須向國門懸。

後死諸君多努力， 捷報飛來當紙錢。

投身革命即為家， 血雨腥風應有涯。

94 劉勉玉，〈略述留守中央蘇區紅軍的九路突圍〉，《南昌大學學報》，期 4（1994 年），頁 75。
95 張日新、李祖榮，《紅軍時期的陳毅》頁 178。，
96 陳毅，〈回憶中央蘇區〉，《憶艱苦的三年游擊戰爭》（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 年月）頁 62。

取義成仁今日事， 人間種遍自由花。[97]

此外，國軍在對游擊區軍事清剿的同時，又實行嚴密的經濟封鎖，使游擊隊的衣、食、住、行困難重重。陳毅曾多次感慨地說:「三年游擊戰爭,是我一生中經歷的最艱苦的戰爭」。[98]

1937 年 7 月中旬，項英、陳毅從一本香港出版的《新學識》雜誌上，間接地得知毛澤東 1937 年 5 月 3 日在延安中國共產黨蘇區代表會議上報告的摘要，他們如獲至寶並以此爲根據，積極主動地提出與國民黨江西地方當局談判。9 月 18 日，陳毅代表贛粵邊特委和紅軍游擊隊，到大餘與國民黨大餘縣政府的代表舉行正式談判，雙方很快達成了協議。國軍停止進攻游擊區，游擊隊改稱江西抗日義勇軍。9 月 24 日，陳毅和項英一同來到南昌，同國民黨江西省政府進行談判，項英並打電報給正在南京的博古（本名秦邦憲，1907－1946）、葉劍英（1897－1986），通過他們傳電毛澤東、洛甫（本名張聞天，1900－1976），報告談判情況，從此取得了和黨中央的聯系。9 月底，項英、陳毅在南昌發表了〈告南方游擊隊公開信〉，要求各游擊隊立即集中，聽候改編。陳毅在南昌設立紅軍游擊隊總接洽處，負責聯絡、接待南方各游擊區的同志。項英則前往延安向黨中央匯報三年來堅持游擊戰爭的情況，陳毅奔赴湘贛邊和皖浙贛邊游擊區，動員游擊隊下山改編。不久，國共兩黨達成協議，南方紅軍游擊隊改編爲新四軍，葉挺（1896－1946）任軍長，項英任副軍長，陳毅任第一支隊司令員。爲加強黨的領導，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和中央軍委新四軍軍分會，項英任書記，陳毅任軍分會副書記、東南分局委員。同時，中央政治局對項英、陳毅領導的南方三年游擊戰爭作出決議，評價他們：

在極艱苦的條件下，長期堅持了英勇的游擊戰爭，基本上正確的執行了黨的路線，完成了黨所給予他們的任務……政治局號召全黨同志向他們及各游擊區的同志學習。[99]

---

[97] 袁鷹，〈陳毅元帥的詩詞風範〉，《炎黃春秋》，期 5（2003 年），頁 10。

[98] 陳毅，〈回憶中央蘇區〉，《憶艱苦的三年游擊戰爭》（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1 年），頁 580 。

[99] 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六大以來》，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 年），頁 896。

抗日戰爭爆發後，陳毅在 1938 年率領第 1 支隊挺進蘇南敵後，與第 2 支隊協力開闢以茅山爲中心的蘇南抗日游擊根據地。5 月在南陵召開一支隊幹部會議，爲江南地區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於獨立自主發展敵後游擊戰爭的方針奠定堅實的思想基礎。 此後進行新豐、新塘、句容、珥陵等戰鬥。1939 年起，執行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100]積極發展抗日武裝，指揮所部在南京、上海之間打擊日僞軍，取得了「延陵大捷」[101]戰鬥的勝利。6 月以主力一部攻佔滸墅關，截斷京滬鐵路（南京—上海），火燒虹橋機場，轟動上海，擴大了新四軍的政治影響。[102]同年冬第一、二支隊合併爲江南指揮部，任指揮。1940 年夏率江南主力挺進蘇北，成立蘇北指揮部，任指揮。遵照中共中央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的原則，制訂並貫徹了滅敵、反韓(反共頑固派韓德勤)、聯李(地方實力派李明揚等)的策略方針。[103]10 月與粟裕等指揮黃橋戰役，打退了韓德勤部的阻撓和進犯，殲其主力一萬餘人，掃除蘇北抗戰障礙，實現與南下八路軍的會師，打開了華中抗戰的新局面。[104]11 月，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成立，任副總指揮並代理總指揮。同月，向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報告〈關於蘇北統戰工作的經過與主要經驗〉，[105]中央給予肯定，並向全軍轉發了這一報告。皖南事變後，[106]重建新四軍軍部，他任代理軍長、中共中央華中局委員、中央軍委華中分會委員。同政治委員劉少奇（1898-1969）等將華中 9 萬兵力整編爲 7 個師和 1 個獨立旅，實現了新四軍在組織和指揮上的統一，並總結經驗教訓，領導部隊整訓。先後發表〈論建軍工作〉、〈論軍事建設〉，推動部隊以加強黨的領導爲中心環節的全面建設。[107]1941 年春，日軍誘脅國軍某部隊降後，令其配合掃蕩

---

[100] 歐陽吉平、石旭光，(項英與陳毅的兩次分歧)，《黨史博采》，期 2（2002 年），頁 46；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120。

[101] 延陵大捷的戰鬥，殲滅了日軍武村大隊長以下 170 餘名。這是一次與與前江南新四軍所打的完全不同的戰鬥。過去新四軍打的是游擊戰，這一次打的是正規戰，是運動攻堅戰。過去對抗的時間都很短，這一次卻相持了整整一天一夜。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121。

[102]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117。

[103]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118。

[104] 胡兆才，(陳毅對黨的三次重大貢獻)《龍岩師專學報》，期 1（2002 年），頁 9。

[105] 陳毅，〈蘇北統戰工作的經驗〉，《陳毅軍事文選》，頁 110。

[106] 1941 年 1 月 6 日，奉命北移的新四軍皖南部隊 9000 餘人，在涇縣茂林地區突遭國軍 8 萬餘人的包圍，除約 2000 餘人突圍外，其餘全部戰死，新四軍軍部亦被摧毀。史稱皖南事變。陸冰，〈淺談皖南事變發生的必然性〉，《鄭州工學院學報(社科版)》，期 1（1996 年），頁 46。

[107] 陳毅，〈論軍事建設〉，《陳毅軍事文選》，頁 185。

蘇北。7 月陳毅領導鹽阜反掃蕩，指揮蘇中、蘇北部隊突襲敵後方，1 個月內作戰多次，殲日軍 3000 餘人。[108]10 月，成功地組織指揮程道口戰役，進一步溝通了鹽阜、淮海和皖東北根據地的聯繫。1942 年春劉少奇返延安後，代理軍委分會書記，全面貫徹中共中央的方針，領導新四軍堅持華中敵後抗戰，指揮各部挫敗日僞軍的掃蕩、清鄉，採取統一戰線和軍事鬥爭相結合的方法，克服了困難，壯大了部隊，鞏固發展了抗日根據地。[109]1944 年 3 月到延安，彙報華中工作，參加整風學習。[110]同時繼續參與指導華中地區和新四軍的抗日鬥爭。1945 年春參加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同年 6 月被選爲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8 月任新四軍軍長、中共中央華中局副書記。

抗日戰爭勝利後，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副書記、新四軍軍長兼山東軍區司令員、山東野戰軍司令員。1945 年 10 月指揮所部發起津浦路阻擊戰，至次年 1 月上旬，共殲國軍約 2.8 萬人，受降日軍約 4000 人，遲滯了國軍北進。[111]1946 年 6 月指揮進行自衛反擊戰，殲滅山東境內鐵路沿線殘存敵軍 3 萬餘人，先後解放德州、泰安、棗莊、周村、張店、膠縣、高密、即墨等城鎮。7 月起，統率山東、華中兩大戰略區部隊，抗擊 50 萬國軍對華東解放區的大舉進攻，此時戰況異常激烈，陳毅在新四軍副軍長羅炳輝（1897－1946）的追悼會上以無比堅定的語氣說：「我們每個人要抱定決心：打了勝仗開慶功會，打了敗仗開批判會，打死了開追悼會」！[112]1947 年 1 月新四軍番號撤銷，華東全軍實行統一整編，撤銷山東、華中兩野戰軍番號，正式組成華東野戰軍（簡稱華野），陳毅爲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從堅持長期戰爭著眼，提出：「一面打仗、一面建設；以戰養戰、以戰教戰；打一仗、進一步」等方針，[113]加速了華東部隊的建設。在此前後，同野戰軍副司令員粟裕、副政治委員譚震林（1902－1983）等一起組織指揮了宿北、魯南、萊蕪等戰役，沉重打擊國軍，奪取了華東戰場的主動權；[114]當國軍集中主力重點進

[108] 金學桂〈陳毅在鹽阜〉,《影劇月報》，期 3（2006 年），頁 39。
[109]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158。
[110] 陳永發 ,《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冊（臺北：聯經出版社，2004 年），頁 397。
[111]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183。
[112]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187。
[113] 陳毅,〈一面打仗一面建設〉,《陳毅軍事文選》，頁 361。
[114]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191﹣202。

攻山東時，又組織指揮了泰蒙、孟良崮等戰役，[115]殲滅國軍精銳主力整編第 74 師等部。同年 6 月底，根據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關於轉入戰略進攻的部署，實行分兵作戰，8 月同粟裕等率華東野戰軍主力一部出擊，9 月取得沙土集戰役的勝利，隨即挺進豫皖蘇地區，與劉伯承（1892－1986）鄧小平（1904－1997）野戰軍及陳賡（1903－1961）謝富治（1909－1972）集團密切配合，將戰爭引向國民黨統治區，在中原地區大量殲敵，迫使國軍陷於被動地位，對扭轉全國戰局起了決定性的作用。[116]11 月赴陝北參加中央召開的會議，途中應邀在中共中央邯鄲局、晉察冀、晉綏等地作報告，比較系統地闡述了毛澤東軍事思想。[117] 1948 年 5 月，除繼續擔任華東軍政職務外，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書記、中原軍區和中原野戰軍第一副司令員，11 月參與組織指揮淮海戰役，[118]爲總前委常委。1949 年 1 月任第三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共中央華東局常委、第三書記。與鄧小平等統一指揮渡江作戰，攻佔了南京、杭州、上海及東南廣大地區。5 月兼任上海市軍管會主任和市長。

第二節　陳毅與毛澤東的關係

陳毅最早聽聞毛澤東的名字是在法國「勤工儉學」時。當時，與陳毅友好的蔡和森曾對陳毅提及毛澤東這個人在湖南創辦新民學會和擔任《湘江評論》[119]主筆的大概。1927 年，毛澤東曾經講過學的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與陳毅所在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同樣在武昌，陳毅因此有機會閱讀到廣爲流傳的《湖南農民革命》

[115]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202－208。

[116]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210－215。

[117] 陳毅，〈建軍報告〉，《陳毅軍事文選》，頁 322。

[118] 淮海戰役是第二次國共內戰三大戰役之一，國軍亦稱「徐埠會戰」。1948 年 11 月 6 日開始，次年 1 月 10 日結束，歷時 55 天。杜聿明（1904－1981）、劉峙（1892－1970）防守的國軍的 5 個兵團部、22 個軍部、56 個師共 55.5 萬人被共產黨劉伯承、鄧小平指揮的華東野戰軍、中原野戰軍消滅及改編，解放軍則傷亡 13.4 萬人。淮海戰役後中共控制了長江以北的華東和中原廣大地區，使國民黨政府政治中心南京及經濟中心上海處於解放軍的直接威脅之下。同時由於在淮海戰役中，蔣中正的黃埔軍系損失大半，造成他在政府內地位的動搖，直接導致他次年的被迫引退。胡居成，（從"小淮海"到"大淮海"——淮海戰役中的粟裕大將），《中國糧食經濟》，期 6（2006 年），頁 46。

[119] 《湘江評論》是五四運動時期聞名中國的湖南學生聯合周報。毛澤東爲主編和主要撰稿人。1919 年在湖南長沙創刊，8 月中旬被湖南督軍兼省長張敬堯查封。總共出了 5 期（號）。該報以「宣傳最新思潮爲主旨」，設有「東方大事述評」、「西方大事述評」、「世界雜評」、「湘江大事述評」、「湘江雜評」、「放言」、「新文藝」等欄目。毛澤東在該報發表 41 篇文章。《毛澤東年譜（1983~1949）》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年），頁 42—44。

此書載有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是陳毅讀過毛澤東的這一篇文章，這是陳毅對毛澤東的言論最早接觸。[120]所以在 1928 年 4 月 28 日於江西寧岡曹市龍江書院，當毛澤東和陳毅第一次見面時，其實陳毅已對毛澤東的思想，已經有初步的瞭解了。

1928 年 5 月 5 日，也是毛澤東和陳毅第一次相見後約一個星期，朱德、陳毅率領部隊在黃坳一舉消滅江西軍閥進攻井岡山的兩個營。這個大勝仗是剛上井岡山的朱德、陳毅部隊給井岡山軍民的一份見面禮。第二天，朱德、陳毅指揮部隊占領了永新城。當陳毅在永新見到毛澤東時，詳細地向毛澤東匯報了部隊和黃坳作戰的悄況，並介紹第二十八團是一支驍勇善戰的部隊。就在這一天，毛澤東寫了一封信給陳毅，信中提到:「相見恨晚，相慰平生，希遇事相商。」[121]陳毅收到信後，甚為感動。因為這三個「相」字說明了毛澤東對陳毅的信任感。而為什麼毛澤東與陳毅才相識不久，就對陳毅充分信賴呢？其實毛澤東從他的弟弟毛澤覃（1905-1935）的口中，對陳毅是有一定的瞭解，他知道陳毅從投身軍事生涯開始，在軍隊中主要擔任黨代表職務，這和毛澤東有相同之處。這在毛澤東看來，他和陳毅有共同語言。另外陳毅在改造南昌起義部隊的過程中的做法和毛澤東改造秋收起義部隊的是有相同之處。毛澤東在領導秋收起義後，這時候原本 5000 人的起義部隊只剩下不足 1000 人，很顯然，如果不改變這種狀況，這支部隊是很難生存下去。毛澤東決定立即對部隊進行整編。首先，進行了組織整編；第二、在部隊中建立黨的各級組織，決定將黨支部建在連上，並且在連以上各級設置黨代表，加強了黨對軍隊的領導。第三、開始在部隊建立民主制度。規定官長不許打罵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加強部隊管理。這就是「三灣改編」是毛澤東把舊軍隊改造成為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的初步實踐。[122]與此同時，毛澤東在率領秋收起義部隊轉戰井岡山途中還依據部隊現存的問題，宣佈了「三條紀律與六項注意」，[123]作為部隊行動的準則。這些做法為把秋收起義部隊改造成為一支新型

---

[120]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37。
[121] 廣日編，《元帥交往實錄系列》，頁 2。
[122] 袁德金，〈毛澤東與陳毅〉，《湖北檔案》，期 3（2004 年），頁 9。
[123] 陳士榘，〈三大紀律、六項注意的由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下），（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年），頁 198。

的人民軍隊。到了井岡山後，毛澤東的這些建軍思想有了新的發展，成爲共軍建設的基本原則。[124]

對於毛澤東的這些建軍思想和做法，陳毅當時雖然還不瞭解，但他在實踐中卻與毛澤東有著類似的做法。由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部隊在歷經「三河壩」戰役後，面臨的部隊狀況和毛澤東的秋收起義部隊差大同小異，都是部隊人員大減，與上級又失聯，造成人心不安，思想混亂，士氣渙散、紀律不佳。因此當 1927 年 10 月部隊抵達江西安遠縣天心圩時，陳毅協助朱德對部隊進行了整頓，次整頓的重點在於思想教育，堅定士兵的信心和加強黨對部隊基層的領導。11 月初，在江西崇義縣西南的上堡地區，朱德、陳毅針對新的情況，對部隊又進行了一次新的整訓。陳毅明確地規定了部隊要聽從命令、服從指揮，不准侵犯群眾的利益、籌款和繳獲的物資要全部歸公。而這些內容與毛澤東所提的「三大紀律、六項注意」的內涵是相通的。南昌起義部隊通過天心圩整頓、信豐整紀、大餘整編和上堡整訓，終於成爲一支既團結、紀律又佳的高素質軍隊，就像毛澤東在「三灣改編」中把舊軍隊改造成爲新型人民軍隊的初步實踐。在此一轉變過程中，陳毅的做法和毛澤東基本上是相同的。從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歷史來看，在農民問題、武裝鬥爭和武裝鬥爭道路的選擇等問題上，全黨存在著極大的分歧。毛澤東對這些問題上的看法，不但沒有得到當時黨中央的支持，反而遭受極大的反對。而「上井岡山」的武裝鬥爭。被一些人攻擊爲「槍桿子運動」，[125]最後，毛澤東被撤銷了黨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和前委書記的職務。所以，在 1927 年末，毛澤東是以孤獨的情懷轉入湘贛邊界農村的。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急需得到一位同情與支持他的人。而毛澤東就在這時發現了陳毅。因爲陳毅和毛澤東一樣曾受到黨內「左傾盲動主義」的危害和指責。就如湘南暴動時，當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部隊取得勝利之際，在 1928 年 3 月上旬，中共湘南特委強令朱德、陳毅去實行：「堅壁清野，燒盡郴(州)宜(章)大道兩側五裏之內的村莊房屋，不給敵人半

[124] 段照明，（三灣改編對當前我軍思想政治工作的啓示），《黨史文苑》，期 2（2005 年），頁 37-38。

[125] 「毛澤東在漢口出席中共中央召開的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強調秋收非軍事不可，此次會議應重視　此問題，新政局的常委要更加堅強起來注意問題，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年譜組編，《毛澤東軍事年譜（1927-1958）》（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3；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一冊（台北：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暨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出版，1973 年）頁 228-284。

點東西的左傾盲動主義的燒殺政策」。[126]。可是朱德、陳毅進行了抵制，提出:「這樣燒殺，無疑是官逼民反，自己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127]也正是在這種左傾盲動主義的干擾，使得朱德、陳毅決定離開湘南轉向井岡山，結果遭到堅決執行左傾盲動路線的湘南特委領導人嘲諷陳毅是「右傾逃跑」、「失敗主義」。[128]這種共同的遭遇，使毛澤東感到陳毅是最能了解並支持自己主張的人。此外，從井岡山會師的兩支部隊的情況來觀察，朱德、陳毅帶來的是歷經大戰鬥共軍組建最早的一支精銳部隊，不僅裝備好，戰鬥力強，並具備了正規作戰經驗；而相較於澤東秋收起義的部隊來說，主要成員大都是農民軍，不僅裝備較差、作戰經驗也相對不足。因此，毛澤東也深切希望能夠得到陳毅在軍事上的支持。 從上述種種因素觀之，毛澤東在與陳毅第一次見面後僅一個星期，他就寫下「相見恨晚，相慰平生，希遇事相商」之辭，也就不足為奇了。毛澤東這種「急尋知音」的背景情懷就像陳毅之子陳丹淮曾在報紙上提及的:

> 也許是陳毅的才華，也許是陳毅是原來朱德黨代表的身份，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也許是毛澤東在農村運動中，既感思想上、文化上的寂寞，忽然遇上陳毅這樣的相似之友，大有他鄉逢知己的感覺。[129]

而陳毅本人對毛澤東又是怎樣的感覺呢?其實陳毅對毛澤東的第一次親身認識是在「八月失敗」中的沉痛教訓獲取的。八月失敗又可稱為「湘南失敗」，[130]此事件發生的時間是在朱德、陳毅率領部隊上井岡山和毛澤東會師之後。1928 年 5 月下旬，陳毅被大家推選為紅四軍軍委書記，這時，他面臨著的最大的矛盾是:主力紅軍是留在井岡山鞏固和發展呢？還是脫離井岡山先出去打游擊呢？毛澤東本人堅持紅四軍主力應該留守在井岡山。可是當時，朱德、陳毅帶上井岡山來的第二十八團、二十九團部隊，雖然善戰不畏敵，但是多數人卻不願意繼續留在井岡山。到了 6 月，湖南省委下達紅四軍立即向湘南發展的指示。[131] 毛澤東為此特別召開了永新會議，決定紅四軍應該繼續在湘贛邊界各縣，建設和鞏固井岡

[126]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33。
[127]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36。
[128] 袁德金，〈毛澤東與陳毅〉，《湖北檔案》，期 3（2004 年），頁 7。
[129] 陳丹淮，〈紅軍時期:陳毅與毛澤東的友誼〉，《光明日報》，1992 年 5 月 30 日，版 2。
[130] 馬於強，〈試述井岡山的"八月失敗"及其經驗教訓〉，《井岡山師範學院學報》，期 1（2004 年），頁 53。
[131] 鄭垣，〈革命搖籃井岡山〉《中國城市金融》，期 2（2006 年），頁 52。

山根據地，因此他建議湖南省委重新討論部隊轉向湘南發展的指示。7 月，朱德、陳毅率第二十八團（原南昌起義軍）、二十九團（原湘南農軍）進取攻克酃湖南縣後，第二十九團官兵完全被地方主義情緒所控制，強烈要回湘南；而第二十八團也想回贛南去。朱德、陳毅曾多次勸阻無效。陳毅爲此寫信報告了特委及毛澤東，但部隊也不聽毛澤東的阻止，身爲軍委書記的陳毅只好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正式決定同意二十九團打回湘南，並取消原軍委。並且因爲毛澤東不願去湘南，大家便推選陳毅爲前委書記，展開了向湘南冒進的路線。結果二十九團在途中一哄而散；而二十八團也由於營長全的叛變損失了一個營，[132]同時井崗山根據地也因兵力太少而丟失。這就是湖南分兵的嚴重後果。[133] 毛澤東在 1928 年 11 月 25 日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提到:「當軍隊由湧渡出向湘南時，原有之軍委取消，組織湖南省委任命之前委，陳毅為書記」。[134]這就是陳毅後來經常被迫檢討，兩次被推舉代替毛澤東爲紅四軍前委書記中的第一次！對於這一點，何長工（1900-1987）曾說了一段較爲客觀的話：

> 陳毅從不否認這個缺點和錯誤，談到這段歷史，總是從路線高度嚴於解剖自己，這種精神是可貴的。但是，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看問題就要分析，把這些錯誤全算到朱德、陳毅頭上是違背歷史的，是不公平的。從歷史事實看，這種改變絕不是陳毅同志出於某種個人動機，積極活動的結果，而是當時湖南省委推行的盲動主義、軍事冒險主義，利用紅軍中的單純軍事觀念，並對朱德、陳毅施加組織壓力造成的。為了避免二十九團孤軍奮鬥為敵所算，陳毅乃決定二十八團同去湘南。[135]

其實，當時的陳毅既爲自己的無能爲力阻止部隊南行而不安，又深感這樣發展下去紅四軍會有分裂的危機，只好在部隊出發前匆匆寫了一封信向毛澤東說明紅四軍發生的情況。他在信中寫道:「潤之若在，必能阻止部隊南行，無論勝敗，都會回來的。帶部隊出去，必定把部隊帶回來。」[136]這句話是陳毅借用了《三國演義)》

[132] 張日新、李祖榮，《紅軍時期的陳毅》（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 年 6 月），頁 38。
[133] 廣日編，《元帥交往實錄系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年 7 月），頁 6。
[134]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43。
[135] 何長工，《何長工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 年），頁 158。
[136] 張日新、李祖榮，《紅軍時期的陳毅》，頁 102。

中，劉備伐吳東行，諸葛亮力諫不能阻止，而嘆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也。」[137]以此表示了他對湘南之行前途的憂心以及他對毛澤東的信任。而正當朱德、陳毅感到最艱難的時候，林彪（1907-1971）派人從桂東梢信來，提到毛澤東將親率第三十一團南下迎接朱德、陳毅部隊回井岡山。陳毅對自己不能制止這次湘南冒進，造成部隊和根據地的損失而深感痛心，更覺得無臉再見毛澤東。而此時的毛澤東也看出了陳毅的心思。因此他對陳毅和第二十八團不但沒有批評，反而安慰他說此次湘南分兵，發動了群眾，擴大了紅軍的影響力，可是毛澤東又忍不住說出：「當時你們不走就好了！」[138]陳毅此時明白，毛澤東之所以抱病親自來接應他，完全是考量大局。因爲井岡山不能沒有二十八團這樣的主力，而二十八團也不能沒有井岡山，因此陳毅下定了重回井岡山的決心並主動承擔湘南失敗的領導責任，取消了由湖南省委命令組成的前委而成立以毛澤東爲書記的行動委員會。[139]而知陳毅者，毛澤東也！對於陳毅在「八月失敗」中的責任看法。而當時毛澤東也明確地說:「八月失敗是湖南省委、特別是湖南省委巡視員杜修經的錯誤」。[140]所以在毛澤東、朱德、陳毅三人取得共識下，紅軍終於又踏上了重回井岡山的路線。在重回井岡山的路途中，毛澤東與陳毅邊走邊談，毛澤東從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談起，分析中國革命的特性，談到陳獨秀（1879—1942）、李大釗（1889─1927）的歷史作用，詳細說明對當時黨內思想尚不統一產生的問題，並表明了堅持在中國從事武裝鬥爭和群眾運動的決心，最後還描述了建立羅霄山脈中段政權的構想，並指出陳毅他們在湘南站不住腳，是由於地處交通要道，敵人過於擴大的原因，還特別指出，現在從上到下都有過「左」的危險。[141]毛澤東這樣推心置腹的談話完全打動了陳毅的心。過去由於陳毅長期在基層，對

---

[137] 袁德金，（毛澤東與陳毅）《湖北檔案》，頁 7。

[138] 原來，當朱德、陳毅率部攻擊娜縣後，毛澤東領著三十一團和永新的赤衛隊與敵軍周旋，以巧妙的游擊戰術不斷困擾襲擊敵人，而技敵雖有 1I 個團的兵力，面對著紅軍神出鬼沒的游擊行動無法判明真實情況，竟久久不敢深人井岡山腹地進攻。但是，當敵人確知紅軍主力不在井岡山以後，特別是確知朱德、陳毅部隊在郴州受挫以後，敵軍便以 11 個團的兵力集中向湘贛邊界開始了猛烈的進攻，最後占領了永、蓮花、寧岡，三十一團不得不退到永柔佛巴魯區。這一時刻，毛澤東是多麼想念遠在湘南的紅軍，因爲如果紅軍不去湘南,就能集中兵力，那不僅不會丟失永新等地區，還有可能乘機把荆據地區推進到吉安、安福、萍鄉和平江、瀏陽連接起來。失去殲敵的良機，毛澤東深感遺撼。所以，發出了“當時你們不走就好了”的感嘆。袁德金，（毛澤東與陳毅）《湖北檔案》，頁 8。

[139] 張日新、李祖榮，《紅軍時期的陳毅》，頁 102。

[140] 毛澤東，（井岡山上的鬥爭），《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年），頁 25。

[141] 廣日編，《元帥交往實錄系列》，頁 4。

中共中央的情況知之甚少，此番聽到毛澤東提到的觀點，他感到既新奇又欽佩。這次與毛澤東的長談成爲陳毅思想飛躍的起點，對陳毅的影響是難以估計的。所以在 40 多年後的「文革」，陳毅遭到毛澤東誤解時，他對孩子們回憶起與毛澤東的談話，他仍是充滿激情地說：「這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觀點，從沒有任何一個其他領導人這樣講述過。彷彿就在昨天說的一樣。」[142]

1928 年 9 月紅四軍恢復了井岡山根據地，12 月彭德懷（1898—1974）率領平江起義的紅五軍也來到了井岡山，井岡山紅色根據地又蓬勃地發展起來。但是國軍的軍事會剿和經濟封鎖也更加嚴重。爲此，前委決定由彭德懷留守井岡山，堅持內線作戰。而由朱德、毛澤東率領紅四軍主力出擊贛南，實施外線機動作戰，毛澤東仍任前委書記。當時由於紅軍尚無外線作戰經驗，又缺少群眾基礎，遇到十分嚴重的因難。1929 年 1 月至 4 月，紅四軍輾轉作戰，直到爆發蔣桂大戰，各省會剿部隊紛紛退兵，紅四軍得到一個喘息與發展的機會。可是這時在黨、軍內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潮也隨之蔓延開來。紅四軍的領導人試圖在理論和實踐中摸索和總結出如何建設一支屬於中國式的紅軍，因此在思想頗爲紛雜，經常有各種爭論在部隊中展開。這些爭淪大都涉及到如何建軍、黨在軍隊中的領導作用以及紅軍武裝鬥爭的原則等大問題。[143]

1929 年 4 月，中共中央派劉安恭（1899─1929），信中對紅四軍在農村割據的前程頗爲悲觀，因此要求紅四軍在大敵當前時分散成小股的游擊隊，轉入民間。至於對毛澤東和朱德今後的去向，中共中央的指令要求：「毅然地脫離部隊速來中央。」[144]劉安恭此人是剛從蘇聯學習歸來，思想路線完全是脫離中國革命的實際，他帶來的「二月來信」在紅四軍內部造成了極大的混亂，甚至引起一部分人擁毛或擁朱的派系現象。就在這種思想分歧，團結渙散的時刻，前委決定召開紅四軍的第七次黨代表大會。由於陳毅是各方面部能接受的人物，又正在代理前委書記，所以這次大會就由他負責來召開。毛澤東很重視這次黨代表大會，他期望能在他所主張的路線上統一紅軍思想。於是他滿懷希望

---

142 廣日編，《元帥交往實錄系列》，頁 5。
143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54。
144 鄧澤村，〈從"九月來信"對"二月來信"的糾正看黨的品格特性〉，《龍巖師專學報》，期 2（2005）頁 39。

地找陳毅談話，要求陳毅能支持他，在大會上做出一個好的決議。但是陳毅一方面對這些爭論的意義認識不足，也害怕紅四軍因此而分裂，所以他採取了息事寧人的做法；另一方面由於他想要表明自己獨特的見解，因此並沒有採納毛澤東的意見。6 月 22 日，紅四軍「七大」召開了，陳毅在大會上作了報告，表達了白己對革命形勢估計、建軍方針和克服黨內些錯誤思想等問題的看法，並批評朱德這個人尙存舊軍官思想，不重視思想政治工作，對劉安恭的宗派活動姑息；進而批評毛澤東有個人英雄主義和家長制領導方式。陳毅甚至抱怨：

> 你們朱毛吵架，一個晉國，一個楚國，兩個大國天天吵，我這個鄭國在中間簡直不好辦。我是進出之間為難，兩大之間為小。我跟哪個走？站在哪一邊？就是怕紅軍分裂，希望你們兩方團結起來。[145]

其實陳毅是很敬佩毛澤東和朱德的，但他認爲革命同志是可以批評的。毛澤東在會上重申了自己的各項政治主張後說：「至於陳毅對我個人有許多批評，我現在不辯解。如果對我有好處，我會考慮的，不正確的將來自然會證明它不正確」。[146]陳毅的發言在會議上引起了強烈的共鳴，在會議結束的選舉上，沒想到大多數人選舉陳毅當前委書記，居然把毛澤東選了下來。因此紅四軍的「七大」沒能夠解決紅四軍存在的種種問題，反而引起了領導層的波瀾，這大出陳毅個人的意料。而他因有湖南八月分兵的前車之鑑，自知難以擔任前委書記的重責大任，因此對外宣稱這只是「過渡內閣」。[147]會後毛澤東對陳毅極感失望，憤而離開紅四軍到蛟洋養病。這次近乎奪權的會議給毛澤東很大刺激，因爲這是他一生中僅有的由下屬「造反」成功的例子。[148]雖然在此之前，毛澤東曾多次遭到別人的打擊，甚至被撤職，但那畢竟是由中共中央，由黨內地位比他高的人所做的事。而這次陳毅「由下而上」的奪權，是他難以容忍的。1929 年 7 月，中央來信要紅四軍派領導幹部去上海參加軍事會議，彙報紅四軍情況。此時的陳毅並沒有意識到毛澤東對他的憤恨，仍以毛澤東爲自己的上級。他和朱德一起趕到蛟洋召開前委會。會議決定由陳毅前往上海。陳毅請毛澤東回來主持前委工作，毛澤東嚴辭拒絕。這時

---

145 蕭思科，〈歷史上的“朱毛之爭”〉，《領導科學》,期 4（2000 年）,頁 42。
146 廣日編，《元帥交往實錄系列》，頁 9。
147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59。
148 廣日編，《元帥交往實錄系列》，頁 9。

陳毅才感到問題有些嚴重了。他臨去上海前，又專門去請示毛澤東，可是毛澤東仍是對他反應冷淡。7 月下旬陳毅化裝由香港轉道上海。在路途上多次聽到群眾議論「朱毛」，才知道紅四軍的政治影響已超過了蘇區的邊界，在全國引起了相當大的轟動。到了上海，陳毅向中央政治局詳細彙報了紅四軍的情況和「七大」的結果，接著，他又參加了中央的一些會議，更加清楚地看到紅四軍已成爲中國共產黨武裝鬥爭的旗幟；同時他也感受到當時的中央領導人的理論和實踐都沒有達到毛澤東的水準。他更加清楚在「七大」上選掉毛澤東不僅阻礙了紅軍的發展，甚至會影響到中國革命。因此在中央政治局的決定下，陳毅與李立三（1899-1967）、周恩來成立了 3 人委員會，專門解決紅四軍的問題，經過一個月的研究和討論，陳毅代中央起草了著名的「九月來信」〈中共中央給紅四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信中最有決定性的精神，在於毛澤東仍爲前委書記，毛澤東爲紅四軍的核心，充分肯定了毛澤東路線的正確，並且批評了七大」錯誤的部分，並要求朱毛團結起來，召開一次會議，澄清思想，分清是非，統一認識，最好能做出一個文字決議，使大家有章可循，按規定辦事……。[149]最後周恩來同意並批准了這封信。[150]當時中央考慮安排陳毅到其他根據地工作，但陳毅說:「還沒有把毛澤東請回來。等辦好了這件事再考慮工作問題」。[151]10 月 22 日陳毅帶著嶄新的認識和中央精神回到了紅四軍。在粵北見到朱德，他簡單地講述中央要請毛澤東回來領導。朱德說:

> 我服從中央的指示‧‧‧‧毛澤東對你最不滿意，你走後，我們又開了個「八大」，很多政治工作人員紛紛要求毛澤東回來工作，於是我們請了他，但是老毛不肯回來，還寫了一封信把責任推在你的頭上，引起了代表的不滿，就不請他回來了。[152]

朱德將毛澤東的信交給陳毅，毛澤東在信中寫道：

> 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嚴正督促工作，這是陳毅主義的眼中之釘。陳毅要我

---

[149] 中央檔案管編，《中共中央檔選集》，第 5 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 年），頁 489。
[150] 孟慶春，〈“九月來信”也是周恩來自身對中國革命特徵的正確分析〉，《理論探討》，期 5（2006 年），頁 157；喻國榮，〈中央“九月來信”與紅四軍建設〉，《長沙交通學院學報》,期 4（1996 年），頁 29；
[151] 王永欽，〈“回去後要請毛澤東復職”〉，《湘潮》，期 4（2001 年），頁 29。
[152] 蕭思科，〈歷史上的“朱毛之爭”〉《領導科學》,頁 43。

做八面美人，四方討好，我辦不到。我不能夠隨便回來，這個路線問題不解決，我就不能回來。[153]

陳毅看完這封措詞激烈的信，心情十分沉重。他想不到「七大」對毛澤東是如此嚴重的傷害、想不到毛澤東竟用 「陳毅主義的眼中之釘」來形容他們之間的關係，更沒有想到毛澤東的原則性是如此堅定。當天晚上陳毅召開了前委會議，傳達了中央「九月來信」，批評「七大」和「八大」的錯誤。會後即派人將「九月來信」送到毛澤東住處。並附上親筆信請毛澤東回來工作。11 月 26 日，毛澤東終於回到紅四軍軍部，在汀州與朱德和陳毅再次相見，互相作了檢討。陳毅對「七大」之事承認了錯誤。毛澤東除了承認自己的情緒不佳外，也讚揚中共中央的「九月來信」寫得很好。後來毛澤東在給中央的信中寫道:「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軍黨內的團結在中央正確指導下，完全不成問題。陳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達到」。[154]12 月 28 日，具有歷史意義的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召開了，大會仍由陳毅主持。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大會一致通過了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155]在會議中大家認真的總結紅軍自創建以來，在與各種錯誤思想作鬥爭的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統一了思想，在會中一致通過了多種決議案，其中最重要的是關於糾正黨內錯誤思想的決議，這些決議案有系統地解決了中共建黨建軍的一系列根本問題,[156]同時毛澤東也再次當選爲前委書記。至於陳毅的今後的去向，毛澤東堅決地表示:「你哪裡都不要去，就留在這兒」。[157] 一場有關紅四軍建軍路線的爭論圓滿的落幕。而 1929 這一年就成爲陳毅走向思想理論成熟的關鍵年。但是「七大」事件畢竟充分反映出毛澤東和陳毅之間極不協調的性格差異。

1930 年，大敵當前，但是，在第三次「左」傾思想的控制下，中央蘇區從地方到紅軍的肅反運動大規模地展開了。紅一方面軍肅反委員會的主任李韶九，藉機大整陳毅，說他是 AB 團的團長，整整整了陳毅達三年之久。，陳毅在困難中

---

153 廣日編，《元帥交往實錄系列》，頁 11。
154 毛澤東，〈致中共中央〉(1929 年 11 月 28 日)，《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 10 月) 頁 26。
155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檔選集》，第 5 冊，頁 800－834。
156 熊宣忠,〈試論"古田會議"的現實指導意義〉,《福建黨史月刊》,期 7 (2005 年)，頁 72。
157 盛永年，〈風雨至交——毛澤東與陳毅的友誼〉,《黨史縱橫》,期 7 (1994 年)，頁 4。

想到了毛澤東，認爲只有毛澤東才能將他救出苦海，他寫信報告了毛澤東，過了兩天，毛澤東回信，表示支持陳毅的工作，批准他把那些被打成 AB 團的人，分別輕重，予以釋放。1932 年 5 月，陳毅、李富春（1900-1975）等受命組成江西省肅反委員會，對過去在肅反工作中的問題進行全面追查，對於那些被指控爲 AB 團分子遭到誤害的紅軍官兵，一一給予平反，家屬按規定予以優恤。隨著肅反運動的平息，任意扣在陳毅頭上的 AB 團團長的帽子終於不摘自掉。[158] 1968 年 10 月，陳毅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小組會上曾談到了這件事。他感激地說:「當時如果不是毛主席支持我，他們就把我槍斃了。」[159]1933 年 6 月，中共中央第三次「左」傾領導人在江西軍區召開第二次「寧都會議」，[160]再次打擊毛澤東。作爲江西軍區負責人的陳毅出席了這次會議，他在發言中充分肯定了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創造紅軍的功績，並以 1 至 3 次反圍剿作戰爲例說明毛澤東在戰略方面的高明，堪爲全軍之首。這種支持毛澤東的論調，當然引起左傾分子對陳毅的不滿。同年 7 月，江西省委繼續批判毛澤東，想要清除他在紅軍中的影響，陳毅冒著不怕被打成「機會主義」的風險，頂住了巨大的壓力，拒不上臺發言批判毛澤東，展現了陳毅與毛澤東的至深的情誼。

1943 年 10 月饒漱石（1903-1975）爲排擠陳毅，借整風之機製造所謂的「黃花塘事件」，[161]他致電毛澤東、劉少奇，挑撥毛、劉與陳毅的關係，陳毅因此也被迫致電中央陳述事情經過，並提出去延安學習的要求。毛澤東因此決定調陳毅來延安參加「七大」。陳毅在 1944 年 3 月上旬抵達了延安，自從 1934 年中央機關和主力紅軍踏上慢慢長征與毛澤東一別，陳毅已經將近十年未見到毛澤東。陳毅一見到毛澤東除了要系統匯報華中抗戰的形勢外，他更有「黃花塘事件」中的滿腹委屈急於向毛澤東傾訴吐。可是當時毛澤東卻對他說：

---

[158] 劉建美，〈五次蒙受奇冤的陳毅〉，《文史精華》，期 7（2002 年），頁 4。

[159] 白羽車，〈陳毅兩次遇險記〉，《文史天地》，期 7（2006 年），頁 13。

[160] 「寧都會議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兩人歷史恩怨的根子。‥‥毛在會上被批判鬥爭後離開軍隊，由周取而代之，度過了他一生中最失意落寞的一段日子。毛對此一直耿耿於懷，怨恨難消。」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5 年），頁 26－42。

[161] 1942 年，新四軍軍部轉移到淮南盱眙地區的黃花塘。是年，根據黨中央統一安排，軍部進行了整風運動。時任新四軍代理政委的饒漱石認爲排擠陳毅的機會到來，於是借整風之機私下以軍部名義打電報到延安，羅列出陳毅反對黨中央、毛澤東的十大錯誤，史稱「黃花塘事件」。這次事件由於毛澤東的干預沒有公開化，但它卻像一個噩夢一直纏繞著陳毅。直到全國解放以後，「高饒反黨集團」事發，陳毅纔討回清白，如釋重負。羅英才，〈陳毅在黃花塘事件〉，《縱橫》，期 3（1999 年），頁 27~33。

如果你談三年游擊戰的經驗，談華中抗日的經驗，那很好，我可以召集一個會議，請你談三天三夜。至於與小饒的問題，我看還是不要提，一句話也不要提。關於這件事，華中曾經有個電報發到中央。這電報還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給你看，但我看暫時不要看為好。[162]

陳毅明白毛澤東的用意，立即表態不談與饒漱石之間的是非。毛澤東贊許道：「我歡迎你這個態度」。[163]毛澤東後來在續發的電報中以中央公正的角度，對陳饒矛盾作了公正的仲裁:

關於陳、饒二同志間的爭論問題，僅屬於工作關系性質。在陳動身前，兩同志已當面談清，現已不成問題。中央完全相信，在陳、饒二同志及華中局、軍分委各同志的領導下，必能協和一致，執行中央路線爭取戰爭勝利。關於內戰時期在閩西區域的爭論，屬於若干個別問題的性質，並非總路線的爭論，而且早已正確地解決了。關於抗戰時期皖南、蘇南的工作，陳毅同志是執行中央路線的，不能與項英同志一概而論。無論在內戰時期與抗戰時期，陳毅同志都是有功勞的，未犯路線錯誤的。如有同志對以上兩點不明了時，請漱石同志加以解釋。[164]

4 月 9 日，毛澤東回覆了陳毅一信：「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點，增益其所不能；照顧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則，多多原諒人家。忍耐最難，但作一個政治家，必須練習忍耐，這點意見，請你考慮」。[165]至於陳毅在「黃花塘事件」中所受到的冤屈最後終於在後來所發生的「高饒事件」[166]得以沉冤昭雪。1953 年 12 月，中央政治局及時揭露了高崗（1905-1954）、饒漱石（1903-1975）的反黨分裂活動。饒漱石的真面目終於暴露無遺。陳毅應召從上海到北京開會，被毛澤東叫到西郊玉泉山別墅去談話。毛澤東要陳毅談談對饒漱石個人的看法。由於陳毅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所以他尚未得知高饒問題已暴露，再加上自己與饒漱石長期以來一直有隔閡，又回想到當年在延安時毛澤東爲維護團結，制止他談饒漱石問題的那

[162] 周蕙、儲文瑞，〈陳毅與黃花塘事件〉上，《江淮文史》，期 2（1994 年），頁 71~86。
[163] 周蕙、儲文瑞，〈陳毅與黃花塘事件〉上，《江淮文史》，頁 71~86。
[164] 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頁 10。
[165] 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頁 127。
[166] 李旭，〈高饒反黨聯盟事件後的饒漱石〉，《黨史博覽》，期 11（2004 年），頁 50~54。

段歷史，便按一般情況盡量多講同級幹部優點的習慣，無關緊要的講了一些饒漱石的長處。 豈料毛澤東聽完後表情淡漠。陳毅告辭退出，在門外，遇到了中央辦公廳的負責人告知毛想聽的是關於饒漱石問題實情。陳毅聞言，當即返回毛擇東房裡，向毛澤東說明自己剛才的顧慮，並把自已對饒漱石的真實看法全盤托出。此後，毛澤東又約陳毅談話。在談到饒漱石爭當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一事時，毛澤東告誡陳毅:「不要傷風」。[167]要求陳毅保持政治嗅覺的靈敏。毛澤東還責備陳毅說:「你推讓，是不對的。謙遜並非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好的。野心家就不讓。讓給他就使黨受損失」。[168]是年春，陳毅由北京返回南京途中，感觸紛來，針對饒漱石的問題，他寫下了著名的《感事書懷》一詩：

手莫伸，

伸手必被捉。

黨和人民在監督，

眾目睽睽難逃脫。[169]

七屆四中全會以後，毛澤東在同陳毅的一次談話中，意味深長地引用了兩句諺語:「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170]對「黃花塘事件」作出最後的評價。

1954 年 9 月起，陳毅調到中央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等職務，直接在毛澤東的身邊工作。1956 年陳毅在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爲中央政治局委員。1958 年初，毛澤東解除過多強調緩和的外交部長周恩來的職務，改換了軍人出身的陳毅，以貫徹其外交上的強硬方針。[171]陳毅正式以副總理兼任外交部長。因此，陳毅的主要任務便轉到外交戰線上來了。陳毅在日記中寫道:「我之工作轉到政府方面和外交方面，已完全解決了。盼念前途，實有埂短汲深之懼」[172]但是，毛澤東聽了以後卻認爲陳毅「臨事而懼」正是其優點。事實上，在 1958 年以前，陳毅就已經參加了許多外事活動，並受到了毛澤東的信任和贊賞。1957 年 5 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伏羅希洛夫（Klim Voroshilov 1881-1969）來訪，毛澤東和陳毅都參加了宴

167 周蕙、儲文瑞，〈陳毅與黃花塘事件〉下，《江淮文史》，頁 42。
168 周蕙、儲文瑞，〈陳毅與黃花塘事件〉下，《江淮文史》，頁 42。
169 孔令銅，〈從《含羞草》到《手莫伸》〉，《中國監察》，期 13（2006 年），頁 63。
170 周蕙、儲文瑞，〈陳毅與黃花塘事件〉下，《江淮文史》，頁 43。
171 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的關係（1920~1960）》，（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 年），頁 655。
172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296。

會。在宴會上毛澤東介紹陳毅日後將主持外交工作時說到:「他是多年同我一道工作很好的同志」[173]給了陳毅極大的鼓勵。因此當陳毅把精力轉移到外交陣地以後，他全力以赴，充分的施展自己的外交才能。他積極的配合毛澤東折衝尊俎於國際舞臺上，以下有幾件關於外交方面的戰鬥，是毛澤東借重陳毅外交才華的事例：

第一、關於炮擊金門事件：

1958 年夏天爆發了中東危機，對美國在全球圍堵共產主義的戰略防線產生了重大的影響。7 月 15 日，美國出兵黎巴嫩，英國亦藉機出兵約旦。[174]針對美、英軍事干涉黎巴嫩和國軍對大陸的騷擾及破壞活動，毛澤東決定炮擊金門。基本上，毛澤東決定大規模砲擊金門，是採取「走一步，看一步」[175]的方針及「直接對蔣，間接對美」[176]的策略，他主要就是試探美國軍事介入的底線，針對美國的反應，再決定下一步的行動。原則上，他不希望與美國開戰。[177]在外交上，陳毅積極配合毛澤東此一政策。9 月 4 日，美國總統艾森豪（1890－1969）授權杜勒斯（1988－1959）發表聲明，威脅要把美國在台灣海峽的侵略範圍擴大到金門、馬祖等沿海島嶼。9 月 8 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了著名「絞索戰略」談話，指出:「台灣、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國在外國的軍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國主義脖子上的絞索」。[178]

10 月 6 日清晨，毛澤東寫就〈告台灣同胞書〉，[179]立即請陳毅等去研討，大家一至認爲毛澤東寫得非常精彩，於是決定當天就以國防部長彭德懷（1898－1974）名義公開發表。文章宣佈：「從當日起，在國民黨船隻無美國艦護航條件下，停止炮擊 7 天，以便國民黨方面向島上輸送供應品」。[180]更進一步打出民族大義口號指出：「中國內部的戰爭，同胞間可以談判，和平解決，不要美國來插手。」[181]〈告台灣同胞書〉一播出，台、澎、金、馬等島震動不已，美、蔣矛盾遭到激化，

[173] 袁德金，(毛澤東與陳毅)《湖北檔案》，頁 14。
[174] 齊茂吉，《毛澤東和彭德懷、林彪的合作與衝突（1954-1971）》（台北：新新聞出版社，1997 年），頁 52。
[175] 徐焰，《台海大戰上編：中共觀點》（臺北：風雲時代出版有限公司，1992 年），頁 216。
[176] 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年），頁 348。
[177] 齊茂吉，〈五 O 年代毛澤東對台灣問題的思考與轉變〉，《兩岸發展史研究》，期 1（2006 年），頁 111。
[178]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 1949－1976》，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 年），頁 869。
[179] 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420-422。
[180] 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 420-422。
[181] 袁德金，(毛澤東與陳毅)，《湖北檔案》，頁 13。

使美國騎虎難下。陳毅在當時就說:「毛主席的文章做得很妙。我們在金門打打停停，不是『送瘟神』，而是要『留瘟神』，杜勒斯脫身不得還得替我們約束蔣介石不要闖禍」。[182]後來毛澤東審度時勢，決定放棄國軍自金馬撤軍，而採取讓金馬留在蔣介石手裡的「絞索政策」，顯然這時的美國已成爲中共主要的敵人，蔣介石則是次要的敵人。[183]基於聯合次要的敵人打擊主要的敵人的統戰考慮，善於利用矛盾的毛澤東當然見機見縫插針，分化美國與台灣的關係，以擴大美國與蔣介石的矛盾。毛澤東以炮擊金門的軍事行動向美國發動外交攻勢，既要達到施加壓力的目的，又要防止美國真的捲入軍事行動。陳毅這時精闢地指出:

> 第一、炮擊金門是軍事鬥爭，也是政治鬥爭，以政治鬥爭為主;第二、在台灣海峽問題上是三家矛盾，以中美對抗為主，同時擴大美蔣矛盾;第三、台灣海峽的鬥爭是長期的，用金門、馬祖留住蔣介石，拖住美國人，貫徹毛澤東提出的絞索政策。[184]

而炮擊金門的直接結果，是促使中共和美國大使級會談的恢復，以及美國不得不宣佈從台灣地區撤出部分海、空軍，並且不得不遵守共軍不允許美艦爲蔣艦護航的規定。[185]這是陳毅在外交上協助毛澤東實現其戰略目的的一次成功實踐。

第二、關於中蘇之間的分歧：

1959 年 9 月 30 日，赫魯雪夫（1894-1971）才結束對美國的訪問，就匆匆趕到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周年慶典。當晚，他在國慶宴會上即席發表了四十分鐘演講，並以教訓的口吻要中共不要「用武力去試試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定性」，[186]當時在場的外賓有北越領袖胡志明（1890-1969）及北韓領袖金日成（1912-1994），宴會氣氛頓時變的異常僵硬。[187]10 月 2 日，赫魯雪夫與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陳毅等在中南海懷仁堂進行長達七小時的會談。他不但對中共在 1958 年炮擊金門給蘇聯造成了困難而抱怨不止，並且對中共對台政策

---

[182] 何曉魯，《元帥外交家》，頁 48。
[183] 齊茂吉，〈五 O 年代毛澤東對台灣問題的思考與轉變〉，期 1（2006 年），頁 128。
[184] 袁德金，(毛澤東與陳毅)《湖北檔案》，頁 14。
[185] 逄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 847-884。
[186] 胡居成，〈陳毅與外國領導人交往二三事〉，《陳毅與外國領導交往二三事》，頁 59。
[187] 齊茂吉，《毛澤東和彭德懷、林彪的合作與衝突（1954-1971）》，頁 55。

也表示相當不滿意，他指責中共是「冒險」、「好戰」份子。[188]陳毅立即跳起來反駁說:「炮擊金門是我們內部的事情，那是中國的領土，你難道還要替蔣介石和美帝國主義指責我們嗎？」[189] 赫魯雪夫對著陳毅叫囂：「好！知道你是元帥，我是中將，軍事上我得服從你，但現在黨內我是第一書記，你只是政治局委員，你應當聽我的！」[190]陳毅不甘示弱的回答：「你是第一書記不錯，但你講得不對我們就不聽你的，這是兩個黨在談問題嘛！」[191]這次會談就在這樣的氣氛中不歡而散。當赫魯雪夫離開中國到達海參崴時，公開諷刺中國人「像好鬥的公雞」，[192]並在其回憶錄中說:「這一次，中國方面決定放出陳毅來攻擊我，談判一下子就激昂和緊張起來。」[193]他對於陳毅竟敢當眾頂撞他，可說是又羞又怒的。

第三、關於中印邊界的衝突：

毛澤東在 1958 年曾公開說：

> 對印度宜適可而止，應該爭取尼赫魯，中印友好是長期的，爭論是暫時的。我們不能有兩個重點，敵人名美國在東方，友人名印度在西方，不要弄錯了方向，認敵為友，認友為敵。中印爭吵是必要的，可以分清是非，尼赫魯不是帝國主義分子，是反帝國主義的，與印度右派及擴張主義分子不同。我軍不挑釁，不示弱，印來攻，即退之，不追擊，不出擊，看印度如何。[194]

根據毛澤東對印度的這些思想，9 月 13 日，陳毅在人大常委擴大會議上發表了講話，一方面批低調批評印度政府「企圖把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的產物強加於中國、用武力侵佔中國的領土，掀起狂熱的反華運動」;另一方面又表示：「中印爭執，從長遠來看，不過是兩國千年、萬年友好過程中的一個小插曲。」[195] 陳毅就是如此忠誠地執行毛澤東的外交思想，故能成爲毛澤東外交折衝上的好幫手。可是此時被毛澤東賦予外交重任，一展鴻志的陳毅，他哪裡會想的到在幾年後「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被打成「黑將軍」，與毛澤東的關係降至冰點，幾乎被吞噬，

---

[188] 齊茂吉，《毛澤東和彭德懷、林彪的合作與衝突（1954-1971）》，頁 55。
[189] 胡居成，〈陳毅與外國領導人交往二三事〉，《黨史陣覽》，期 10（2006 年），頁 18。
[190] 胡居成，〈陳毅與外國領導人交往二三事〉，《黨史陣覽》，頁 18。
[191] 何曉魯，《元帥外交家》，頁 54。
[192] 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的關係（1920~1960）》，頁 657。
[193] 胡居成，〈陳毅與外國領導人交往二三事〉，《黨史陣覽》，頁 18。
[194] 毛澤東，《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共中央文獻研出版社，1994 年），頁 232。
[195] 何曉魯，《元帥外交家》，頁 76。

而最後惡疾纏身，抑鬱以終。

第三節　陳毅與周恩來的關係

周恩來與陳毅是在留法勤工儉學中認識的。1921 年 6 月 30 日周恩來、陳毅等三百多人在巴黎召開了旅法各界代表參加的「拒款大會」。透過反對北洋政府秘密借款的鬥爭，他們兩人都成爲勤工儉學學生中公認的領導人物。而法國一別後，又逾數載。兩人再度相見已是 1927 年 5 月。當時被派往川軍中工作的陳毅來到了武漢，向任職中央軍事部長的周恩來作軍事匯報，周恩來後來決定派陳毅到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做政治工作。因此陳毅就以校政治部准尉文書的公開身分組成該校中共黨委，任書記。8 月 1 日南昌起義後，陳毅的身分已經曝露，因此決定迅速離開教導團，追趕南昌起義部隊。8 月 10 日，他們在宜黃追上起義軍，見到了前委書記周恩來。周恩來分配陳毅任第二十五師七十三團的團指導員，並叮囑：「這個團是我們黨最早建立的的一支武裝，有鐵軍、鐵團之稱」、「派你做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196]陳毅答道「什麼小不小哩！你叫我當連指導員我也幹。只要拿武裝我就幹」！[197]陳毅後來果然沒有辜負周恩來的期許，經過輾轉曲折、艱難險阻，這支南昌起義留下來的部隊，在 1928 年 4 月與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在井岡山會師，隨後兩支部隊合編爲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此後，陳毅協助毛澤東、朱德開創了井岡山根據地，探索農村包圍城市的戰鬥歷程。1928 年「六大」之後，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及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周恩來，對工農紅軍第四軍非常重視。8 月下旬，根據中央的指示，陳毅代表紅四軍來到上海，向中央報告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在 29 日舉行一次臨時會議專門聽取陳毅的報告，並決定組織以周恩來、李立三、陳毅三人組成的委員會，負責起草對紅四軍工作的指示文件。早在接到紅四軍前委於 7 月 9 日寄出的“七大”決議案及其它文件之後，8 月 13 日，中央政治局就討論決定由周恩來起草一信，提交政治局討論。恩來起草的信是 8 月 21 日由中央政治局通過發出的。這封信很重要，對於紅四

---

[196] 廣日編，《元帥交往實錄系列》，頁 30。
[197]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26。

軍黨內爭論中涉及的一些原則問題作出了比較全面正確的回答。5 月份的這些回答，在李、周、陳的 9 月討論中，當然要起重要作用。從 8 月 21 日的信到「九月來信」，內容中最重大的問題是紅軍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以及朱、毛紅軍在全國的影響。8 月 21 日信已有：「**現在朱、毛紅軍對于全國的政治影響較對於閩西一處大的多多**」;「九月來信」更有：「**紅軍第四軍……在全國政治局勢中有極大影響**」。[198]

「九月來信」是在周恩來主持下，三人一起討論，由周恩來代表中央委託陳毅執筆起草的。陳毅按照周恩來多次談話的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一封指示信。 經周恩來審定後，帶回紅四軍。這便是本文在第二節中提及的「九月來信」〈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這一封信一開始就分析了當時的政治形勢，指出導致軍閥混戰的各種矛盾是無法克服的，因此軍閥混戰必將繼續發展。紅軍存在於這種形勢下和土地革命向前發展的過程中，加上中國地勢遼闊的條件，必將能堅持和發展。並由此作出一個對中國革命運動有重大意義的論斷:「**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199]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徵，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如有人懷疑紅軍的存在，他就是不懂中國革命的實際，是一種消極觀念。[200]指示信對紅軍的根本任務作了明確的規定：一、發動群眾鬥爭，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二、實行游擊戰爭，武裝農民，並擴大本身組織;三、擴大游擊區域及政治影響於全國。紅軍若不能實現上面三個任務，則與普通軍隊無異。[201]它指出紅軍一切行動是要避免單純的軍事行動而要與群眾鬥爭取得密切聯繫。有了廣大群眾在紅軍的周圍，紅軍的一切困難及本身發展便將較順利地得到解決。指示信提出了在紅軍中「糾正一切不正確的傾向」的任務，指出紅軍的來源只有收納廣大的破產農民，他們自然會有極濃厚的非無產階級意識表現。這些觀念不肅清，於紅軍前途有極大危險。前委應堅決以鬥爭的態度來肅清之。再一個重大問題是紅軍分散與集中的戰略問題。在這一方面，周恩來先後起草或修改過「二月

---

[198]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59。
[199] 孟慶春，（“九月來信“也是周恩來自身對中國革命特徵的正確分析），《理論探討》，期 5（2006 年），頁 157。
[200] 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紀錄，1930 年 8 月 3 日。轉引自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 1898~1949》上，頁 197。
[201] 孟慶春，（“九月來信“也是周恩來自身對中國革命特徵的正確分析），《理論探討》，頁 157。

來信」、4 月 4 日的信、6 月 12 日「堅決改變此(紅軍分散)原則」的信。直到如今，在「九月來信」中寫上了：「絕不能把紅軍四軍分成幾路各不相屬的部隊，這樣就是分散而不是分兵，或者把紅軍四軍分小，化成無數的游擊隊而不相聯屬。兩者都是取消觀念，皆原於對政局的估量不正確，恐懼反動勢力穩定，紅軍會被消滅，才發生減少目標各個自了的右傾思想。這種傾向於紅軍發展及對全國政治影響有極大危險」。[202]親自經歷這戲劇性轉變的周恩來、李立三，當然會告訴陳毅 6 月 12 日他們討論前委 (毛澤東)4 月 5 日來信的情況，以及寫上這一段的意義，除了有助於解決紅軍中某些幹部存在的此種錯誤思想外，實際上也是中央對此的自我批評。只有在這時候，陳毅才更能體會毛澤東政治上的智慧。以上這些重大問題，正是當時紅軍與階級敵人艱苦鬥爭的政治路線的主要內容。從這樣的高度看問題，單純軍事觀點、流寇思想、小團體主義等等就比較容易在思想上解決。保證紅軍在黨的絕對領導下鞏固發展的偉大意義也更加清楚了。指示信還強調了加強黨對紅軍領導的問題，黨的一切權力集中於前委指導機關，這是正確的，絕不能動搖，不能機械地引用「家長制」這個名詞來削弱指導機關的權力，來作極端民主化的掩護。最後周恩來對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和前委擴大會在處置紅四軍領導內部分歧問題時的缺點提出了四點批評:

> 第一、紅軍是生長於敵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應是對付敵人。前委沒有引導群眾對外鬥爭，自己不提辦法。而將問題交下級討論，客觀上有放任內部鬥爭。關門鬧糾紛的精神;第二、沒有從政治上指出正確路線，使同志們得到一個政治領導來判別誰是誰非。只是在組織上來回答一些個人問題，第三、這次擴大會議，代表大會的辦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權力，客觀上助長了極端民主化的發展;第四、對朱、毛問題沒有顧及他們在政治上責任的重要，公開擺到群眾中。沒有指導地任意批評。而一般同志的批評大半又是一些唯心的推測，這樣不但不能解決糾紛，而且只有使糾紛加重。並且指出:朱、毛兩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澤東應仍任前委書記，並須使紅四軍全體同志瞭解並

[202]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60。

接受。[203]

中共中央這封指示信在十月二十日由陳毅送達紅四軍前委。臨行前周恩來囑咐陳毅:「解鈴還需繫鈴人。回去後，要請毛澤東復職，並召開一次黨的會議，統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決議，維護毛澤東和朱德的領導」。[204]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回到前委。前委根據中央九月來信的精神。決定召開紅四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集中解決紅軍的建軍原則問題。十二月底，這次代表大會在福建上杭東北的古田召開。這次大會並選舉產生了新的紅四軍前委，毛澤東爲書記，朱德、陳毅等十一人爲委員。紅四軍不僅渡過了危機。並且進一步解決了以農民爲主要成份的軍隊，如何建成無產階級的新型人民軍隊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從而在新的基礎上向前發展。這在中國人民 軍隊的建軍史上，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而在這整個過程中。周恩來主持起草的中央九月來信，對統一紅四軍黨內的思想、順利召開古田會議所起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而對陳毅而言，這次的上海之行，把全國形勢、中央指示、毛澤東的幾封重要信件和陳毅全身心參與的紅四軍的實踐結合起來，使他的思想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得到提高，甚至得到飛躍。陳毅在多年後曾幾次對跟隨自己工作的同志說，到上海黨中央兩個月，等於上了兩個月的訓練班。[205]

1934 年 8 月 28 日陳毅在江西省興國老營盤指揮作戰時身受重傷，他應該動手術，但因爲雲石山國家醫院沒有電源，不能拍 X 光片，動手術的事被擱置下來。陳毅聽說中央機關和紅軍主力就要撤出中央革命根據地了，但是還沒有哪一位中央領導人找他談過話。10 月 9 日，陳毅趕快給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寫了封信反映情況。周恩來接到陳毅的信，當即派人把電台的汽油發電機送來醫院，讓陳毅在拍完 X 光片後可以順利進行手術。後來周恩來在百忙之中到醫院探望陳毅，他告訴陳毅，明天下午中央機關和主力紅軍就要出動，方向是去湘西與賀龍（1896-1969）、蕭克（1907-）的二．六軍團會合，在那裡建立新的根據地。爲了中央蘇區今後的鬥爭，也鑒於你的腿傷，中央決定你和項英同志留下來，堅

[203] 金沖及，《周恩來傳（1898~1949）》上冊，頁 196。
[204] 王永欽，〈回去後要請毛澤東復職〉，《湘潮》，期 4（2001 年），頁 28。
[205] 袁德金，〈毛澤東與陳毅〉，《湖北檔案》，頁 14。

持中央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並設立中共中央分局以項英爲書記以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的辦事處，陳毅將擔任辦事處的主任。陳毅十分沉重地說：

> 我們第五次反圍剿應該說是失敗了。我希望中央能承認失敗，正視失敗，總結教訓。從井岡山到蘇區，搞了七八年的根據地丟了，多少紅軍將士犧牲了。不能這樣打了。再這樣打下去，會把根據地和紅軍搞光的。[206]

周恩來回道：「血的教訓啊！這其中也注入了你的鮮血」。[207]分別時，周恩來情深意重的摘下手錶給陳毅當紀念。第二天中央機關和主力紅軍踏上了漫漫長征路。陳毅留下來和項英等人領導了艱苦卓越的南方三年游擊戰爭。

自此一別後，直到抗日戰爭時期，陳毅和周恩來終於在 1939 年 2 月 23 日才又見面。周恩來當時在國共合作中，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職務。這一次，他是以政治部副部長的身份來三戰區視察工作，借此機會專程來新四軍傳達和貫徹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精神。[208]擴大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再次強調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必須「獨立自主」地宣傳抗日，發動群眾，擴大武裝，建立、鞏固和發展抗日根據地的精神。會議中還指出，華中是目前全國最好發展的區域，根據華中的實際情況，會議決定：撤銷長江局，成立中原局，以劉少奇（當時化名胡服）爲書記；東南分局改爲東南局，仍以項英爲書記；以便更有力地開展華中和江南敵後的抗日工作。周恩來來到皖南，進一步與東南局及軍分會的領導人，商討六中全會精神的貫徹和新四軍的發展方針。對於新四軍應向何處發展?出現不同的意見。例如，許有人認爲：江南的情況特殊，敵人的力量過於強大，平原水網又給部隊的行動帶來許多困難，不如向南，向閩浙一帶發展，那兒是老區，群眾基礎好，又多高山密林，地理環境也十分有利，爲部隊的大發展提供了許多江南所沒有的條件。但是陳毅個人則認爲在日軍並未侵佔浙贛閩廣大地區時而向南、向閩浙一帶國民黨統治區發展，必然會造成政治上被動。因此他深感中央關於新四軍向北發展的方針是正確的。進一步來說，自武漢失守後，

---

[206] 王智濤，〈毅陳老總二三事〉《解放軍報》，2001 年 9 月 3 日，版 7。

[207] 王智濤，〈毅陳老總二三事〉《解放軍報》，版 7。

[208] 中國共產黨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 1938 年 9 月 29 日至 11 月 6 日在延安舉行。全會批準以毛澤東爲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基本上克服了抗戰初期王明的右傾錯誤，進一步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全會強調黨必須獨立自主地領導人民進行抗日戰爭，並進行了全面的戰略規劃。全會進一步肯定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提出了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務。這次全會推動了黨的各項工作的發展。金沖及，《周恩來傳（1898~1949）》上冊，頁 424－426。

蔣介石政府在對內對外政策上的嚴重變化，國民黨的五屆五中全會上制定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在江南已經逐步表現出來的現實，都使他看到全國性的反共高潮將難以避免，新四軍必須更積極地向東向北衝出三戰區所設置的牢籠。[209]周恩來和項英、陳毅都作了長談，並廣泛聽取了各支隊負責人和其他一些幹部的意見。他肯定了陳毅在江南的發展是符合六屆六中全會的精神並指出在去年 10 月 25 日，日軍攻佔武漢後，現在所因應的對策是正面戰場必須使日寇不再深入，若要達成這一點，敵後戰場就必須開展更廣泛更深入的游擊戰爭。他認爲五臺山和江南，一個牽制敵人主力五、六萬，一個牽制敵人主力三、四萬，全國如果有十幾個、二十個這樣的地區，就可以使日軍疲於奔命了。在這相持階段中，新四軍還要發展壯大，準備將來的反攻和決戰、要堅持游擊戰爭，創造大江南北的根據地，絕不退後，絕不逃避，抗戰的相持階段已經到來！[210]

至於對新四軍的發展方向，周恩來更進一步提出三條原則：

> 哪個地方空虛，我們就向哪個地方發展。哪個地方危險，我們就到哪個地方去創造新的活動地區。哪個地方只有敵人偽軍，友黨友軍較不注意，沒有去活動，我們就向哪裏發展。這樣可以減少磨擦，利於抗戰。[211]

根據這三條原則，周恩來又明確提出新四軍今後活動方針的三句話即：「向北發展，向東作戰，鞏固現有陣地」。[212]向北發展：抽調部隊過江，把江北發展成爲具有戰略意義的根據地。向東作戰：出擊滬寧地區，在國內外造成巨大影響。鞏固現有陣地：新四軍皖南軍部和茅山根據地要不斷鞏固、發展，也即是所謂「向南鞏固」。這是周恩來對全局形勢的深刻洞察，也是對新四軍發展的高瞻遠矚。在周恩來的啓發下，大家終於商定新四軍今後發展的戰略方針是: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陳毅這次皖南之行收獲很大，在大局上得到了明確的方針。

1945 年 2 月 18 日陳毅參加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全體會議，在會議中聽取周恩來關於同國民黨談判情況的報告。這是抗日戰爭和中國共產黨發展的重要轉折關

[209]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115。
[210]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115。
[211] 金沖及，《周恩來傳（1898~1949）》上冊，頁 441。
[212] 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頁 101－106。

頭的一次聚會。[213]

1946 年 3 月 1 日，陳毅接到中央指示後，登上一架專門來臨沂接他的飛機，到達濟南，在這裡迎接了從北平來濟南視察的「軍事三人小組」——張治中（1890－1969）、周恩來、馬歇爾（1880－1959）。[214]軍事調處濟南執行小組向三代表匯報山東各地國、共衝突的調處情況後，周恩來藉此披露國民黨方面將僞軍加委使之搖身變爲國軍的問題，還揭發國民黨急於恢復交通，實質是利用其運兵向解放區進攻的真相。當日下午，陳毅又隨張、周、馬歇爾 3 人飛抵徐州，談判的重點是蘇北淮陰地區國、共兩方粟裕部與顧祝同（1893－1987）部摩擦的問題。第二天上午與馬歇爾的會談，周恩來委託陳毅代表自己出面。當陳毅面對這位美國五星上將時，神態從容地列舉事實、申述理由，正式提出有必要向新四軍所在的蘇中地區增派一個新的小組去實地考察，以制止當地國民黨軍隊的挑釁進攻等問題。又坦率指出此次在徐州舉行的宴會中，共方代表人員的席位被有意壓低了。接著馬歇爾同意考慮向蘇中增派三人小組的事，又召進美方一位上校，詢問昨日宴會的座席安排問題，最後並向陳毅表達了歉意。而顧祝同開始時是對共方代表甚爲踞傲，經陳毅的交涉，美國人又說了話，他態度上便也有些改變。後來與陳毅談話中，還表示贊同陳毅所說的「和平巨流不可阻擋」的觀點。[215]在整個談判鬥爭中，陳毅總是清醒地正視對方的總的政策，既交了朋友，又堅持原則，不負周恩來所委以的重責大任。[216]

1948 年 4 月 30 日陳毅抵阜平城南莊，同周恩來、朱德等人參加由毛澤東主席召集的書記處會議。這次會議主要是研究粟裕提出的調整南綫戰略進攻部署的建議。[217]5 月 5 日，中央採納粟裕的意見，決定華野一兵團暫不渡江南進，仍留中原殲敵。這是一個重大的戰略決策，構成了以後淮海戰役的最初藍圖。在劉伯承（1892－1986）、鄧小平的一再要求下，決定陳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書記、中原軍區及中原野戰軍第一副司令員（華野職務不變）。5 月 21 日，中央軍委電

---

213 劉樹發主編，《陳毅年譜》，頁 441。
214 金沖及，《周恩來傳（1898~1949）》上冊，頁 620。
215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185。
216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185。
217 金沖及，《周恩來傳 1898~1949》，下冊，頁 721。

促陳毅盡可能迅速去中原。但軍委隨即又來電告知陳毅：軍委後勤部長楊立三要來濮陽協助精簡整頓華野龐大的後方機構，要陳毅等楊立三到達，共同研究好處理方案後，再行西去。楊立三到達後與陳毅研究了整頓精簡方案，決定由楊立三同粟裕到華野後方機關朝城去具體安排。楊立三臨行前，陳毅托他把繳獲的交直流電兩用的收音機一台帶去中央送給「恩來、小超」並附一信說明：「此乃美國新出品、許昌戰鬥繳獲品，你們有電燈，利用其開動起來十分好，兩夫婦可以在屋內跳舞。‧‧‧‧明日即西去，毫無企圖留部隊之意，並望將來能隨軍入川」。[218]陳毅所寫的這一封信，周恩來在看完後，特意親筆批轉毛澤東、劉少奇、朱德等傳閱。他們都一一圈閱，但不知是誰還在「毫無企圖留部隊之意」這一句的旁邊用毛筆畫粗槓一道以示值得重視。[219]

1952 年夏，中共中央爲加強統一集中領導，就決定逐步縮小各大行政區，並集中一部分幹部到中央工作。當時陳毅在給毛主席的信中表示完全擁護中央這一決定，並提出：「我想仍留南京做部隊工作並就近協助華東和上海。在將來必要時調我到北京工作我亦願意」。[220]1954 年 9 月 3 日，陳毅作爲上海市選出的人民代表到北京出席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9 月 27 日，人代大會隆重選出了國家主席，產生了國務院總理。陳毅被任命爲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又根據中央政治局的決定，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9 月 29 日，由周恩來總理主持國務院常務委員會，研究總理和幾位副總理的分工，會上作出決議，陳毅爲國務院常務副總理。（華東局於 10 月 19 日致電中央，建議仍由陳毅兼任上海市長。中央 10 月 28 日覆電同意。）後來，在 10 月 31 日的國務院常委會上，還確定兼管科學院、政法、文化，也參加國防。此後陳毅一直和周恩來工作在一起，協助周恩來處理國務院的日常公務。

1955 年 2 月 8 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服役條例》規定：中國人民解放軍軍銜共分 4 等 14 級。授予元帥、大將軍銜的人選由中央書記處提名，經中央政治局審議確定。1955 年 9 月

---

[218] 王翠平，〈周恩來使用過的收音機〉，《文物春秋》，期 6（2005 年），頁 73。
[219]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234。
[220]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234。

27 日，中共解放軍實行了歷史上的第一次授銜，陳毅名列十大元帥之一。授予元帥軍銜者還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於 1955 年 9 月 23 日提出建議，提請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二次會議根據《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服役條例》審議通過。根據《服役條例》的規定，授予上將至少尉軍銜的條件主要有四項：一為現任職務；二為政治品質；三為業務能力；四為在軍隊中的服務經歷和對革命事業的貢獻。陳毅在 1954 年九月，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並分管國務院一辦、二辦、民族事務委員會、科學院的工作。但在毛澤東不願意自己任大元帥，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也不同意本人擔任元帥的情況下。陳毅是否還能授予元帥軍銜成了周恩來需要考慮的一個問題。經過反覆思量，考慮陳毅的歷史功績與在第三野戰軍的影響，也考慮他當時與以後的工作，周恩來於 9 月 11 日在北戴河打電話給在北京的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主張授予陳毅以元帥軍銜。[221]周恩來為此還特別說明：「軍銜授予」對陳毅同志現在和將來的工作均無不便之處，平時可以不穿軍服，必要時再穿。他更進一步以蘇聯的布爾加寧（Nikolay Bulganin，1895-1975）為例，來說服、澄清大家的疑慮，[222]因此，我們可以說陳毅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的軍銜是周恩來力薦的，由此更可證明周恩來對陳毅的肯定與賞識及二人之間真摯可貴的友誼。

1956 年，為了加強國防現代化建設，在周恩來、陳毅、李富春（1900－1975）、聶榮臻（1899－1992）等國家領導人的直接領導下，國務院成立了科學規劃委員會，1956 年 2 月，陳毅就任全國科學規劃委員會主任，李富春、郭沫若、薄一波（1908－2007）、李四光（1889－1971）為副主任。[223]這是黨內領導科學研究的最高機構，受到中共中央的特殊關懷，有事可以直接向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請示報告。[224]1956 年 9 月，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陳毅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這時，由陳毅來主管外交已進一步明確了。在 10 月 28 日召開的科學規劃會議上，宣佈了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將科學工作交由聶榮臻主管的決定。

---

[22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 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年），頁 501。
[222] 蘇聯的布爾加寧，原來也有元帥頭銜，現在他做部長會議主席的工作就不常用元帥頭銜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 1949－1976》，頁 502。
[22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 1949－1976》，頁 556。
[224]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282。

陳毅在 1954 年擔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以後，他的工作就轉到政府及外交兩方面來。尤其是當他在 1958 年繼周恩來任外交部長以後與擔任總理的周恩來關係更是休戚與共。早在 1955 年開始，陳毅便隨著周恩來出席第一次亞非會議，除此之外，二人並肩協力、連袂出訪過的國家不計其數，例如 1958 年前往朝鮮人共和國、1960 年訪問東南亞鄰邦、1963 年年底起展開訪問亞、非萬裏行程、1965 年出席在阿爾及爾的第二次亞非會議‧‧‧‧等等。因此兩人在外交工作方面不僅是配合無間的好搭檔；在私人情誼方面更是建立起堅貞無比的情誼。也是因爲兩人有著如此深厚的淵源，因此在 1966 年以後，在「文化大革命」風暴的席捲下，周恩來挺身而出力保陳毅。而爲了幫助陳毅「過關」，周恩來可說是用心良苦、焦頭爛額。甚至在形勢最爲嚴峻的時候，針對一部分造反派揚言揪出陳毅，周恩來還不惜以身作盾嚴正警告造反派：「**誰要在路上攔截陳毅同志的汽車，我馬上挺身而出；你們今天要衝會場，我一定出席，並站在大門口，讓你們從我身上踏過去**」![225]此外，在陳毅成爲「二月逆流」[226]的「黑將軍」後，他還運用洞悉毛澤東急欲打開中美關係的心理，秘密提供資料讓陳毅去主持「國際形勢座談會」，並發表書面報告，頗有讓陳毅戴罪立功，讓毛澤東得以順水推舟進而打開中美關係新局的巧妙安排。[227]。關於上述所提及到周、陳二人間緊密的關聯，將在後面章節介紹到有關陳毅擔任「外交部長」、「陳毅與二月逆流」時再予以詳述。

[225]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38。

[226] 二月逆流是指在 1967 年 1 月 19 日至 1 月 20 日中央軍委會議和 2 月中旬在懷仁堂召開的兩次政治局碰頭會議上，譚震林（1902－1983）、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1909－1992）、徐向前（1901－1990）、聶榮臻等同林彪（1907－1971）、康生（1898－1975）、陳伯達（1904－1989）、江青（1914－1991）、張春橋（1917－2005）等進行的鬥爭，當時被稱爲「二月逆流」，實際是文革初期一次黨內公開的抗爭。杜易，《大雪壓青松－「文革」中的陳毅》（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 年），頁 128－130。

[227] 金沖及，《周恩來傳 1949~1976》，下冊，頁 1081~1083。

第三章　建國後的經歷

第一節　上海市長

1949 年 5 月初，共軍取得了強渡長江勝利之後，陳毅(總前委負責人之一、華野司令員兼政委)與總前委、中共中央華東局領導進駐了江蘇丹陽縣城。陳毅與其他領導帶領部隊爲完成攻佔上海、接管上海的任務，進行著緊張而有條不紊的工作。上海這一仗怎麼打呢?知己知彼，方能百戰不殆。根據情報顯示，遼沈、徐蚌、平津三大戰役後，盡管國軍的精銳部隊近乎被全殲，但國軍仍然企圖堅守上海，蔣介石親自趕到上海，策劃上海的防禦工事。當時，國軍部隊在上海有 8 個軍，25 個師，共 20 餘萬人。他們經過長期的準備，部署了三層防禦陣地：外圍陣地、主陣地和核心陣地，並且宣傳在上海所部署的防禦工事比史達林格勒的防禦還要強，[228]企圖與共軍作最後一博。陳毅根據中央軍委、毛澤東的指示和總前委制訂的〈京滬杭戰役實施綱要〉，強調攻佔上海的重點在於政治重於軍事，軍事服從政治，必須做到軍政全勝，[229]也就是說既要保護上海市民的生命財產，完整攻佔上海，又要殲滅國軍;既不能用趕鴨子的辦法，讓國軍毀城後逃遁，又要防止國軍久踞上海導致戰禍蔓延，使得市民遭殃。他把上海爭奪戰比喻爲：「瓷器店裏打老鼠」。[230]其意與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期間所說，進入上海，中國革命要過一大難關的意思是相通的。而所謂「瓷器店裏打老鼠」困難之處何在呢？陳毅所擔心的是有兩大風險要承擔:一是共軍攻打上海，美國恐會出兵干涉;二是接管上海後如果應變不當，造成進城後停工停電的混亂局面，上海會變成一座「死城」。兩種假設中只要有一種成真，便會使國內、國際局勢受到牽動。對於第一種風險，陳毅於 1 月 25 日在中共華東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上說:「要警惕美國人干涉，可是我們決不向它示弱。要打就打，沒有什麼了不起！」[231]至於第二種風險乃在共軍渡江後，由於戰線推進太快，鐵路運輸跟不上，接管上海的幹

---

[228] 徐晶晶，〈給上海人民的見面禮〉，《黨史文匯》，期 7（1996 年），頁 38。
[229] 劉樹發主編，《陳毅年譜》，頁 565。
[230] 徐晶晶，〈給上海人民的見面禮〉，《黨史文匯》，頁 38。
[231] 潘鉉，〈青松艇且直——記上海市第一任市長陳毅〉《黨史縱覽》，期 4（2001 年），頁 11。

部也到不齊，此外，入城政策、紀律來不及教育宣導，如果就這樣冒進，混亂之局，可想而知。而中共中央已有「慎重」、「緩進」的方針，總前委研究再三，於4 月 30 日向中央軍委提出所謂倉卒進入大城市必然陷於非常被動的地位。盡可能推遲半月到一月入上海的建議。[232]5 月 2 日陳毅來到了丹陽縣，全面佈署接管上海的準備工作。至於對中共中央而言確定上海市長人選是件大事。3 月，毛澤東曾就陳毅任上海市長之事，徵求過幾位民主人士的意見，他們對陳毅將軍之名早有所知，有人曾賦詩贊陳毅日:「兼資文武此全才」。[233]以「儒將」出掌上海，他們一致贊成。因此陳毅自到丹陽起，便正式進入「市長」的角色，首先是匯集、研究大量情況和材料。所有有關上海的年鑒，經濟、政治、文化、社會概況，匯成關於上海的 200 多種小冊子，陳毅不僅自己看，也交給幹部們讀，再依據中共中央的方針政策，確定接管的具體方針步驟。僅財經接管縱隊的匯報陳毅就足足聽了兩天兩夜，對其中「兩白一黑」 (指米、棉、煤)的運輸供應任務的艱巨緊急印象就特別深刻。[234]至於陳毅個人認爲共軍送給上海人民最好的的「見面禮」當屬「入城紀律」。因此陳毅嚴格地強調兩條入城政策:一、是市區作戰不許用重武器，二、是部隊入城後一律不得進入民宅。總前委討論了〈入城紀律〉草案，一致肯定「不入民宅」規定的必要性。1949 年 5 月 5 日，陳毅在丹陽向中央軍委發出請示電，軍委很快回電，要求部署占領吳淞、嘉興和上海的有關事項。陳毅按中央軍委指示進行作戰部署， 5 月中旬，解放上海和接管上海的準備工作基本就緒。

上海戰役，是陳毅生平所遇的一次最特殊的戰役。20 多萬國軍迎戰共軍，市區內外遍佈 3000 多座美式碉堡，4000 多個鋼筋水泥永備工事，10000 多項野戰衛星工事，20000 多顆地雷，[235]在此情況下要攻佔上海，同時又要嚴格保存市區建築、工廠、電力、交通等設施的完好，總前委已確定一條原則:盡量將市區守敵調至外圍殲滅，以避免在市區大打。5 月 12 日，三野第九、第十兩個兵團，向上海市外圍國軍發起了攻擊。國軍憑借堅固工事，拼死爭奪，雙方傷亡枕籍。陳毅

[232]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248。
[233]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249。
[234] 唐舒，〈陳毅在上海〉，《人才開發》，期 3（1999 年），頁 4。
[235]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250。

卻樂觀的對軍、師指揮員們分析國軍這些防禦工事很有可能反而會幫了共軍的大忙，他認爲國軍自恃有本錢固守市區，才有可能將市區部隊調出來增援外圍，我們可以來個將計就計。果然，不出陳毅所料，隨著解放軍在月浦等地步步推進、在浦東直逼高橋，國軍將領湯恩伯（1898-1959）終於沉不住氣，將駐守市區的第七十五軍調到浦東，被共軍逐口吃掉了。共軍在外圍的鉗形攻勢，又迫使大量國軍縮守於吳淞口兩側地區以保其出海逃生之路。因此上海市區的國軍大減，爲共軍攻取市區造成了有利態勢。陳毅於 5 月 20 日下達〈第三野戰軍淞滬戰役攻擊命令〉。5 月 23 日，共軍下令發起全線總攻，陳毅又特意在丹陽打電話給第九兵團第 27 軍軍長，再三叮囑在發動攻擊市區時一定要把握軍政全勝的原則，要把人民的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236]5 月 27 日上午 9 時，上海全部被共軍攻佔!歷時 15 天的上海戰役，共軍殲滅國軍 15 餘萬人，在炮火連天，硝煙彌漫的激烈戰鬥中，中國和亞洲的最大城市——上海，完整地回到市民手中。市民的生活基本安穩，學校正常上課，商店正常營業，工廠除了在戰區的小部分受損外，大多都能正常生產，而自來水、電力、煤氣也能照常供應。

「瓷器店打老鼠」的戰略意圖基本實現。28 日下午，陳毅率領軍管會所屬軍事、政治、財經、文教各接管委員會的主要幹部，正式接管市政府。當天，「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大門牌掛了出去。陳毅由沙場走向了十里洋場，正式接下了上海市長一職。可是國民黨從上海撤守後，留給陳毅的，是個什麼樣的上海呢? 其實，在攻佔上海前夕，上海工業已陷入半解體狀態。12000 多家工廠中，只有 30%維持開工，麵粉業由於北運通路不暢，產量只是內戰爆發前的十分之一。而占了上海工業產值 74%的輕紡織工業，由於缺原料且無銷路，陷於半癱瘓狀態。與此同時，人民政府接管的大米、麵粉僅夠全市吃半個月，而儲煤只夠全市燒 7 天! 另外，治安情況也不容樂觀，因爲流散在上海的國軍有近 20000 人，國民黨還留下 8 個特務組織 30000 多人。而匯聚在上海的難民、乞丐、小偷、妓女、遊民，總數達 60 萬![237]

陳毅及華東局、上海市委一致認爲，當務之急首先是穩定人心，盡快恢複生

[236] 徐晶晶，〈給上海人民的見面禮〉，《黨史文匯》，頁 38。
[237]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252。

產。上海的紡織廠紗錠 229 萬占全國 40% ,貿易額占全國的一半。上海工廠的煙囪若不冒煙，全國經濟就將垮掉一半;上海市場一混亂，全國財經就會失去控制。但此時因原料供應困難、銷售市場混亂，也走到絕境。國際上敵對勢力聯合封鎖，他們說:「共產黨人只會管農村，管城市一無人材，二無效率，上海就是共產黨的墳墓，共產黨下了『海』就會淹死。」[238]陳毅後來回憶佔領上海之初所遭遇到要米沒米，要煤沒煤，頭上飛機炸，下面不法投機商哄抬搗亂的這種困難時曾將其與「長征中的困難」、「三年游擊戰爭的困難」相提並論。[239]在接管初期的陳毅日理萬機，而接管上海的方針是按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期間毛澤東所指示:集中力量反對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團結各黨派等重點穩步前進。陳毅正是從這個大前提出發，接二連三親自會見各界各方代表，進行政治「亮相」、「政策交底」。中共中央特任命陳毅在擔任軍管會主任之外親自兼任文化接管委員會。在接管初期，陳毅除了接見了 83 萬建設新上海的產業工人大軍、出席產業界人士座談會外，作爲人才薈萃，文化重心的上海，陳毅瞭解上海文化地位之重要因此親自召開了文化界人士座談會、並與知名科學家、文學藝術家們推心置腹，侃侃而談。在上任頭 10 天裏，陳毅每天都要參加「大會」，陳毅是有請必到，每到必講，講必痛快淋漓，鮮明生動有力，在宣傳群眾，穩定局面方面，起了難以估量的重要作用。甚至有人說幾次座談會之後，上海文化界就形成了「陳毅熱」，[240]可見影響之大。

陳毅執掌上海未滿 10 天，一個嚴重危機 ——通貨膨脹便步步逼近了。這個問題來自 1948 年蔣經國（1910-1988）坐鎮上海，嚴令市民交兌金銀外匯，結果收走黃金 100 多萬兩，美鈔 3000 萬元，白銀無數，強制發行的金元券，導致物價飛漲，惡性通貨膨脹使市民吃盡了苦頭。中共中央爲了扭轉這一局面，共軍一入城便以 10 萬元金元券兌換 1 元人民幣的比價收兌金元券。但由於市民吃夠了鈔票貶値之苦，一拿到人民幣又去調換銀元，換大米，銀元販子乘機興風作浪哄抬價格，結果原本 1 塊銀元值 100 元人民幣，一星期就漲到 1400 元。物價飛漲，

[238] 姚會元，〈陳毅領導上海解放之初的經濟恢復工作〉，《當代中國史研究》，期 3（2003 年），頁 23。
[239] 姚會元，〈陳毅領導上海解放之初的經濟恢復工作〉，《當代中國史研究》，頁 24。
[240]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253。

工廠難以經營，許多產業資本便轉化爲投機資本，反過來更加劇通貨膨脹。如此不消一個月，人民幣就會被趕出上海，共產黨就會立不住腳。陳毅深知局勢的緊迫。上海物價一失控，天津、北平和江浙幾省都受影響，每天有電報來告急催問。陳毅與華東局財委斟酌再三，決定還是「先禮後兵」。首先財委向上海市場拋出 10 萬銀元，以使價格回跌。同時利用報刊、電台開展宣傳，陳毅也嚴正警告奸商停止投機炒作行爲，然而，投機者並沒有因此罷手。陳毅乃決定採取最後解決手段:查封大投機商操縱銀元市場的活動中心—証券交易所。搗毀銀元交易中心獲得全面勝利的消息，霎時傳遍上海，震動全國。第二天，1 元「袁大頭」價格從人民幣 2000 元猛瀉到 1200 元，物價開始回落。與此同時，在 1949 年的下半年，上海市還取締 26 家地下錢莊，處罰了濫開空頭支票膨脹商業信用的行號。[241]「銀元之戰」，成了陳毅與上海舊經濟勢力交鋒中取勝的第一個回合。[242]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蔣介石實行海上封鎖。他們利用尚未被共軍攻佔的舟山群島控制了東海門戶。這一來，各國商船開往上海的航道便被完全切斷了。如此下去，將造成工廠要關門，工人要失業，物價要高漲，生活要困難。因此一場「反封鎖」的鬥爭將全面展開。陳毅主持華東局和上海市委首先制定了反封鎖的「六大方針、五大任務」，[243]數管齊下，採取了四點對應措施:第一、協助工商業復工複業，渡過困難。缺資金的給貸款，缺原料的貸原料。第二、開展整編節約運動，大力減少開支。第三、發揮工人階級積極性創造性，節約原料，試用代用品。第四、妥善處理經濟萎縮造成的 10 萬失業工人。[244]反封鎖鬥爭的結果，紡織業 7 月中旬只有 4 成開工，到 11 月達 9 成以上，私營紗廠產量增加了 75%。機器工業原開工 20%，由於解放區日益擴大來了大批定貨，增到 60%。[245]從夏天到冬天，經歷了反封鎖鬥爭，經歷了 3 次物價大波動的考驗，就在上海經濟日見起色之際，蔣介石在舟山設立空軍前線司令部，從 1950 年 2 月 6 日的中午在國軍及美國的聯手下，在舟山機場集結了 P-51 戰鬥轟炸機 48 架，B-25 輕轟

---

[241] 姚會元，〈陳毅領導上海解放之初的經濟恢復工作〉，《當代中國史研究》，頁 26。
[242] 唐舒，〈陳毅在上海〉，《人才開發》，頁 4。
[243]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254。
[244] 何曉魯、鐵竹偉，《從沙場走向十里洋場》（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6 年 5 月），頁 84。
[245] 姚會元，〈陳毅領導上海解放之初的經濟恢復工作〉，《當代中國史研究》，頁 26。

炸機 5 架，P-38 偵察機 4 架，還有從臺北飛來參戰，屬於二戰最先進的 B-24 重型轟炸機 4 架，開始日夜不停轟炸上海，吼叫的機群撕裂天空，呼嘯的炸彈密如黑雨，一層層落下，估計每天大約投彈 60-80 噸，一個月內達到了兩千多噸。[246]造成了成千上百間的民房遭戰火吞噬，500 多名居民被炸死。然而轟炸的中心目標顯然還是美商楊樹浦發電廠，這個供應著上海 80%電力的心臟部門被反覆轟炸，遭到毀滅性打擊，機器炸壞，工人死傷甚多，造成全市性停電。身爲上海市長的陳毅看到此種慘破的情況，不禁感慨的說：「我們解放了上海，只解放了領土，還未解放領空，上海只能算是解放一半。」[247]陳毅立即在市府召開緊急會議，佈置搶修、搶救和各種應急措施，調整防空火力部署，並即刻將情況報告中央。此時的毛澤東和周恩來卻遠在莫斯科。當夜幕降臨，到處漆黑一片。交通阻塞，工廠停工，壞人趁機搶劫造謠，人心惶惶，搶購囤積的活動遍及全市。然而從市長辦公室裏，卻接連發出一道道鎮定果斷的指令: 通知各區限 3 小時內將一切照明和發電設備都動員出來使用、組織全市駐軍和員警，今晚輪流上街嚴密警戒、立即把現有高射火力調到法商電力公司去作重點保護。陳毅在辦公室工作了一夜，守著汽油燈起草了一份給中央的正式報告:「...... 14 萬佤電力今晚全停……我們正集中力量應付目前上海空前的困難。」[248]天一亮，他立即冒著刺耳的空襲警報聲，乘敞篷吉普駛往楊樹浦發電廠。眼前一片瓦礫，管道斷裂，鋼梁曲扭，整夜未睡的工人們正在清理廢墟，陳毅與工人、技術人員一起，沿著炸歪的梯子爬到數丈高的鍋爐頂，察看輸送帶破壞程度，計算恢復部分發電最快需用多久。最後陳毅下達爭取 48 小時恢復部分發電的命令。而日夜搶修的工人們最後總計用了 42 小時，比預定時間提前了 6 小時恢復了發電![249] 2 月 14 日，毛澤東與史達林（Josef Stalin， 1879-1953）簽署了〈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史達林立即給予中國方面有力的防空支援，華東防空軍高炮部隊也迅速建成。自 3 月 14 日至 5 月 11 日，共軍駐上海的防空部隊先後 4 次抗擊入侵之國軍飛機，擊落美制飛機 5 架，迫使其減少了對上海地區的騷擾。1950 年 5 月下旬，共軍陸海空協同作戰，

[246] 曾軍、汪洋，〈1950 年：上海拉響空襲警報〉，《炎黃春秋》，期 62（1997 年），頁 47。
[247] 曾軍、汪洋，〈1950 年：上海拉響空襲警報〉，《炎黃春秋》，頁 47。
[248]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257。
[249] 殷伯達，〈上海市長〉，《揚州文學》，期 3（2006 年），頁 64。

攻佔了舟山群島。上海防空戰歷時四個月，共軍飛機出動 370 批次，大約 16000 架次，共擊落國軍飛機 29 架，上海防空戒嚴令從 6 月 1 日起解除。[250]

中共中央對於上海的接管順利完成表示滿意。此後上海的經濟根據中央部署實行統一管理、統一領導，很快制止了金融市場的混亂和投機活動，抑止了通貨膨脹，穩定了物價，恢復了正常的社會秩序。從 1950 年下半年起，上海市場開始活躍。而陳毅接下來所遇到的問題是與「民族資產階級」間的微妙關係。[251]在 8 月的某一天，上海工商界代表人物榮毅仁和劉靖基兩人提出要請陳毅市長去家裏吃飯。有人建議陳毅不要去，可是陳毅認爲吃飯也是做工作，他不僅帶了領導幹部同去，還將張茜和孩子們也帶去，他的用意是要與「布爾喬亞」[252]們「交朋友」。而陳毅「交朋友」的理論依據是以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決議中所提:「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盡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工業的積極性。」[253]他看出榮毅仁請吃飯，是「投石問路」。因爲當時榮氏企業處境很不妙。而在當時工商界普遍性的一大難題是勞資糾紛，光是 6、7 兩個月間就發生了 2000 餘起。陳毅認爲這是指資本家多年虐待、剝削工人所造成的階級對立，因此勸導榮毅仁等資本家解決勞資糾紛的問題好比救火，是不能用紙去包的，而是要從起火根源上去控制這火。陳毅中肯的勸導對這些資本家也起了作用，一些工廠其後成立了「勞資協商委員會」，逐步建立工人與企業主的新型關係。而長期在競爭吞噬的浪濤中掙紮的民族資本家們，看到陳市長經常請企業家到辦公室去征詢意見商討政策，是真心想要扶持私營企業發展生產，於是一些出走香港、歐美的企業家紛紛萌生了回歸之念，找到了出路和希望。消息傳出， 10 月初，著名的化工企業大資本家吳蘊初從美國回來了；前國民黨招商局局長、企

---

[250] 會軍、汪洋，（1950 年：上海拉響空襲警報），《炎黃春秋》，頁 48。

[251] 關於對待民族資產階級和私營工商業政策的問題，在一九五 O 年四月間，有黨內同志在發言記錄稿中談到:「今天鬥爭對象，主要是資產階級」，毛澤東批示:「今天的鬥爭對象主要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殘餘，而不是民族資產階。對於民族資產階級是有鬥爭的，但必須團結它，採用既團結又鬥爭的政策以達團結它共同發展國民經濟之目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年），頁 214；1950 年 6 月，中共中央召開了七屆三中全會，毛澤東尖銳地批評說:「我們黨內有相當一部分同志根本不知道《共同綱領》爲何物。很多同志不是和資產階級合作，而是和它作對，打擊它；不是各得其所，而是一得其所，讓資產階級不得其所。結果把我們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關係搞得很緊張，他們惶惶不可終日，這種情況非改變不可。」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年），頁 21-24。

[252] 英語「資產階級」的譯音。何曉魯、鐵竹偉，《從沙場走向十里洋場》（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6 年 5 月），頁 107。

[253]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四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7 年），頁 596。

業遍及半個中國的大資本家劉鴻生也從香港回到了上海。人回來了，但民族資本家與共產黨之間，從經濟利益、經營方式到意識形態，都矛盾重重、格格不入。這些資本家們也多次領教了國營經濟力量的強大，知道跟人民政府「耍滑頭」是要吃苦頭的。[254]中共向來對資產階級的政策是，有團結更有打擊，重在「利用」其實用性，而非「捍衛」其合法性，[255]因此與資產階級又聯合又鬥爭，是共產革命的一大特點。[256]而作爲資產階級最集中的上海市的市長的陳毅，可說是處在風口浪尖的。1950 年 3 月，爲徹底扭轉 10 多年來通貨膨脹失控局面，中央實行財經統一，物價開始穩定並有大幅度下降。物價一降，人們愈不慌買東西，通貨膨脹促成的虛假購買力消失了，產品滯銷，企業家蝕本嚴重;數月前認購的公債倒反升值，增加了繳款的困難;加上國家加緊稅收，資方負擔加重，嚴重的危機開始威脅上海。2 月份關廠 53 家，關店 349 家，勞資糾紛 592 起。[257]陳毅知道國家經過 25 年戰爭，經濟已百孔千瘡，收公債納稅款涉及國家全局利益不得動搖。三月上旬，陳毅收到一封「專呈陳市長親啓」的信，是劉鴻生老先生的親筆。信中提到自己買了公債十幾萬份，現在要交款，還要納稅、補稅、發工資，存貨賣不動，資金沒辦法周轉，乾脆要把全部企業交給國家。陳毅沒想到，這位最善經營實業的資本家竟然會表示，要將所有劉家企業「全部交給國家」。這時，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開會要派人去北京參加全國統戰會議，陳毅特地趕來囑咐他們向中央反映關於資本家交稅買公債是應該的，國家財政收入要平衡，是人民最高利益，決不能含糊，但是擠牛奶不可以把牛擠死。然而，上海的局勢使陳毅感到還有必要由他親自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告要求減緩稅收公債。3 月 12 日，他親筆起草以個人名義向毛澤東並中共中央發出了第一份反映上海困難情況的報告，建議中央，上海所要負擔 5000 億元的稅收任務是必須完成，但是在步驟上應作詳細考慮，內容包括：交公債限期延至 4 月底、稅收責成本年完成，但不必每月逼催逼

[254] 如 1949 年 7 月大米緊張，投機商大搶大囤，一些工商業家也借款搶購，米價漲到 6 萬 5 千元一石，陳毅請來中財委陳雲給工商界談經濟形勢，明確宣佈政府將從東北等地調上 2 億斤大米到上海，勸大家不要投機倒把。然而投機者仍不信，11 月初漲到 30 萬元一石。結果中央統調的糧食果真潮水般運到，每日拋售近 1000 萬斤，米價大跌，囤米者只得壓價賣出，全市投機米商蝕本一半以上，捲入投機的工商業家也損失慘重。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261。

[255] 陳永發 ，《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冊，頁 624。

[256] 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六卷，頁 50。

[257] 姚會元，（陳毅領導上海解放之初的經濟恢復工作），《當代中國史研究》，頁 27。

交、不得已時政府應負擔部分失業救濟、對私人資本資金周轉和定購方面應考慮必要扶助等四項具體做法。[258]電報一發出，中共上海市委、華東局又連續召開工商界人士座談會，陳毅與譚震林等一起出席，聽資本家們訴苦。他們認爲資方所提出的要求政府給以代紡代織和改進稅收具體方法的意見，應適當考慮。3 月 24 日，陳毅將上述情況和意見第二次電告中共中央。同時，他開始將注意力轉到稅收問題的爭論分歧上來。3 月份上海稅額增至 5000 億，但實收稅款竟達 5800 億，超額 16%，顯然用力太猛。對此，有人喜，認爲成效巨大；但是亦有人憂，擔心「殺雞取卵」。而稅務局長本人胸有成竹的認爲資本家根本就是蠟燭，不點不亮，既然他們要鑽「自報實繳」的漏洞來逃漏稅，就積極查他們的帳，出了問題，抓住了就重重地處罰，把資本家的廠子拿過來，不過是早晚的事。陳毅對此進行嚴厲尖銳的批評:

> 強征苛索，擠垮人家，這不叫社會主義，叫做「左」傾幼稚病!過去民族資產階級和我們黨合作抗日、合作反蔣，現在人家不跑掉，合作恢復經濟，憑什麼擠垮人家?這叫做過河拆橋，叫做不要朋友，不要人家擁護。政治上很不利，經濟也會造成很大破壞，馬上會雞飛狗跳，社會大亂!有人反右很勇敢，就是不敢反「左」，我黨歷史上立三路線和第一次王明路線的「左」傾，不是使我們黨吃過很大的虧嗎!我認為:只敢反右不敢反「左」，並不是一個好的共產黨員。[259]

這番話的意義不止在於稅收問題，也反映了陳毅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以及政治上的成熟度。4 月 4 日，陳毅發出了有關上海經濟問題的第三封電函，向中共中央報告黨內統一認識的情況。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根據各方面的反應和意見作出了調整公私關系的號召，[260]他進一步的說：「我們是一個大黨，策略上要特別注意。我們勝利了，要鞏固勝利，更要注意，要反對「左」的思想和「左」的做法。」[261]陳毅報告中的意見終於得到了中共中央的

---

[258]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 1949~1976)，上冊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2004 年)，頁 70。
[259] 姚會元，〈穩定市場穩定人心——陳毅穩定上海市場的卓絕貢獻〉,《上海師範大學學報》，期 4（2002 年）頁 29。
[260]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 1949~1976)，上冊，頁 71。
[261]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頁 103。

肯定和支持。因此，當 4 月 15 日上海市各界代表會開幕時，雖然已出現 300 個廠長、經理逃去香港、13 萬工人失業的嚴重局面，但陳毅胸有成竹，會前向中共中央、毛澤東報告在第四封電函:「多年來的毒到目前已到迸發的時候，其困難和緊張是自然的。我們力爭轉得好一些，力爭痛苦少一些。本你的指示精神去辦，可以辦得下去的。」[262]在代表會上，陳毅說出各階層的困難痛苦，比他們自己說得更洞見肺腑。然後再給大家說明白，物價爲何能穩定，又講全國經濟大改組中，根除毒瘡，必要忍受「一刀之苦」的道理。他又深入到小組討論中去，讓大家發牢騷、吐怨氣，然後再做解釋說服工作，最後使其統一到毛澤東的三句話上:「有困難，有希望，有辦法」。[263]此會對扭轉消極情緒，緩和緊張局勢起了極大作用。會議情況及經驗陳毅在第五封電報裏向中央作了匯報，毛閱後覆電在次強調說:「目前幾個月，確實應當用大力來作調整公私關係、勞資關係，維持生產與救濟失業的艱钜工作」[264]5 月 10 日，陳毅向中共中央發出第六封電報，匯報 3、4 月情況和處理經驗，同時請求依據實際情況將 6 月份上海徵稅額從 4000 億減爲 3000 億。毛澤東收到陳毅報告後，感到十分欣喜，立即把它轉發給華東以外的中央局、分局以及北京、天津兩市委的負責人說：「上海打退四月危機的經驗及目前採取的各項政策，是各地大城市黨委值得研究的，請將此項報告轉發各主要城市黨委研究。」[265]並告知陳毅 6 月月 1 日來中央一次，因爲 6 月中旬將召開政協全國委員會，討論調整工商業問題，有些問題須事先和他商量。而陳毅不是全國委員會委員，但毛澤東要他來中央討論，這表明了毛澤東在決定全國工商業政策時，高度重視陳毅在上海取得的成功經驗。這也是對陳毅前後 6 封電函所包含的求實精神和坦誠作風給予的高度評價。

至此，上海經濟上的嚴重局面基本上已渡過了，但是入城執政的時間一久，幹部隊伍中出現了腐化變質現象;隨著經濟形勢的好轉，資本家當中也滋長了違法投機、偷工減料、偷稅漏稅以牟取暴利的行爲。爲了制止和打擊這兩者，中共中

[262]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 1949~1976)，上冊，頁 74。
[263] 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六卷，頁 24。
[264]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 1949~1976)，上冊，頁 74。
[265]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 1949~1976)，上冊，頁 75。

央決定在全國開展「三反」和「五反」運動。[266]

1952 年 2 月中旬，陳毅領導上海的「三反」及後來爲打退資產階級在經濟領域猖狂進攻而開展的「五反」運動。1950 年上海經濟在渡過困難之後，國內市場活躍，抗美援朝又帶來大量訂貨，上海工業品銷路大增。在 1951 年中上海資本家贏得純利共計 6.5 兆。這時他們當中有部分的人對自己的地位和作用估計過高，因而對國家的態度起了變化，不僅在政治上要求與工人階級平起平坐，在經濟上的利潤還要與國營企業平分秋色;並且由於自產自銷贏利已大大超過國家加工定貨「工繳」數，便千方百計抗拒加工定貨;或採取偷工減料，以假冒真的辦法，甚至於製造志願軍所用軍需品時，加入了污染帶菌的低劣敷料和失效的藥品，殘害了士兵生命!1951 年 11 月間，許滌新（1906-1988）去北京參加統戰工作匯報會，臨行前陳毅指示他向周恩來總理匯報這些階級矛盾尖銳化的情況及他認爲有必要予以還擊的看法。周恩來在聽匯報後稱讚陳毅對上海階級鬥爭的看法是正確的，認爲他對這個大問題抓得很及時，周恩來進一步的強調必須緊緊抓住毛主席關於民族資產階級兩面性的科學分析，上海資產階級既然翹了尾巴，那就應該狠狠地給予批判，進行鬥爭，統戰工作就是團結和鬥爭的結合。[267]此外在「三反」中暴露出來的不法資本家的問題，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的高度重視。1952 年 1 月 26 日，中共中央發出由毛澤東親自起草的指示，決定在全國一切城市，首先是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五反」鬥爭，以配合在黨政軍民中開展的「三反」鬥爭。而「五反」運動面臨的情況是比較複雜的。上海是資本主義工商業集中的地方，資本家沾染「五毒」行爲（即行賄、偷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則尤爲嚴重。特別是隨著「三反」

[266] 中共在韓戰期間展開一連串群眾運動，其中鎮壓反革命運動是在一九五 0 年十月在華北首先　開始，對「匪首」、「特務」、「惡霸」、「反動會道門頭子」等進行嚴厲鎮壓。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六卷，頁 117~125。「三反」是於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在黨政軍機關中實施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而「五反」是一九五二年一月在中、大城市中對資產階級展開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和反對盜竊經濟情報的鬥爭。王朝彬，《三反實錄》(北京市:員警教育出版社，1992)，頁 84~107;趙新燕，〈警鐘長鳴反腐倡廉——“三反”、“五反”給我們的啓示〉，《雁北師范學院學報》，期 1（2003）頁 23-25；程瑾 、朱仁.〈共和國拒絕腐敗——“三反”、“五反”决策內幕〉，《黨史博覽》,期 3（2002 年），頁 18；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 1949~1976)，上冊，頁 203-235。

[267] 石維行，〈毛澤東周恩來與“三反”、“五反〉，《福建黨史月刊》期 2（2002 年），頁 23。

運動的開展，發現許多大的貪汙案件，往往與資本家的不法行爲有關。爲防止出現方向錯誤，周恩來在 3 月 8 日主持政務院第 127 次會議時特別強調：

> 資產階級向我們發動的進攻是一場階級鬥爭，但性質屬於經濟問題，不是政治問題，因此，「五反」運動是統一戰線內部的鬥爭。我們開展這一鬥爭，是為了團結資產階級，使它去掉「五毒」，是為了保證國家經濟的社會主義前途，而不是消滅資產階級。鬥爭雖然激烈，但通過鬥爭，統一戰線內部是更加強了。[268]

3 月 28 日，周恩來在主持政務院第 130 次會議時，又強調了「三反」、「五反」的兩條基本原則：「過去從寬，今後從嚴；三反從嚴，五反從寬」。[269]爲何有的嚴有的寬？周恩來解釋了其中的原因是：「三反」是對國家工作人員的，他們有職有權，因此對貪汙者要從嚴懲辦。「五反」中工商戶違法的數量大，但嚴重違法戶只占 5%，因此判罪應從寬。

在「五反」鬥爭中，大城市是前沿陣地，因此上海的「五反」運動，周恩來當然極爲關注。2 月下旬，中共中央特派薄一波（1908-2007）赴上海，考察和幫助那裏的「三反」、「五反」工作。薄一波直接受周恩來領導。到上海後，他隨時向周恩來用電話彙報情況，並得到及時的指導。根據中央部署，上海在 2 月上旬即開始進行「五反」鬥爭火力極爲猛烈，逮捕了一些人，報刊宣傳升溫，氣氛緊張，鬥爭中出現戴高帽子和體罰現象，致使少數資本家跳樓自殺，死 34 人。3 月 25 日，召開全市動員大會，陳毅作報告，他的重點著重在防止過火現象，全面交待了黨的政策。3 月 25 日，陳毅在全市廣播大會上宣佈「五反」運動正式開始，聲色俱厲地告誡資本家老實交待自己罪行，選擇自己道路，並宣佈全市 16.34 萬工商戶，將按實際表現被分爲守法戶、基本守法戶、半守法半違法戶、嚴重違法戶和完全違法戶 5 類。運動大規模展開後，陳毅與中央專派來上海指導運動的薄一波每日聽取匯報，將情況擬電報告中央，並不斷與毛、周電話聯系。陳毅提出

---

[26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 1949－1976》，頁 223。
[26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 1949－1976》，頁 229。

一個「兩路分兵」方案，即:將全市 303 戶最有代表性的上層資本家集中起來交代揭發，但是他們與揭發群眾是不見面的，用「背靠背」的方式來進行，帶有保護性質。另一路 2000 重點戶和 2 萬小戶則放在區裏、廠裏，由工人「面對面」進行揭發鬥爭。這著棋有高度政策策略，中央很快批准。而被集中到和平大廈的 303 戶資本家，一開始多抱有篤定過關，抗拒交代的態度，但經嚴厲批評，退回「坦白書」重填，並將工人揭發重點戶、小戶的批判實況廣播放給資本家聽，因此 303 戶資本家的防線步步崩潰了。有人起初交代贓款數爲 1 億，幾天後便擠出 60 億；而大資本家劉鴻生所屬各企業最後交代 600 億。經過一個月鬥爭，資本家基本上交代過關，全市「五毒」款數達 10 萬億。5 月初，中央關於對工商戶處理的基本原則下發，運動進入退贓定案階段。有幹部主張資本家承認應退賠的「五毒」款數額越大的就定得越重，依此方法辦理則 303 戶資本家大部份將被劃爲違法戶，因此陳毅表示不同意。據許滌新回憶陳毅當時不同意的理由是他認爲：資本大，加工定貨數量大，五毒退賠的數字也必然大，但決不能因此把大中型資本家都劃成嚴重違法和完全違法戶。劃分五類戶也要辯証地看問題，要看情節是否極其惡劣。單純看退賠數字去劃分，不利於黨團結多數、孤立少數的策略。[270]幹部們依照陳毅的指示，準確恰當地劃分了 5 類戶，因此一些退賠數百億的大戶如劉鴻生、榮毅仁、劉靖基等，都定爲「守法戶」。資本家們認爲這場鬥爭是「武戲文唱」。[271]至於退賠數，陳毅在「五反」處理工作會議上定調爲：承認多少退多少，不退就鬥，這對國家對工人階級不利。結果劉鴻生自認的 600 億核減定案爲 200 多億，劉靖基則核定幾十億，只占他自認數的十分之一!他們大感意外，受到教育，表示今後要老老實實從事正當生產，在工人階級領導下改造自己。1952 年 7 月 19 日，市政府委員會和市協商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副市長潘漢年（1906-1977）在會上作「三反」、「五反」運動總結報告，宣佈上海「三反」、「五反」運動勝利結束。「五反」運動在政策上、經濟上、思想上都取得了勝利，通過運動，打擊了資產

---

[270] 許滌新，《人民的忠誠戰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年），頁 485。
[271]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267。

階級的「五毒」行為，為有計劃的進行大規模經濟建設掃清了障礙。上海的「五反」做到了「反而下亂」，令中共中央非常滿意。而對上海整個資產階級則是經過了一次洗面革心的改造，在 1953 年，上海工商界來了個幾十個行業全都得了「滿堂紅」全部消除虧損，獲得創紀錄的贏利。工商界人士因此稱之為「難忘的1953 年」。[272]

此外，身為文化界中心的上海，文化事業得到中央特別重視和關注。而陳毅本身又是一個「儒將」，因此他對上海的文化事業所採取的對策是「保存下夾，逐步改造」的方針。[273]例如，舊上海有個交響樂團，軍管會成立後有些人認為花錢養這麼個洋玩藝沒啥用因此提出解散它的建議，而陳毅認為交響音樂是全世界共同藝術財富，上海這樣的城市應有一個自己的樂團。反倒是到了後來，由於這個老樂團樓下是個嘈雜的菜市場，不利排練，在陳毅關心催促之下，終於搬進一所幽靜的花園樓房。此外，青年音樂家黃貽鈞作為樂團的第一個中國指揮登壇演出，陳毅熱情支持祝賀。甚至在一次為中共的黨代會演出時，有的人聽不懂交響樂而中途離場，陳毅下令鎖上劇場門不許退席，告誡大家要尊重演員的藝術表演。另外，當時上海民樂界的第一把交椅，當數早年留學美國的衛仲樂先生，有人說他性格怪癖，陳毅卻與他相處甚洽。而由於陳毅本人對詩詞文藝本就充滿興趣與才華，因此他更是有心要成為各種藝術家、文化人的「知音」。他認為上海文化界千富萬富，最珍貴的財富還是人才。他重視知識，尊重知識分子，積極團結文化、藝術、科技界人士，關心並支持文史、藝術、博物、科學事業的發展。他和知識界人士廣交朋友，和各界人士坦誠相待，因此當時在上海許多著名學者們，有的比陳毅年長數十歲、有的當時對共產主義也並無信仰，但是陳毅都與他們交了朋友，[274]一方面從他們身上汲取知識智慧，另一方面又從生活、工作上給予關心，在推進上海新文化事業的發展上，陳毅可真說是不遺餘力的。

而上海畢竟是個魚龍混雜、無奇不有的大千世界，中共建國以來的上海，滋

---

[272] 趙新燕，〈警鐘長鳴反腐倡廉——“三反”“五反”給我們的啓示〉，《雁北師范學院學報》，期 1（2003）頁 25。
[273] 唐舒，〈陳毅在上海〉，《人才開發》，期 3（1999 年），頁 5。
[274] 朱寨，〈陳毅市長的藝術風格〉，《文藝研究》期 6（1980 年），頁 32。

生在這塊土地上的毒菌還是日以繼夜的繁衍腐臭。因此接管上海後的陳毅不斷要面對各式各樣舊日上海複雜糾葛難辦的人、事、物——賭場、按摩院、妓院、流氓幫會；聚賭抽頭、拐賣人口、販賣毒品、偷盜、綁票、重大盜竊案、縱火案、僞造人民幣案、冒充中共軍人殺害外僑案……。尤其是流氓幫會是舊上海一大黑暗勢力，這些流氓集團以青幫、洪幫爲主，成了上海底層社會的實際控制者。對此，中共華東局在進城前早有準備，通過潘漢年與逃去香港的幫會頭子杜月笙（1888-1951）談妥，接管上海後只要他們不妄動，我們就不殺其上層。入城後，陳毅又親自派幹部找到仍留在上海，被善良百姓視爲首惡的黃金榮，要他按政府法令辦事，並管束門徒，不得再爲非作歹。後來一批批罪惡深重、而又繼續作惡的流氓惡霸被先後正法，不出兩年，盤踞上海半個世紀以上的黑社會勢力，基本上肅清。而關於上海妓女的問題，當時登記在冊的妓女近 2000 人，妓院是 518 家，而暗娼更是不計其數。[275]陳毅同意民政局、公安局派便衣上街「釣魚」、釣到一個就將一個送往婦女教養所裏就收容。並逐個爲她們全面體檢、治療。短短的一兩年內，上海街頭的妓女硬是絕了跡。另外，每 6 個上海人中就有一個人是窩居在像「棚戶區」、「滾地龍」、「藥水弄」等四周煙囪噴灰、化學品氣味沖天，豬棚似相連的小屋，沒有路燈、自來水、道路，到處都是死老鼠、污水、垃圾……的貧民窟。[276]陳毅親自帶著專管城市修建的工務局長趙祖康去察看。改善棚戶區的工程在上海全面展開：填坑修路，鋪設水管、下水道，植樹裝燈，建立公共廁所……4 年之內，全市有 180 多處像「藥水弄」一樣的較大貧民窟，由國家投資進行了改建。1952 年，第一個工人住宅區——「曹楊新村」拔地而起。新樓成群，綠蔭夾道，還有學校和商店，這在上海以及全國都是首見的。上海在變!沒有了煙館賭場，沒有了妓女，青、洪幫消聲匿跡，社會風氣日益健康向上，人們親眼看到了化腐朽爲新生的奇跡。因此波蘭一家報紙說:「解放了的上海，再也不是世界

[275] 何曉魯、鐵竹偉，《從沙場走向十裏洋場》，頁 173。
[276] 何曉魯、鐵竹偉，《從沙場走向十裏洋場》，頁 177。

污水溝」；[277]印度《實業報》主編來到了上海參觀，漫步街頭與市民們談話，回去後寫了專稿〈上海的奇跡〉，其中贊嘆道:「新的人民政府管理下的上海，是東方的驕傲!」[278]

最後，有關陳毅在上海市長任內，這裡還要特別提到一件關於當時擔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的蔣經國（1910-1988）派密使李次白到上海與陳毅談和的經過。至於李次白是何許人也？他如何成為台灣首位探訪大陸謀和的密使呢？原來李次白此人本是黃埔軍校第六期的學員，但是由於他的哥哥和嫂子是留學法國的中共黨員，而他的妹妹又嫁給了陳毅的胞兄陳孟熙，這些特殊關係使李次白在國民黨軍中的仕途不可能順暢。1946 年下半年，他脫離軍籍，利用積蓄在高雄市，開設了一家名為「凱歌歸」飯店。1950 年春，李次白告訴妻子，蔣經國要派他到去香港與中共洽談，大約十幾天就會回來。同年五月初，國防部總政治部副主任胡偉克將軍等三人到高雄「凱歌歸」飯店訪問次白，說明：「由於美國總統杜魯門宣佈台灣海峽中立化，不再支持蔣總統反攻大陸，台灣面臨共軍的威脅，因為你是大陸華東軍區司令員陳毅的姻親，蔣主任有意派你去上海見陳毅，商談和平統一的事。」[279]六月初，次白抵達上海。

根據中共解密的資料，次白到上海以後，由妹夫孟熙引見，陳毅在家裡設宴招待。[280]次白當轉達了蔣經國的和談意願，希望兩岸和平統一，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最低限度大陸現在不要進攻台灣，免得兩敗俱傷。陳毅當時的回答是：「為時尚早，現在不談這些，以後還有機會，至於台灣就讓他爛下去好了。」[281]陳毅說的「爛下去」，是隱指不久即將攻台，把台灣打爛的意思，因為 1949 年 7 月及年底劉少奇，毛澤東先後訪俄，以獲得蘇聯允諾，以一億五千萬美元的貸款裝備中共海軍，並提供兩百架戰機及人員訓練。但是李次白對「爛下去」的解讀卻是「中

---

[277] 朱經紅，〈陳毅三進上海〉，《黨史天地》，期 3（2001 年），頁 29。
[278] 朱經紅，〈陳毅三進上海〉，《黨史天地》，頁 29。
[279] 李許念婉初稿、萬賡年校編，〈蔣經國密使李次白到上海與陳毅談和〉，《傳記文學》，期 4（1998 年）頁 60。
[280] 高文閣，《台灣與大陸風雲四十年》（長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年），頁 70。
[281] 苗生，〈李次白——台灣首位探訪大陸的謀合信使〉，《文史春秋》，期 6（2001 年），頁 9。

共暫不攻打台灣，讓台灣自己爛下去的意思」[282]。陳毅的態度基本代表了當時中共高層領導對此問題的立場。隨後李次白按照事先預定的聯繫方式發信到香港，將此訊息轉告了胡偉克，這個訊息很快被轉達到蔣經國那裏。6 月 25 日，朝鮮戰爭爆發。此後在香港的胡偉克接到來自臺灣的指示：「國共合作之事不必說了」，[283]胡偉克馬上將這個訊息急函告知在上海的李次白。毫無疑問，胡偉克給李次白的「國共合作之事不必說了」的指示，並不僅僅是因爲陳毅那句「爛下去」的表態，另外由於朝鮮戰爭的爆發也使得美國改變了以往不支持臺灣的地緣政策，從那時起美國爲了自己全球的利益開始公開支持臺灣，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宣佈台灣中立化，兩岸互不侵犯。台灣既不受戰爭威脅，台灣方面就令次白暫留大陸待命。但是在大陸，次白卻以國特的罪名關進青海大牢四年，刑滿後施以勞改、批鬥凡 26 年，至 1980 年被驅逐出境而抵香港，而台灣方面以叛國罪不准他入境，流落香港 8 年，有國、有家而歸不得。

第二節　外交部部長

從 1958 年 2 月 11 日開始，陳毅被任命爲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成爲周恩來總理在外交工作上最得力的助手。其實陳毅外交的才華在早年就已表現出來。例如，在 1921 年勤工儉學時作爲留法學生代表與中國駐法公使的談判、抗爭；1927 年底在韶關教堂大門口與法國神父的洽談；1946 年停戰時期和美軍代表的折衝周旋，一一表現出他是這方面的卓越人才，而他在統一戰線工作中的成就更是全黨範例之一。[284]因此在 1958 年以前毛澤東就多次借重陳毅在外交上的長才讓他參與了許多外事活動。例如在 1952 年 10 月陳毅隨同劉少奇參加蘇共「十九大」，曾受到史達林親切接見。但即便如此，陳毅也不盲目崇拜蘇聯，而是獨立思考和客觀地觀察蘇聯。他看到了與國際主義精神同時存在的某些大國主義陰

[282] 苗生，〈李次白——台灣首位探訪大陸的謀合信使〉，《文史春秋》，期 6（2001 年），頁 10。
[283] 李許念婉初稿、萬賡年校編，〈蔣經國密使李次白到上海與陳毅談和〉，《傳記文學》，期 4（1998 年）頁 61。
[284] 李學明.，〈毛澤東說陳毅——天才的統一戰線的執行者.〉，《四川統一戰線》，期 11（1997 年）,頁 36。

暗面，看到了事物的複雜性及值得憂慮的前途。此外，在 1954 年 10 月，陳毅就曾率中國黨政代表團出訪當時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臨行前，陳毅向毛澤東請示有關德國之行的重點。毛澤東指示他對「整個德國」的情形作一番考察研究。陳毅敏銳地感到毛澤東對「整個德國」的涵義是具有戰略思想發展新因素的:因爲早在 1946 年，毛澤東就提出了所謂「中間地帶」的理論，[285]採取了三分世界的方法，把歐洲國家也列在應該爭取的「中間地帶」，這是陳毅早已熟知的。後來，由於國際鬥爭形勢的變化，中國共產黨接受了「兩大陣營」的理論，採取了「一邊倒」的政策。[286]現在毛澤東提出要對「整個德國」進行考察，陳毅理解了這一交待的重要意義：即瞭解西歐國家，爭取西歐國家。10 月五日，陳毅率代表團抵柏林，開始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訪問並參加其國慶 5 周年慶典。在訪問期間，陳毅花大量的時間綜合瞭解德國情況特別是聯邦德國情況。工業恢復程度、科學技術水平、產品競爭能力，與美國、西歐各國的經濟聯繫及矛盾，一直到諸如移民、戰俘、外國駐軍、知識階層的情況，他都一一摘記、分析，有時還邀請來自聯邦德國的教授、藝術家、工人代表談話，進行了縝密細致的科學的考察。回到北京的當晚，風塵僕僕的陳毅便向周恩來總理作了訪問情況的匯報。其中特別談到德國戰後經濟恢復的經驗，認爲值得中國重視和借鑒。接著，陳毅又起草了關於德國情況的報告，對東、西德狀況和未來發展趨勢作了分析，受到中央的好評。

當時國際舞臺上，以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同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陣營嚴重對立，亞非拉民族獨立解放運動方興未艾，中共外交旗幟鮮明地反對美國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加強同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發展與亞非拉民族獨立國家和其他國家的聯繫。因此陳毅在 1955 年隨總理周恩來出席第一次亞非會議（即萬隆會議）的經歷，真正使陳毅領略外交鬥爭的複雜性和「藝術性」。[287]周恩來是中國代表團團長和首席代表，陳毅是團員、代表，是總理最重要的副手。1955 年

[285] 張輝，〈從“中間地帶”理論到“三個世界”理論論毛澤東的國際統一戰線思想〉，《桂海論叢》，期 3（2004 年），頁 41；卿臻，〈從“中間地帶”到“三個世界”看毛澤東國際統戰思想的價值取向〉，《廣西經濟管理幹部學院學報》，期 3（2004 年），頁 77-78。

[286] 孟慶凌，〈建國初期“一邊倒”外交戰略解析〉，《遼寧教育行政學院學報》. 期 11（2006 年），頁 12-15；劉建飛，〈意識形態對新中國“一邊倒”決策的作用〉，《國際論壇》，期 5（2000 年），頁 42。

[287] 田春德，〈試論對外宣傳工作的戰略地位〉，《長春師院學報》，期 4（1995 年）頁 86；張昆生〈陳毅的外交智慧〉《觀察新聞》頁 40。

4 月 7 日，時任總理兼外長的周恩來率領中國代表團啓程離京抵達昆明。而先期啓程的中國部分工作人員乘坐的「克什米爾公主號」客機在從香港飛往萬隆途中爆炸墜海，8 名中國代表團工作人員及新聞記者、3 名外國人員及部分印度機組人員遇難！這就是震驚世界的「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288]事後查明是台灣特務機關收買香港機場一職工，在機上安放了定時炸彈所致。然而周恩來總理與陳毅幾經商議，仍決定按原計劃如期出發。4 月 16 日，專機經停仰光，次日終于安全飛抵萬隆。1955 年 4 月 18 日上午 9 時 15 分，亞非會議在萬隆獨立大廈隆重開幕。大會發言一開始，就有人對中國發出共產主義就是新殖民主義的陣陣指責，言辭激烈刺耳，會場充滿火藥味。接著某國代表在發言中甚至表示懷疑中國在邊境成立民族自治州是爲了向鄰國搞「滲入」、「顛覆」。會場氣氛極度緊張，簡直一觸即發。在 4 月 19 日中午短暫的休會時間內，周恩來和陳毅等深入研究，決定堅持並更加明確地表述求同存異的方針，並親自起草了一個補充發言稿。下午開會時，周恩來發言說：

> 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本來，對於美國一手造成的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我們很可以在這裏提出，請求會議加以討論。……中國在聯合國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也可以在這裏提出批評。但是我們並沒有這樣做。因為這樣一來，就很容易使我們的會議陷入對這些問題的爭論而得不到解決。……我們的會議應該求同存異……。[289]

僅僅 18 分鐘的補充發言使兩天的會議達到了高潮，許多代表過來向回到座位的周恩來握手祝賀。菲律賓代表稱贊中國代表團的態度和周恩來的演說是極爲出色的、和解的，表現了民主精神。巴基斯坦的總理則說：「我是帶著成見來的，但想不到周恩來總理這樣尊重別人的意見」。[290]陳毅個人則認爲這是馬列主義外交的典範，是給我們代表團學習得最多的一次磨煉。在代表團中，他以「學生」和「練習生」自喻，[291]處處突出總理的作用，而實際上他是周恩來不可缺少的副手，

---

[288] 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 年 1 月），頁 131；王永欽，〈萬隆:國民黨一號幽靈在行動 ——“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爆炸始末〉，《兩岸關係》，期 3（2001 年）頁 28-31；蔣本良，〈也談“克什米爾公主號”墜機事件——根據外交部原始檔案〉，《百年朝》期 5（2006 年）頁 78-92。
[289] 李曉勇，（萬隆會議上的周恩來）《百年潮》，期 2（2005 年），頁 20。
[290] 李曉勇，（萬隆會議上的周恩來）《百年潮》，頁 21。
[291]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298。

尤其在會場內外與各國代表積極接觸，廣交朋友這一點上，做了出色的貢獻。他和印尼外交部長、國防部長多次交流經驗，向緬甸工業部長介紹中國自力更生建設工業的計劃。盡管意識形態各異，但共同的願望和目標使彼此瞭解和接近了。正是本著這樣的精神，會議終於達成了團結反帝的決議和聞名於世的「萬隆會議十項原則」。[292]萬隆會議第一次表達了亞非人民爭取團結的巨大力量。

萬隆歸來之後，陳毅開始參加外交部各次黨組會議，為接手外長工作做準備。他專管、分管的工作又多，終年日夜忙碌。1956 年 11 月 1 日，就在他即將隨周恩來總理對印度等國進行重要訪問的前兩天，突然在印度駐華大使的宴會上暈倒，他因此不得不休息了一年多，但仍出席許多重要外事活動。1957 年 5 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伏羅希洛夫來訪，周恩來總理在宴席上向客人介紹說：「這是陳毅同志，最近從華東調進中央，今後準備由他主持外交工作」。[293]

1958 年 2 月 11 日，新華社正式公佈了任命陳毅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的消息。陳毅就任外長 3 天，便首次以新身份隨周恩來總理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作友好訪問，並安排中國人民志願軍在年內全部撤回中國。朝鮮戰爭結束了，然而。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888-1959）支持蔣介石反對中共，因此陳毅上任時正值台灣海峽局勢緊張之際，陳毅是以何種態度看待向來就緊張複雜的中美關係呢？事實上在攻佔上海之初就有人提出了中國應該做美蘇之間的橋梁的主張，陳毅堅決的駁斥批評，並告之毛澤東。毛澤東道：「這話的意思就是要中國人腦殼著地，背拱起來，讓美國人從中國人背上走到蘇聯去，讓蘇聯人從中國人背上走到美國去。我們難道能這麼幹嗎？」陳毅表示：「主席挖苦得好，誰願意幹誰可以去幹，我這個外交部長是不幹的！」[294]由此可以看出此時任外長的陳毅與毛澤東一樣，對中美關係是採取非常強硬的態度。而毛澤東對美國強硬的態度，可以說從韓戰期間中共面對美國杜魯門（Harry S.Truman，1884-1972）總統及其後繼者艾森豪（Dwigh David Eisenhower，1890-1969）先後發表不排除使

[292] 陸庭恩，〈論萬隆會議及其影響〉，《西亞非洲》，期 3（2005 年），頁 14；裴堅章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 1949-1956》（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 年）頁 235~ 237。
[293] 何曉魯，《元帥外交家》，頁 22。
[294] 王愛東，〈炮擊金門背后的政治、外交斗爭〉，《貴州文史天地》，期 1（1999 年），頁 69。

用原子彈以儘快打破戰爭僵局所謂「核訛詐」[295]的政策時，就可看出毛澤東當時已經意識到，中國如果不想任人宰割，那就不能沒有原子彈，唯有發展核子武器才可能與美國相抗衡強硬的想法。[296]再加上在一九五八年的台海危機中，美國又再次暗示將進行核打擊，[297]亦是促使中共想要建立核子戰略武器的主要因素。[298]因此，毛澤東在此時任用軍人出身的陳毅擔任外長，自是毛澤東對美強硬態度的延續。而在此當時的陳毅也強硬的表態：「即使當了褲子，也要把原子彈搞出來」；[299]也多次對負責發展核事業的老帥聶榮臻（1899-1992）說：「我這個外交部長的腰桿還不太硬，你們把導彈、原子彈搞出來了，我的腰桿就硬了」。[300]就是這種美國與中共互相敵視的態度未曾稍減，因此，在 1958 年 8 月 8 日，美國海軍參謀長揚言，美國海軍正密切注視著台灣地區局勢，隨時準備進行像 7 月 14 日直接出兵黎巴嫩一樣，直接出兵人侵黎巴嫩，對台海局勢進行干涉。8 月 23 日陳毅在參加羅馬尼亞駐華使館的宴會上，針對美國軍隊以「保衛供水系統」爲名駐兵古巴、又以「休息和避署」爲藉口，進駐新加坡的行徑，譴責美國當局:

> 我們中國也派一支軍隊去外國，找一個地方「避暑」，行不行?如果這些道理能成立，那麼美國不是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把它的軍隊派到任何國家去嗎?同樣，任何國家不也可以在任何時候把軍隊派到美國去嗎?[301]

在此同一時間，中共駐守福建前線部隊萬炮齊發，對金門國軍發起了猛烈轟擊。陳毅認爲帝國主義想要搞緊張，我們就來搞緩和；他再搞緊張，我再搞緩和；如果他還硬要搞緊張，那我們就比他更緊張，帝國主義是最經不起緊張的！炮擊金門，是爲了反擊國民黨部隊的騷擾，也是爲了反對美國搞「兩個中國」的陰謀。[302]

---

[295] 趙學功,(論艾森豪威爾政府在朝鮮戰爭中的核訛詐政策),《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期 4(1997 年),頁 46~47。
[296] Michael J.Mazarr,*Missile Defences and Asia Pacific Security*(London:Macmillan Press,1989),pp.109-113。
[297] 林中斌,(核霸:透視跨世紀中共戰略武力》(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99),頁 119、202。
[298] John Wilson Lewis & Xue Litai,*China Builds the Bomb*（Stanford,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11-34。
[299] 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劉杰,〈我國原子能事業的決策和組織者〉,《不盡的思念》（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 年,12 月）,頁 319；李覺,〈我國第一科原子彈爆炸的要聞〉,《百年潮》期 10（2004 年）,頁 23。
[300] 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4 年）,頁 812。
[301] 何春陽,〈炮擊金門的國際較量〉,《文史精華》期 5（1999 年）,頁 18。
[302] 張昆生,〈陳毅的外交智慧〉,《觀察與思考》,期 12（2003 年）,頁 19。

9 月 4 日，中共中央正式宣佈本國領海的寬度爲 12 海裏，未經中國政府許可，一切外國飛機和軍用船舶不得進人中國的領域。9 月 6 日，周恩來總理發表了〈關於台灣海峽地區局勢的聲明〉，重申解放台、澎、金、馬是中國的主權，任何外國不得干涉。9 月 8 日，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絞索」戰略的談話，杜勒斯 9 月 9 日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願意恢複同中國的大使級華沙會談。但是會談在 9 月 15 日復會後，美方在會上又要求在台灣海峽立即「停火」，以保護台灣。9 月 20 日，陳毅發表聲明反擊:

> 消除台灣海峽緊張局勢的關艘，不是什麼停火問題. 而是美國軍隊撤出台灣地區的問題。中美之間沒有打仗，根本談不上什麼「停火」。中國人民不論用何種方式解決自己的領土，都是中國人民自己的事悄。[303]

10 月 6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國防部長彭德懷的文章〈告台灣同胞書〉，宣佈從 16 日起暫停十天炮擊，以便金、馬駐軍輸送供應，並建議談判解決分歧。文告震動了世界，標示著金門炮戰已經遠遠超出了軍事鬥爭的範疇，進人政治外交鬥爭的新階段。[304]這樣的結果，對態度強硬的外長陳毅而言，他真正想法是美國固然不好惹，可是世界上還有一個中國更不好惹呢！[305]

此外與美國相對應的，還有另一個大國蘇聯。50 年代末，中、蘇兩黨在對馬列主義、國際共黨等重大原則問題上的分歧逐漸公開化。1959 年 9 月 30 日，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在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周年的盛大國慶宴會上，爲了中共對台政策，很不客氣地教訓中共不要用武力去試驗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固性，[306]陳毅當即起來反駁。赫魯曉夫沖著陳毅說道:「好！我知道你是元帥，我是中將，軍事上我得服從你，但現在黨內我是第一書記，你只是政治局委員，你應當聽我的」！[307]陳毅回答說:「你是第一書記不錯，但你講得不對我們就不聽你的，這是兩個黨在談問題嘛」![308]。另外，由於在 1958 年蘇聯曾經提出與中國共建長波電台和海軍聯合艦隊兩項損害中國主權的建議，遭到中國方面拒絕，赫魯曉夫

---

303 何曉魯，《元帥外交家》，頁 46。
304 何春陽，〈炮擊金門的國際較量〉，《文史精華》，頁 19。
305 何曉魯，《元帥外交家》，頁 49。
306 張強，〈60 年代中國外交戰略演變与調整的緣起〉，《黨史研究與教學》期 5（2001 年），頁 43。
307 何曉魯，《元帥外交家》，頁 54。
308 何曉魯，《元帥外交家》，頁 54。

此次來到中國，此事又被重提並受到中共方面的責問，可是赫魯曉夫硬說那是某些政府部門幹的事與他無關。陳毅立即與他當面對証事實，令他語塞。碰壁之後他並未改弦更張，反而進一步採取了擴大和公開中蘇分歧的做法，此後，中蘇關係被一步步推向破裂邊緣。1960 年 7 月 16 日，蘇聯政府突然照會中國，全部撤走在中國的 1390 名專家，撤毀 343 項合同，廢除 257 個科技合作項目。陳毅對蘇聯的做法十分憤慨。8 月 4 日，他向蘇聯駐華大使抱怨蘇聯此舉中國經濟受損失事小，對兩國友誼造成傷痕事大。中蘇兩國在馬列主義理論和國際問題上有分歧可以辯論，但不能傷害同志友誼，希望兩國關係不要再壞下去。陳毅作爲中共科技戰線早期領導人之一，對蘇聯片面撕毀爲中國建立核工業提供技術援助的協定，[309]並和美、英一起簽訂所謂三國部分核禁試條約來剝奪中國及其他國家建立自己核力量權利的行爲尤感氣憤。蘇聯的目的無非就是要中國在帝國主義核威脅面前依賴蘇聯的「核保護傘」，聽命於蘇聯。[310]而身爲外長的陳毅對蘇共「老子黨」的作風是堅決抵制的。他對此有一句傳播於世的精確譬喻——「我們不做衛星國」。[311]在 1962 年西方記者報道陳毅在日內瓦記者招待會上的談話，便用這話作爲黑色粗體字通欄大標題。陳毅在那次談話辛辣地說：

> 蘇聯的衛星重 1000 噸。但有著 6 億人口的中國是太重了，作為一顆衛星，未免太重了一點。——我們不希望擁有衛星國，但也決不做任何人的衛星國！[312]

中國政府在 1963 年 6 月 6 日在答覆蘇聯政府的備忘錄中宣佈：「中國人民決不承認某一個或某幾個大國壟斷世界核力量，對別的國家任意發號施令的特權」。[313]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四周的鄰邦有的對新中國存有疑懼，怕中國以武力擴展領土。國際上對中國不友好的各種勢力，也乘機挑撥中國與鄰國的關系。對於邊界和四周的鄰邦，陳毅總是堅決貫徹中共中央制定的外交政策，嚴格按照和平共處五項原則，[314]通過和平協商解決問題，決不採取擴張政策。1960 年，陳毅隨同周恩來總理訪問緬甸、印度、尼泊爾、柬埔寨，同年 8 月還單獨率團訪問了

---

309 沈志華，〈蘇聯對中國研製核子武器的幫助與制約〉，《二十一世紀》，期 28，（2004 年），頁 15。
310 沈志華，〈蘇聯對中國研製核子武器的幫助與制約〉，《二十一世紀》，頁 1、13。
311 謝益顯.，〈新中國五十年外交偉業及其啓示〉《外交學院學報》，期 1（2000 年），頁 18。
312 謝益顯.，〈新中國五十年外交偉業及其啓示〉《外交學院學報》，頁 18。
313 謝益顯.，〈新中國五十年外交偉業及其啓示〉《外交學院學報》，頁 18。
314 唐天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強大生命力〉《瞭望》，期 24（1994 年），頁 38-42。

阿富汗。中緬兩國由於政權更迭，歷史變遷，形成邊界現狀的原因很複雜，因此兩國邊界有很長一段未標定。中共建國初期，國軍常至緬甸境內，過境來挑釁共軍。毛澤東一再指示共軍不能過界追擊。陳毅曾對緬甸朋友提到中緬是親戚國家，完全可以採取萬隆會議原則來解決兩國之間的問題。1960 年緬甸總理奈溫（1911-2002）訪問中國時與周恩來草簽了中緬友好條約和邊界問題協定。因此，當中國總理和外長的來訪時，緬甸人民盛情歡迎。中國代表團抵達的第二天便應邀參加了緬甸傳統節日潑水節。人們沒想到的是出現在大家面前的中國總理和副總理竟穿著圓領白色小褂，圍著沙籠，服拖鞋，頭紮白紗帕，完全與緬甸人一樣裝束，興致勃勃來到人群中，一同潑水慶祝。[315]這年年底，在陳毅又一次隨周總理率 400 人之多的文藝、體育代表團參加緬甸獨立 13 周年紀念活動時，雙方互換了中緬邊界條約批准書。另外，中國與尼泊爾也有未定的邊界。中國過去出版的地圖將珠穆朗瑪峰劃在中國境內，而尼泊爾則把珠峰劃在邊界上。居於對尼泊爾人民的友誼和感情的尊重，中國同意尼方關於兩國邊界線通過珠穆朗瑪峰的劃法，峰頂北部歸中國，峰頂南部歸尼泊爾。周恩來和陳毅這次訪問除了商談中尼友好合作事宜外，繼續就具體邊界事項交換意見，順利簽訂了中尼和平友好條約，並交換了中尼邊界協定批准書。在訪問此行最後一站柬埔寨行前，突聞柬埔寨國王逝世，周恩來和陳毅仍按期前往，並爲代表團成員在國內趕制了黑、白色服裝，訪問期間參加國王弔唁，使柬埔寨朋友們深受感動。訪問期間正遇柬埔寨 40 年來最酷熱的天氣，陳毅頂著烈日在金邊「王家田」廣場向青年群眾演講，高度評價西哈努克親王的中立愛國主義政策。陳毅的講話一次又一次爲歡呼聲打斷。巴黎《戰鬥報》評論:「北京頭號外交家在仰光、加德滿都和金邊取得了完全的勝利」。[316]

1960 年 8 月，陳毅單獨訪問了西睡鄰國阿富汗，參加其獨立 42 周年慶典。陳毅在抵達當晚，拜訪了國王、首相和大臣們。陳毅獨特的外交風格、坦城爽朗的個性，使賓主相處十分融洽。在互諒互讓的基礎上，雙方又簽訂了中阿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1962 年，陳毅又訪問了印度尼西亞，簽訂了中國與印尼的友好條約。

---

[315] 胡居成，〈陳毅與外國領導人交往二三事〉，《陳毅與外國領導交往二三事》，頁 60。

[316]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248。

陳毅訪問無數友好鄰邦，然而還有一個陳毅始終未去訪問卻又始終掛在心上的鄰邦，那便是日本。陳毅個人認爲中國雖與日本無官方往來，可以以民間友好往來方式進行交流。一次，陳毅培周恩來接見日本訪華代表團時向松村謙三建議：「圍棋、乒乓、書法、蘭花都可以交流。不談政治，只談友好」。[317]於是 1960 年 6 月日本第一個圍棋代表團訪問中國，之後雙方圍棋代表團互有往返，日本棋院爲了感謝陳毅對中日圍棋界友誼交流的關懷，日本圍棋界還贈送給這位元帥棋手名譽七段稱號的證書。[318]終於在周恩來和陳毅的長期努力下，中國與日本的關係在1960 年也出現了轉機 8 月，日中貿易促進會專務理事鈴木一雄訪華，經陳毅與毛澤東、周恩來研究後決定，向日本提出了貿易三原則，即爭取通過政府協定、民間合同和個別照顧三個渠道，促進中日貿易的發展。這得到了日本經濟界的歡迎，中日貿易逐漸發展起來。到 1962 年秋，松村謙三先生和日本前通商大臣高崎達之助先後訪華，中日關係進人半民半官的階段。到了 1963 年 3 月和 11 月，陳毅又代表中國政府分別同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簽訂了邊界協議和條約。雙方互諒互讓，友好協商，使問題得以公平合理的解決。在處理國與國事務中，陳毅堅持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爲指導，同周邊國家友好地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對加強和鞏固與周邊國家的團結和友誼，維護亞洲和平作出了積極的努力。此外，從 1963 年 12 月起，陳毅隨同周總理開始了訪問亞非歐國家的萬里行程，在近兩個月的時間裏先後訪問了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今埃及)、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斯、加納、幾內亞、馬裏、埃塞俄比亞、索馬裏、蘇丹及阿爾巴尼亞等國，歸途中又訪問了緬甸、巴基斯坦和錫蘭(今斯里蘭卡)。在這次訪問中，中國表示支持亞非各國的獨立自主，並廣交朋友，極大地促進了與亞非國家之間的友誼。代表團對出訪國家的獨立自主表示衷心的祝賀，有的當即建立了外交關系。在阿聯和阿爾及利亞，周恩來和陳毅都提出了中國同亞非國家關系的「五項原則」:一、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的鬥爭;二、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國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結盟政策;三、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國人民用自己選擇的方式實現團結和統一的願望;四、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國家

[317] 何曉魯，《元帥外交家》，頁 84。
[318] 何曉魯，《元帥外交家》，頁 85。

通過和平協商解決彼此之間的爭端;五、主張阿拉伯和非洲國家的主權應得到一切其他國家的尊重，反對來自任何方面的侵略和干涉。[319]亞洲各國領導人對中國的這一立場都表肯定。在 1964 年 1 月 27 日訪非洲途中法國與中共建交，這是西方大國第一個與中共建交，轟動國際。是中共外交擺脫兩面受敵、尋找新的戰略空間思想指導下的一個突破。[320]因此中國與法國正式宣佈建立了外交關係，是中國外交的一大勝利。陳毅就專程從外地趕回北京，與周恩來一起同前法國總理富爾商談過建交問題。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說「法國的承認是一個重大的突破」。[321]法國戴高樂總統則公開的表示:「法國承認的，僅僅是世界的現實」。[322]接下來，在馬里的訪問過程，周恩來和陳毅與凱塔總統主要是談經濟援助的問題，中國主動提出了中國對外援助的「八項原則」，答應幫助馬里建設米廠、皮革廠、卷煙廠等等。馬里人愛喝茶，過去每年從中國進口。訪問期間，中國方面表示中國寧可失去自己的茶葉出口市場，也要派出專家幫助馬里人民種植和炒製茶葉。周恩來與陳毅寬闊的胸懷贏得了馬里人民的信任和友誼。這次亞非之行，增強了中國與各國之間的瞭解，促進了友誼。尤其周恩來、陳毅提出的「五項原則」和「八項原則」，[323]實際上爲中國處理同所有第三世界國家的關系確立了具體的準則，亞非各國首長的反映很好。就如緬甸總理奈退請陳毅轉告中國領導人，在他有生之年，絕不向外國提供軍事基地來反對中國。亞非國家大多是些小國、窮國和弱國，在國際上，有的國家視之爲「包袱」和「累贅」，並對這些國家尋求援助嘖有煩言。陳毅在一次講話中堅定表示:「新中國的外交政策就是抵抗大國，支持小國，反對大國幸小國作為交易的籌碼，這是真正的馬列主義」。[324]。爲了團結更多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朋友，支持被壓迫人民的民族運動，陳毅平時只要稍有空閑，就盡量接待外國客人，往往一談就是兩三個鐘頭。進人 60 年代，他不辭辛苦，頻頻出訪。1964 年 11 月 6 日，陳毅訪問阿爾及利亞、阿聯、巴基斯坦

---

[319] 唐天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強大生命力〉《瞭望》，頁 38-42。
[320] 雙驚華，〈1964 年中法建交衝擊波〉，《歷史教學問題》，期 2（2006 年），頁 58。
[321] 張強，〈60 年代中國外交戰略演變与調整的緣起〉，《黨史研究與教學》，頁 42。
[322] Wladyslaw Wszebór Kulski, *DeCaulle and the World: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Fifth French Republic*（SyracuseUniversity Press，1966）, p.354。.
[323]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316。
[324] 梁志明.，〈亞非人民的國際盛會:背景與成就——亞非會議 50 周年紀念〉，《當代亞太》期 5（2005 年）頁 48。

之後回到北京，只停了一夜，第二天即啓程去柬埔寨慶祝獨立日。22 日回北京,4 天後又離京訪問印尼。1965 年 3 月，他又接連訪問了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爾，4 月又隨同周總理去印尼參加紀念萬隆會議 10 周年慶典。回國後陳毅卻病倒了，然而在病好之後又在 3 個月中接連 3 次出訪亞、非 9 個國家，行程數 10 萬里。陳毅在中國外交事務中不辭辛勞，不懈努力，爲中國贏得了日益增多的朋友。到 1965 年，與中國建交的國家有 49 個，其中 34 個是亞非國家。[325]

陳毅任外長時期除了馬不停蹄的出訪亞非等國家外，也多次出席國際重要會議，其中以在 1961 年 5 月初在日內瓦所召開關於老撾問題的擴大的日內瓦會議，甚爲重要。這次會議是陳毅第一次單獨負責、率團代表中國出席的重要國際會議。此地在 7 年前曾舉行過一次關於朝鮮、中南半島問題的日內瓦會議，周恩來總理以出色的外交努力，促使會議達成一系列協議，通過了〈日內瓦會議最後宣言〉。但是美國代表卻拒絕在協議上簽字，只表示美國不使用威脅或武力去妨害這些協議。然而在 1961 年 5 月美國派出「特種部隊」進入南越，策動老撾右派兩次推翻了中間派富馬親王爲首的聯合政府，使老撾陷入全面內戰，有關協議被破壞殆盡。這次中、蘇、美、英、法、越等 14 國首長開會，就是爲了和平解決老撾問題。臨行前，代表團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直接關心下，做了周密細致的準備工作，陳毅對與會各國態度作了詳細分析。中國參加會議的方針是：爭取在 1954 年日內瓦協議的原則基礎上，達成新的保証，尊重老撾獨立和中立的國際協議。[326]陳毅於 5 月 10 日一到日內瓦便得知會議延期了，因爲美國以未收到國際委員會核送老撾停火的報告爲由，拒絕出席會議。各國代表團足足等候了兩天，報告總算送到。但美國又橫生枝節，說老撾左派力量代表無權出席會議。陳毅即與中國代表團人員商量，不能任由美國這樣刁難設障，應予以揭露駁斥，決定主動進擊，在中國領事館召開記者招待會，譴責美方破壞會議的行徑。此舉震動了日內瓦。美國國務卿臘斯克（Dean Rusk）忙召集記者作辯解，但無濟於事。各國記者普遍認爲中國代表團一開始便取得了主動，將美國送上被告席。陳毅與臘斯克較量第一個回合的結果是：5 月 16 日，老撾左派力量代表出席，日內瓦會

---

[325] 何曉魯，《元帥外交家》，頁 87。

[326] 劉正英、卓愛平，〈元帥外交家〉，《黨史縱覽》，期 7（2002 年）,頁 11。

議正式開幕。16 日下午陳毅在開幕會議上作了 18 分鐘的講話，闡明中國政府原則立場、觀點和主張，指出老撾的內部問題，必須只能由老撾人民自己解決；老撾問題的國際方面則是創造必要的國際條件，使老撾人民真正能夠在不受外來干涉的情況下實現自己解決內部事務的願望。他還提出希望美國代表能夠認真地同大家一起，尋求和平解決老撾問題的途徑。第二天，報紙紛紛發表評論認爲，陳毅外長的發言是「積極的、得體的、和解的」。然而，臘斯克在第二天發言中打出「中立定義」這張牌，給老撾中立的概念下了一個定義：「必須超出不結盟的經典的概念」，[327]說穿了就是要實現與美國結盟的老撾右派上臺當政的「中立」。陳毅毫不客氣，在第二次發言中即引用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888-1959）過去說過的「中立是不道德」[328]的名言，回敬臘斯克，指出臘斯克的中立定義實質還是干涉侵略。後來臘斯克又主張在老撾發展一個有效的國際機構，國際監督機構可以充分往來老撾全國各地，無需取得老撾任何全國性或地方性文武官員的同意；這種國際監督機構可以裁編老撾的軍隊。陳毅則認爲美國設想的這種國際監督機構，是要把老撾置於國際共管之下，而不是在尊重老撾獨立的基礎上維護老撾的中立。爲了保証老撾的中立，並爲此進行必要的國際監督，蘇聯代表團在和中國代表團一再磋商後提出了〈關于老撾中立的宣言〉草案。陳毅附和蘇聯的建議，因爲它是以 1954 年日內瓦協議爲基礎的，是劃清了老撾問題的國際方面和國內方面的界限的，是符合老撾人民要求和平、獨立和中立的願望的。然而，會議進展困難重重。從 5 月末起，由於美國三番兩次在老撾戰場停火問題上作文章，由於老撾左中右三方遲遲未達成協議，會議時開時斷，陷入踏步不前的僵持狀態。美、英、蘇、法外長都相繼將會議工作交給副手，離日內瓦回國了，只有陳毅仍留下來，積極活動，開展工作。英國外交大臣霍姆（Alec Douglas-Home，1903-1995）勛爵與陳毅多次互訪、晤談，有時融洽，有時也有分歧。一次霍姆就中國向非洲「滲透」問題直接問陳毅：「為什麼你們不能夠不管別人，而專心致力於國內繁重的建設任務呢？」陳毅坦率對他說：「你們西方人的毛病，就在於

[327] 李清泉，〈關於第二次日內瓦會議的簡要回顧〉，《江淮文史》，期 4（2001 年），頁 32。
[328] 蔡佳禾，〈冷戰與 60 年代南亞新國際格局的形成〉，《黨的文獻》，期 1（1994 年）頁 56。

你們總是從個人的一生出發來思考問題，而我們卻認為這過於狹窄。」[329]事隔多年，霍姆仍稱陳毅爲「一個有用的朋友」。[330]6 月初，美蘇兩國首長在維也納舉行會議，日內瓦會議休會。許多國家引頸翹首，等待甘迺迪 （John Fitzgerald Kennedy，1917-1963）與赫魯雪夫會談結果。然而維也納會談也未就任何實質性問題達成協議。與此同時，陳毅卻力爭主動。他廣泛開展會外活動，促成老撾富馬、蘇發努馮和文翁 3 親王會晤。美國多次阻撓此事，陳毅則以堅持不渝的耐性，多次與西哈努克親王、法國和印度代表磋商，多方推進，終於取得 3 親王在蘇黎世會晤的成功，並就老撾內部問題達成了原則協議。既然如此，會議就再沒有理由不進入實質性討論了。美國仍不甘心，又在會上拋出一個新草案，要由國際監督委員會來全面管制老撾的外交、內政、軍事、經濟。陳毅在會議第五次發言中揭露這是：「利用保護之名實行強占之實」。[331]陳毅綜合歸納了開會以來各代表中所有可取意見，取其精髓，列出了 4 個方面的共同點，也即求出了各國發言的「最大公約數」，表現了靈活的策略思想及平等協商、尋求協議的精神。至此，會議開始協議具體條款的談判，可是前面還有一段漫長艱辛的路要走，陳毅請示中央之後決定暫離日內瓦回國，將代表團工作留給副外長章漢夫（1905-1972）及部長助理喬冠華（1913-1983）去做。臨行前，陳毅參加了一次富馬親王和蘇發努馮親王舉行的雞尾酒會，遇見了美國代表團人稱美國外交界「不落的明星」代理團長哈裏曼。哈裏曼年屆 70，。他雖反共，但不贊成杜勒斯「遏制」中國的死硬政策，並提出過訪問中國的申請。此番來日內瓦，他做出一些較爲積極開明的姿態。酒會上，他想和陳毅搭上話，先與中國王炳南（1909-1988）大使搭話，又讓夫人與中國女工作人員搭話，最後，由加拿大代表朗甯介紹，主動向陳毅伸出右手。兩隻手剛一握住，記者們便紛紛搶下這一有歷史意義的鏡頭。法國巴黎《快報週刊》語大肆的評論：「美國政治家主動和中國政治家握了手，這是多年來破天荒的第一次」」。[332]陳毅二度重來日內瓦時，已是第二年（1962 年）7 月了。這期間會議曲曲折折斷斷續續，終於在 7 月 21 日，第二次日內瓦會議達成了協議，一致通

[329] 何曉魯，《元帥外交家》，頁 84。
[330] 曉亮、文軍主編，《十大元帥之謎》上冊 (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年)，頁 121。
[331] 李清泉，〈關於第二次日內瓦會議的簡要回顧〉，《江淮文史》，期 4（2001 年），頁 36。
[332] 曉亮、文軍主編，《十大元帥之謎》上冊 (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年)，頁 123。

過了〈關於老撾中立的宣言〉和〈關于老撾中立宣言的議定書〉。在這兩個國際檔中，老撾王國政府聲明決心走和平中立的道路，以建立一個和平、中立、獨立、民主、統一和繁榮的老撾，不承認任何軍事同盟或聯盟、包括東南亞條約組織的保護；各與會國聲明：承認並尊重老撾王國的主權、獨立、中立、統一和領土完整，願爲此承擔一系列的義務。檔還規定：法國政府應該盡速把它在老撾的軍事設施移交給老撾王國政府，但老撾王國政府認爲必要時，法國政府可將人數明確限定的法國軍事教練在一個有限的時期內留在老撾，以供訓練老撾軍隊之用；此外一切外國軍隊和外國軍事人員均撤出老撾。美國提出的由中立國家來管理老撾外援和國際委員會淩駕於老撾王國政府之上的主張都被打掉了。會議成功意義何在？陳毅在簽字儀式前的最後一次全體會議上有 3 點評價：其一，証明大國干涉老撾遭到了失敗；其二，証明一個國家的命運只能由這個國家的人民自己決定；其三，証明尖銳複雜的國際爭端是可以通過談判來解決的。[333]代表們對陳毅的見解，紛紛表示贊同並報以熱烈的掌聲。

除了 1961 年 5 月在日內瓦召開的會議外，另外一個陳毅出席的重要會議是在 1964 年 4 月，距離第一次亞非會議召開已有 9 年之久——在雅加達召開的第二次亞非會議籌備會。然而此時的局面卻比 9 年前複雜多了，其中一個原因是由於國際政治力量組合和亞非國家之間的團結出現了一系列新情況：中蘇關係破裂，中印發生邊界爭端，印度巴基斯坦也發生武裝衝突……。陳毅在 4 月 11 日趕到了印尼雅加達出席了會議，與會 22 國代表，11 日開始一般性發言，然而，印度代表團團長卻突然提出，要邀請蘇聯參加第二次亞非會議，理由是蘇聯有很大一部分領土在亞洲。但是在 9 年前開第一次亞非會議時，印度總理尼赫魯曾親口表示過蘇聯亞洲部分之所以未被邀請，是因爲在政治上它是一個歐洲單位，現在又如何一下子顛倒了呢？第二、第三天會議上，印度代表又再三提出邀請蘇聯的建議，陳毅發言加以反駁。然而分歧畢竟太大，牽涉到各與會國與中、蘇、印 3 大國關系，事又來得突然，代表們來不及請示國內，來不及互相研究，只能默守中立，會議眼看陷入僵局。陳毅這才明白：蘇聯領導人早已蓄意插手亞洲事

[333]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312。

務，此次一面要印度發難，一面通過各種途徑向某些與會國施加壓力，想要在多數國家代表缺乏準備的情況下，擠進亞非集團。14 日，會議進入最後一天，關鍵時刻到來了，陳毅作了雄辯有力的發言，指出：

蘇聯是一個傳統的歐洲國家，這是小學生都知道的地理常識，蘇聯自己也從未以亞洲國家自居，在聯合國也從未參加亞非集團活動，為何偏在此時提出這樣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給大會造成爭執和分歧呢？中國並不是因為與蘇聯關係惡化才反對它參加，在中蘇關系很好時，中國同樣認為蘇聯是歐洲國家。中國反對邀請蘇聯，是為了維護萬隆精神，維護亞非會議原則。如果屈從於某些大國壓力而放棄原則，將使我們亞非會議蒙受恥辱！[334]

會場氣氛立即變了，巴基斯坦等國代表紛紛站出來支持中國意見，而印度代表團團長辛格則越發激烈地爭辯。最後小組會宣佈達成了協議：將邀請蘇聯的提案推遲討論，提交給明年召開的第二次亞非會議首長會議作決定。而推遲討論，意味著印度提議未被否決，勢必使明年首長會議一開幕便由此陷入爭論，損害亞非團結。如果籌備會以這樣的一紙決議宣告結束，在陳毅看來將是一次失敗。後來情勢的發展，在陳毅運籌帷幄、鍥而不捨的爭取到多數與會國家代表支持陳毅提案關於邀請蘇聯參加問題的決議，可以技巧性的寫成：

有的國家主張邀請，有的國家反對，有的國家建議推遲到首腦會議上去討論，有的國家反對提交首腦會議。因此，沒有就這問題達成一致協議。[335]

會場一片交頭接耳之聲。辛格經過幾分鐘緊張的思考之後，看看別無良策，終於同意了陳毅提出的方案。這是陳毅外交上的一大勝利。因爲按國際慣例，籌備會上「沒有得出一致意見」的問題，是不能列入首腦會議議程的，更何況根據萬隆精神，在未達成一致意見的情況下，不能強使會議接受部分或某些國家的意見。因此，這樣一來實際上是最終否決了印度要邀請蘇聯參加第二次亞非會議的提案，而又保留了印度代表的「面子」。

此外，對於世界政治局勢來說，從 1964 年到 1965 年，可謂「多事之秋」。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震驚了全世界，美國決策高層爲

[334] 何曉魯，《元帥外交家》，頁 171。
[335] 何曉魯，《元帥外交家》，頁 182。

此還曾經有用武力打擊中國核設施的考慮。[336]此外，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被解除了黨內外一切職務，5 年以前正是赫魯曉夫撕毀了幫助中國建立核工業協議，而今天中共獨立製造的原子彈成爲美、蘇等大國的心腹大患，恰巧也是在赫氏下臺之日。世界各國對中國刮目相看，並且關注著中國成爲一個新的核大國之後會有什麼新的行動。10 天之後，法國《快報》周刊登載了陳毅對該刊記者的一次談話，標題爲〈原子彈沒有什麼了不起〉，陳毅談了有關原子彈的 3 點看法：

> 第一，中國是根據 7 億人民希望和平建設社會主義的原則和世界人民利益來決定自己的對外政策，而不是根據有沒有核武器。第二，核武器是人製造的，不是核武器製造了人。人始終是第一位的，因此人類最終將能消滅核武器。第三，中國研製核武器是為了防禦，為了打破核壟斷，以便最後銷毀這些武器。我們將保証不首先使用核武器。[337]

至於赫魯雪夫下臺後的蘇聯又將如何？中共中央很快派出了周恩來、賀龍（1896-1969）爲首的代表團赴蘇參加十月革命節慶祝活動。但令人失望的是，蘇共新領導非但沒有改善關係的誠意，而且準備在次年 3 月召開分裂性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以達到譴責和孤立中國黨的目的。1965 年 2 月接替赫魯曉夫任部長會議主席的柯西金（Kosygin Aleksey Nikolayevich，1904-1980）訪越途中停留北京，周恩來與陳毅在機場與他談話時，作了盡力勸止的團結工作。[338]柯西金歸途中第二次路過北京，提出想見毛澤東一面。陳毅反映了這一情況，考慮到這場鬥爭重大嚴峻的意義及對中蘇兩國人民負責到底的目的，建議毛還是一見爲好。毛澤東採納他的意見，於是便有了他與柯西金那次著名的談話。而在 1965 年 3 月 1 日，莫斯科會議果真開了場，它對國際共產的發展方面毫無成果可言，反而造成國際共產內部產生了大分化，至此，從二次大戰以來形成的「社會主義陣營」即便在名義也不復存在了。時至 1965 年 9 月 29 日，近 300 名中外記者來到北京人民大會堂，出席陳毅副總理兼外長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世界各大新聞

---

[336] 由最近美國傳媒所透露的解密檔案可知，美國決策層确有用武力打擊中國核設施的考慮。但在最后討論時，都被總統否決。美國的根本政策，還是以外交方式來解決問題。但是對即將擁有核武器的中國，被美國視爲頭號的危險對象，是美國「遏制」政策的主要對象之一。張強，〈60 年代中國外交戰略演變与調整的緣起〉，《黨史研究與教學》，頁 42。

[337]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323。

[338] 焦東華，〈周恩來與柯西金會晤在北京機場〉，《湖北檔案》，期 10（2004 年），頁 40-43。

社都等候著北京發來的消息，看陳毅外長將代表中國作何發言。陳毅胸有成竹，從容不迫，準備好了應付各種最挑剔最難答的問題，並且要旗幟鮮明地表達中國對一系列國際問題的看法。記者首先提出了關於美國在越南南方的兵力增加到 13 萬，在戰場上使用了各種新武器這個問題的看法時，陳毅直截了當地表示越南人民能打敗美國帝國主義，這一點有些人相信，而有些人是不相信的；並表示前些時候，有個法國朋友告訴他，美國的力量還沒有使用完……，陳毅則回問這個法國人：你這話也有道理，但是，越南人民的力量也還沒有使用完，全世界人民的力量也還沒有用完，閣下爲什麼只看到美國的力量呢？[339]接著，幾位外國記者又先後提出有關中印邊界爭端、印巴衝突、中國與東德貿易關係，以及同發展中國家分享核知識等問題，陳毅擇其要點，明確暢快，一一作了回答。最後日本記者又問到中國發展核武器的情況。陳毅深知受過原子彈之害的日本人民對核武器問題極爲敏感關注，因此再一次闡明：「中國保証任何時候不首先使用原子彈。我們的核武器只用於防禦」。[340]陳毅以激昂慷慨的語調，一一回答了記者們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國際問題，坦率地表明瞭中國人民不怕帝國主義、新舊殖民主義壓迫、挑釁、進攻的堅強決心。贏得與會人士一致的讚譽。此時已近 1965 年的國慶，陳毅自 1954 年那個天安門之夜起，參加外交工作也已有 11 年了。陳毅在外交部長任期內不斷用行動實踐証明自己是出色的外交家，順理成章的成爲大家口中的「元帥外交家」。

---

[339]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326。

[340]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326。

第四章　陳毅與文革

第一節　陳毅與二月逆流

1966 年 5 月 4 日至 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在北京舉行。毛澤東此時正在南方的一個城市，沒有參加這個會議，因此，會議由劉少奇主持，由康生（1898-1975）負責向毛澤東請示匯報。毛澤東雖然沒有參加這次會議，但整個會議的基調是由他 4 月在杭州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定下來的。5 月 16 日，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五一六通知)，這標誌著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全面展開。「文革」的爆發，並不是偶然，他是黨內「左」傾錯誤發展到極端的一個必產物。[341]毛澤東對發動文化大革命是下了很大決心的，不惜付出代價，要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342]他並沒有從來自各方面的抵制中冷靜地反思一下，對國內階級鬥爭形式的估計是否正確。採用的方法是否恰當;相反，更加堅決地認爲必須以極大力量排除阻力。5 月 18 日，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簡稱中央文革）成立。組長陳泊達帶領工作組，奪了《人民日報》社黨委的領導權，爲其製造輿論掃清道路。

政治局擴大會議後，5 月 27 日陳毅就向國務院外辦和外交部副部長傳達了會議精神。28 日上午，他又向他主管的外事口各單位的領導作了傳達。但畢竟陳毅自己本身對「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沒有通，這兩次的傳達讓他感到爲難，他的秘書杜易回憶陳毅當時的心境，在書中這樣寫道：

> 兩次傳達之後，陳老總總是搖著頭對我說：「這次傳達檔真難，有好多事情我自己還弄不懂不好講。〈五一六通知〉沒有講清楚怎麼開展文化大革命，也沒講清楚什麼叫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什麼叫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什麼叫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睡在身旁的赫魯雪夫

[341]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年），頁 1。

[342] 「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 7、8 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爲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是非跳出來不可的。」〈毛澤東寫給江青的一封信〉，1966 年 7 月 8 日寫，1972 年 9 月發表，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中共機密文件彙編》（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78），頁 38-40。

是誰？我自己都不曉得，怎麼同人家講呀！」[343]

6 月初，《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了聶元梓的大字報，並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等社論。這一來，北京幾十所大學，幾百所中學都鬧開了。外交部下屬的外語學院等幾所大學當然也不例外。上街的學生亂哄哄，阻礙正常外交活動的情況屢有發生。面對這種突如其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沖擊，陳毅態度鮮明，他對反修防修的「文化大革命」是擁護的，但如此沖垮黨委領導，亂揪亂鬥，造成社會混亂，他有不同看法。後來陳毅得到了毛澤東批准派工作組的消息後，當晚召集國務院外辦中共黨組會議，具體商定工作組成員名單，向外交系統迅速派出 8 個工作組。然而，工作組進駐各外事系統不到一周，各單位造反派貼滿了轟趕工作組的大字報，仿佛有人統一佈置的一樣。運動發展到 7 月中旬，政治局內關於工作組問題的爭論，以劉少奇、鄧小平等為一方，以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1904-1989）、顧問康生為另一方，日趨劇烈、尖銳。爭論的焦點是：「文化大革命」運動究竟要不要堅持黨的領導。大約在 7 月 16 日晚間的政治局會上，雙方都拍了桌子。陳毅支持工作組，憤起辯駁。陳伯達大罵陳毅派往對外文委的工作組是全國最壞的工作組。[344]7 月 24 日，毛澤東召開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並在第二天的政治局會議上宣佈：派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345]中央宣佈撤銷工作組後，外交部副部長姬鵬飛（1910-2000）想不通，他曾詢問陳毅，工作組怎麼說撤就撤了？陳毅回答說：「哎……我也不清楚是怎麼回事！說怎麼樣搞，就怎麼樣搞。現在我們是乾綱獨斷羅！」[346]「乾綱獨斷」這就是陳毅 1966 年 8 月對中共全黨政治形勢的見解。8 月下旬，第一外國語學院造反派要給陳毅戴高帽子的事發生了，緊接著，陳毅歷史上是反對毛主席的、陳毅反對「文化大革命」、陳毅死保工作組，包庇多數派，與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唱對台戲……的流言蜚語在整個北京城到處傳播開來。在一次第二外國語學院批鬥工作組的會議上，

---

[343] 杜易，《大雪壓青松——文革中的陳毅》（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 年），頁 9。
[344]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24。
[345]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24-25。
[346]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頁 87。

陳毅面對造反派質問他到底跟不跟毛主席走的斥責，陳毅義正辭嚴地答復說:

> 我決定跟毛主席走，但是，我不敢保証將來就不反對毛主席的一些意見!我這個人有個好處，就是情願犯錯誤，不怕犯錯誤，非把問題講透!你讓我吞吞吐吐，模棱兩可，鈍刀子割肉，講那種長不像抓瓜，短不像葫蘆的談話，只求明哲保身，恐怕這輩子也學不會![347]

在造反派的圍攻中，陳毅仍然大義凜然地說:

> 你們說我是黑幫分子，是修正主義、機會主義，你們懂什麼叫機會主義?什麼叫修正主義?!如果敵人今天來了，我們每個人發一枝槍，我陳毅打得絕對不會比你們差!也絕不會開小差!告訴你們，我是外交部長，沒有罷官之前，我就是要掌握這個領導權!你們要我交權，辦不到!老實說，我對你們不放心，我就是交，也不交給你們! [348]

對當時他個人處境的分析，1971 年，陳毅在 301 醫院住院時，曾經和當時的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1913-1983）提起在 1966 年 8 月份，只要自己不吭氣，住在中南海是不成問題的。但是，在講與不講的問題上，自己最後還是選擇了講出來。文章不准寫了，再不講話，還算什麼共產黨員! [349]而事實上毛澤東對於陳毅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表現，一開始還是能夠諒解的。1966 年 8 月 30 日晚上，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陳毅也在這裏。當身穿綠色軍裝的毛澤東向他走來時，陳毅習慣地行了一個標準的軍禮，毛澤東微笑地點了點頭，與陳毅握了手，並挽起陳毅胳膊一起照了相，然後走進了休息室。關切地問陳毅的近況。陳毅回答自己曾在歷史上反對過主席兩次，毛澤東不等陳毅說完，擺了擺手，說：「你就是第三次反對我，我也同你合作!我保你！」。[350]陳毅感動的對毛澤東保證自己是共產黨員，要靠自己的工作，取得群眾的信任而一定能過關的。由此可見毛澤東對陳毅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表現採取了理解和寬容的態度。但是，隨著「文

---

[347]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329。
[348] 袁德金，〈毛澤東與陳毅〉《湖北檔案》，頁 17。
[349] 袁德金，〈毛澤東與陳毅〉《湖北檔案》，頁 18。
[350] 杜易，《大雪壓青松——文革中的陳毅》，頁 91。

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陳毅對林彪（1907-1971）、江青（1914-1991）這一夥人的野心越來越看得清楚了，他對國家和黨的命運憂心如焚，於是他與林彪、江青這一干人進行了抗爭，因此毛澤東對陳毅後來的抗爭再也不能夠寬容了。

到了 9 月底，周恩來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召集了國務院各部、委、辦黨組成員會議，傳達運動已經進行得差不多，不能繼續下去，要轉入抓生產的訊息。可是此時的林彪卻又突然公開宣稱：「鬥爭還在繼續」。[351]言下之意，「文化大革命」運動不能結束，還要繼續開展下去。陳毅對林彪這個人的根底是瞭若指掌的，在 1927 年 8 月 10 日，陳毅接受周恩來委派，到七十三團當團指導員，而林彪當時是是七連連長。紅軍時代林彪的投機行為，陳毅記憶猶新。所以當林彪在 5 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大講特講「政變經」[352]；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又高喊文化大革命是罷官運動，對毛澤東「一句頂我們一萬句」的等等頌揚，[353]對於深知林彪底細的陳毅不免擔心林彪背後居心的不良。10 月 3 日《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了《紅旗》雜志第 13 期社論，打出了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的旗號。首當其衝的，是中共各省市委、各部局黨組的「第一」書記們。中共中央十月工作會議，正是在這個風口上召開的。參加這次會議的許多老同志，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感受，正是毛澤東主席在會上批評的 12 個字「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354]然而，在會上，劉少奇、鄧小平已被中央文革小組定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炮製者，被當作是黑司令部的總頭目來批判了。[355]在這種高壓之下，不承認自己是三反分子，談何容易？！這時陳毅宴請華東的省市委第一書記們，陳毅幾杯黃下肚，開始大吐苦水，他說：

> 困難，我們都見過，要說困難，長征不困難？三年游擊戰爭不困難？建國初期要米沒米，要煤沒煤，頭上飛機炸，下麵不法投機商起哄搗亂，怎麼不困難呢？困難！沒有困難，還要我們這些共產黨幹什麼？我還是那句老話：無

---

351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331。
352 丁凱文《重審林彪罪案》上冊，（香港：明鏡出版社，2004 年）頁 21。
353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 年 5 月 18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354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332。
355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年），頁 31。

論多麼困難，都要堅持原則，堅持鬥爭，不能當牆頭蒿草，那邊風大，就往那邊跑！德國出了馬克思、恩格斯，又出了伯恩施坦。伯恩施坦對馬克思佩服得五體投地，結果呢？馬克思一去世伯恩施坦就當叛徒，反對馬克思主義！俄國出了列寧、史達林，又出了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對史達林比對親生父親還親！結果呢？史達林一死，他就焚屍揚灰，背叛了列寧主義！中國現在又有人把毛主席捧得這樣高。毛主席的威望內外都知道嘛，不需要這樣捧嘛！我看哪，歷史驚人地相似，他不當叛徒，我不姓陳！讓我們幹了最後一杯！我保不住你們了，你們各自回去過關吧。如果過得了關，我們再見；如若過不了關，很可能這是最後一次見面！[356]

陳毅這一番話，表明了自己已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準備揮戈上陣了。

1967 年 1 月 1 日，黨報黨刊發表題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社論，號召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在「總攻擊」的號召之下，從中央到各部門的許多領導幹部被批判和打倒。包括劉少奇、陶鑄（1908-1969）、鄧小平、陳雲（1905-1995）、賀龍（1896-1969）等人都被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取消出席政治局會議的資格。

1967 年 1 月 4 日，陳毅參加完碰頭會，回家已是半夜，突然一聲聲「打倒陶鑄」的口號震顫夜空。陳毅立即打電話詢問李富春（1900-1975）「打倒陶鑄」是否為政治局常委會的決定？李富春告之不是。陳毅悲憤至極，因為陶鑄是位副總理，現任的黨內第四把交椅，又是這樣不經中央集體領導決定，隨隨便便被點名批判，還有什麼黨紀國法！1967 年 1 月 5 日，上海造反派相繼奪取報社和市委大權。9 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文匯報》、《解放日報》上刊載的奪權宣言。12 日，《人民日報》登了中央發給上海造反派的賀電。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輪番接見造反派，集中宣傳「奪權」！對於奪權運動，毛澤東不僅贊成支持，而且把它作為實現其繼續革命理想的一項重要措施。[357]而以「文革」造反派為主的

[356]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332。
[357]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年），頁 41。

「革命委員會」取代了黨和政府的機構組織。一時之間，奪權的黑風掃蕩了中國大地，造反派衝擊學校、衝擊地方黨政機關、進而衝擊軍隊。軍隊院校造反派有中央文革支持，有恃無恐，無所不爲。

而毛澤東對陳毅的表現不能理解和寬容，最明顯之處是陳毅在「二月逆流」中的抗爭。所謂「二月逆流」實際上是陳毅等老帥們對林彪、江青這一夥人倒行逆施的一次公開的反抗。這場史稱「二月逆流」的抗爭，首先是從軍隊開始的。在 1966 年 10 月間在毛澤東的壓力下，林彪不得不起草了〈關於軍事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取消對軍隊院校開展文革的種種限制，毛澤東同意及時發下。[358]從此軍隊院校的造反派也像地方院校一樣蜂擁而起，成立了五花八門的群眾組織，衝擊上級軍事領導機關，進而圍攻國防部大樓，軍隊由此日益捲入文革的狂瀾之中。爲了穩定部隊，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主持召開了中央軍委常委會。陳毅、徐向前（1901-1990）、聶榮臻等老帥看法一致：「軍隊是國家的柱石，無論如何不能亂」。[359]林彪當場也表示贊成。1967 年 1 月初，中央軍委向部隊發出軍隊要堅持正面教育，不能搞大民主，不能成立戰鬥隊，不能搞串聯的指示，但是，僅僅過了幾天，林彪態度突然改變，竟批准中央文革小組提出的「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公開見諸《解放軍報》。林彪此時的態度可說是首鼠兩端，既不想改變緊跟毛澤東的姿態，同中央文革鬧翻，又不願意軍隊大亂，禍及自身，一直躲在幕後避免明確表態。1967 年 1 月 19 日中央軍委在京西賓館召開擴大的常委碰頭會，商討軍隊開展「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問題。會上，幾位老帥與江青（1914-1991）、陳伯達（1904-1989）的意見針鋒相對，互不相讓。陳、江轉而遷怒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蕭華（1916-1985），指責軍隊運動沒有發動起來，總和中央文革唱對臺戲，宣稱「解放軍已經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360]並給蕭華戴上了「資產階級政客」的帽子，責令蕭華當晚到他們已經通知召開的工人體育場十萬人大會上作檢查。對此，葉劍英、聶榮臻兩位老帥提前

358 丁凱文，〈再論 1970 廬山會一及其影響〉，《重審林彪罪案》下冊（香港：明鏡出版社，2004 年），頁 517。
359 范碩，〈周恩來支持葉劍英等進行“二月抗爭”始末〉，《淮陽師院學報》，期 2（1999 年），頁 59。
360 范碩，〈周恩來支持葉劍英等進行“二月抗爭”始末〉，《淮陽師院學報》，頁 59。

退出會場，以示抗議，並立即向毛澤東，周恩來報告此事。周恩來看出這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蕭華一倒，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葉劍英也將難保，軍隊勢必大亂。於是，他立即回話：「沒有我的命令，蕭華不能去大會作檢查。」[361]並和葉一同趕到毛澤東那裏請示匯報，制止了這次大會的召開。[362]但是，還沒等毛保蕭的指示傳達下來，軍內造反派已經聞「風」而動，連夜抄家揪人。蕭華從後門逃脫，跑到西山葉劍英家躲了起來。

第二天，軍委當委碰頭會在京西賓館繼續開會。參加會議的各大軍區負責人知道了毛澤東不同意揪鬥蕭華的態度後，紛紛向中央文革開炮，批駁他們企圖搞亂軍隊的作法，有的還指名道姓地批評了江青。像當時任廣州軍區司令員的黃永勝（1910-1983）就在發言中提出：「希望中央文革多聽毛主席的話，特別是江青同志要多聽毛主席的話。」[363]江青也不甘示弱，繼續在會上糾纏蕭華的問題，不斷追問他昨晚躲到哪裏去了?此時剛剛擔任改組後的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徐向前（1901-1990）被夾在當中，既責問了中央文革搞亂軍隊的作法，也跟著批評了蕭華，過了一會蕭華到場，徐向前問他昨晚去向，蕭華不正面回應，徐向前因而怒拍桌子。在這種情況下，看出江青是在殺雞儆猴，衝著自己而來的葉劍英也拍案而起，爲昨夜收留蕭華一事承擔責任，說：「如果有窩藏之罪，我來擔當！」[364]他嚴辭抨擊中央文革企圖把文革禍水引向軍隊的作法，警告說：「誰要想搞亂軍隊，決不會有好結果！」[365]說話間，按捺不住一肚子怒火，猛拍桌子，傷及右掌骨。與會的軍中高級將領見兩位老帥對拍桌子，誰也不敢說話，有的見情勢不妙，乾脆溜走了。一時會場大亂。會後，葉劍英以軍委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向頂頭上司林彪告了江青、陳伯達的狀，把中央文革一干人對軍隊的指責攻擊全部端給了林彪。這就是所謂「大鬧京西賓館」的來龍去脈。[366]

---

[36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卷，頁 502。
[362] 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林彪秘書回憶錄》（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 年），頁 115
[363]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194-195。
[364] 曉亮、文軍主編，《十大元帥之謎》上冊（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年），頁 100。。
[365]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葉劍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 年），頁 584。
[366] 范碩，〈周恩來支持葉劍英等進行“二月抗爭”始末〉，《淮陽師院學報》，頁 59。

到了 1 月 24 日晚，全軍文革組長徐向前「闖」進林彪住處毛家灣。徐帥把目前軍隊的混亂狀況告訴林彪，主張軍隊必須穩定，要制定幾條規定，例如：不能成立戰鬥組織、不能隨意揪鬥領導幹部、不准奪權等等。在林彪同意下，擬定了一個軍委命令初稿，並請葉帥、聶帥等來共同研究。周恩來對此也表示贊同，積極拉住中央文革進行討論，雖然最後作了一些讓步，但總算通過。[367]又報請毛澤東批示，毛澤東親自找幾位元帥進行研究，最後審定批示照發，林彪也如釋重負。並請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到釣魚台開會，共同研究通過後，送毛澤東主席批。毛澤東提出增加嚴格管教子女的內容，並提議交給住在京西賓館的各大軍區負責人討論，徵求意見。1 月 28 日，毛澤東親自簽發了最後形成的〈軍委八條命令〉，[368]乃迅速發往全軍，對穩定軍隊局勢確實起了很大的作用。[369]

而自從 1 月中旬劉少奇、鄧小平、陶鑄、陳雲、賀龍等被取消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資格後，爲了在非常狀態下能繼續保持一種相當於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形式，以便於處理和決定黨和國家日常工作，周恩來提出了「碰頭會」的辦法。他於 2 月 2 日，致信陳伯達、江青並中央文革小組:一、提議今後每星期一、三、五晚 10 時起在釣魚台開碰頭會，以文革(小組)爲主，我參加，討論形勢和政策及有關檔草案，其他有關同志按問題性質臨時通知參加。二、提議今後每星期二、四、六下午 3 時半在懷仁堂或國務院會議室開碰頭會，以常委四同志(周、陳、康、李)爲主，副總理(陳、李、譚、聶、謝)和劍英參加，務請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參加，分別討論黨政一些業務問題。[370]因此，葉劍英在參加和主持軍委的一系列會議的同時，也經常出席周恩來主持召開的「碰頭會」 (實際是中央政治局碰頭會)。1967 年 2 月 11 日，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召開中央碰頭會。在長方形會議桌中間坐著周恩來，一側坐著國務院副總理和軍委副主席譚震林、李富春、李先念、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通稱三老四帥)等，另一側則坐著

---

[367]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197。
[368] 〈中央軍委八條命令〉，1967 年 1 月 28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369]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葉劍英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 年），頁 585-586。
[370] 范碩，〈周恩來支持葉劍英等進行“二月抗爭”始末〉，《淮陽師院學報》，頁 60。

中央文革成員陳伯達、康生、張春橋（1917-2005）、姚文元（1931-2005）、王力（本名王光賓，1921-1996）、關鋒等。兩軍對峙，陣壘分明。這次會議原擬的中心議題是「抓革命，促生產」，但會議開始，圍繞著「文化大革命」要不要黨的領導，應不應將老幹部統統打倒，要不要穩定軍隊等三個重大原則問題作了全面攤牌，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軍委副主席葉劍英站起來指著康生、陳伯達一夥，氣憤地說:

> 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幹什麼!上海奪權，改名為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國家體制，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又是想幹什麼?[371]

這時坐在葉劍英旁邊的新任軍委文革組長徐向前拍著桌子激憤地說:「軍隊是無產隊政權的支柱，這樣把軍隊亂下去要不要支柱啦。難道我們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這類人指揮軍隊嗎」?[372]

聶榮臻也跟著指責他們把幹部子弟和許多青少年說成是反動保守分子，進行打擊迫害，縱容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鬥他們，有的還被關押起來，這種「不教而誅」的做法是極其錯誤的!絕對不能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鬥孩子，株連家屬。殘酷迫害老幹部，落井下石。接著他又嘲諷陳伯達說什麼不看書，不看報，也不懂什麼是巴黎公社的原則、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之類的話，他可說是火力全開。2 月 16 日，懷仁堂碰頭會繼續進行。原定議題仍是討論國務院各口如何「抓革命，保生產」，但引起更激烈的鬥爭。鬥爭是由陳丕顯（1916-1995）的問題引發的。在會議室的門口，譚震林就拉住張春橋問:「陳丕顯同志來了嗎？」並指責張春橋「打擊一大」。[373] 會議一開始，譚震林再次嚴肅地提出了為何不讓陳巫顯來京問題。張春橋推說，我們回去同群眾商量一下。譚震林說:

---

[371] 范碩，〈周恩來支持葉劍英等進行“二月抗爭”始末〉，《淮陽師院學報》，頁 61。

[372] 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 1966-1976》上冊（北京：華文出版社），頁 172-173；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恩來》，頁 200；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葉劍英傳》，頁 588。

[373] 藝涵，〈譚震林“大鬧懷仁堂”〉，《中國人才》，期 4（1997 年），頁 28。

什麼群眾，老是群眾群眾，還有黨的領導哩!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這是什麼東西?這是形而上學!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把老幹部一個一個打光，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蒯大富，是什麼東西?就是個反革命!這一次，是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當著我的面講的![374]

這時，謝富治插話，爲江青開脫辯解。譚震林說:「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為黨工作不是為她一個人工作！」[375]說罷站起來，拿文件，穿衣服便走，周恩來見譚震林要退出會場，立即叫他回來。陳毅說:「不要走，要跟他們鬥爭！」[376]陳毅自己雖然沒有長篇發言，然而，他一發言卻觸到了 3 個「痛點」：一是史達林；二是赫魯曉夫；三是延安整風中的內部問題。在會議記錄（張春橋、姚文元、王力整理）上可以看到陳毅說：

在延安，劉少奇、彭真（1902-1997）還有薄一波劉瀾濤（1910-1997）安子文（1909-1980）這些人還不是擁護毛澤東思想最起勁！他們（指「造反派」）沒有反對毛主席，他們根本沒見過毛主席！所謂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嗎？歷史不是証明瞭到底誰是反對毛主席的嗎？以後還要看，還會証明。史達林不是把班交給了赫魯雪夫，搞了修正主義嗎？[377]

陳毅決不會不知道：「史達林晚年」的意思或暗示，是毛澤東最忌諱的話題。而現在毛澤東把班交給了誰？誰相當於赫魯曉夫？路人皆知。至於延安整風，運動本身是偉大的；但其中有些問題，頗爲重要和敏感，從來心照不宣。如今陳毅卻哪壺不開偏提哪壺。

葉劍英接著講到黨的傳統提到老幹部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對犯有錯誤的

[374] 張春橋、王力、姚文元整理的〈2 月 16 日懷仁堂會議〉，1967 年 2 月 16 日，轉引自逄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 1949-1976》下冊，頁 1481。
[375] 藝涵，〈譚震林“大鬧懷仁堂”〉，《中國人才》，期 4（1997 年），頁 29。
[376] 吳慶彤，〈三老四帥與二月抗爭〉，《縱橫》，期 11（2002 年），頁 14。
[377] 張春橋、王力、姚文元整理的〈2 月 16 日懷仁堂會議〉，1967 年 2 月 16 日，轉引自逄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 1949-1976》下冊，頁 1481-1482。

幹部，我們黨向來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哪有隨便打倒的道理，照這樣，人身都不能保証，怎麼做工作? [378]周恩來作爲會議主持人，一直沒有制止大家言詞激烈的發言，當他聽到李先念（1909-1992）說到就是從紅旗十三期社論開始，那樣大規模在群眾中進行兩條路線鬥爭時，當即責問康生，是否看過這篇社論以及責問康生爲何如此大的事情，卻不叫他看看!在這篇社論是名爲〈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提出了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的看法，康生明明參與炮製這篇社論，這時卻當面撒謊說他沒有看過。在三個多小時的會議上，周恩來始終支持「三老四帥」當面斥責林彪、江青一夥，痛快淋漓地發泄對「文革」的不滿。[379]

這次會後的當天晚上，陳毅又帶著懷仁堂鬥爭的激情來到中南海西樓會議室，對歸國留學生代表做演講。只見他雙臂撐著桌面，兩眼噴射著悲憤的怒火，發出雷霆般的怒吼:

> 現在有些人，作風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去嘛，不要踩著別人嘛，不要拿別人的鮮血去染紅自己的頂子。中央的事，現在動不動就捅出來，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沖。在把劉少奇的 100 條罪狀貼在王府井，這是洩密！八大的政治報告是政治局通過的嘛,怎麼叫他一個人負責呀? 朱老總今年 81 歲了，歷史上就是「朱毛」,現在說朱老總是軍閥，要打倒，人家不罵共產黨過河拆橋呀? 賀龍是元帥，副總理，怎麼一下成了大土匪?！這不是給毛主席臉上抹黑嗎？這樣一個偉大的黨，只有主席、林彪主席、周總理、伯達、康生、江青是幹淨的，承蒙你們寬大，加上我們 5 位副總理。這樣一個偉大的黨，就只有這 11 個人是乾淨的?!如果只有這 11 個是乾淨的，我陳毅不要這個乾淨!把我揪出去好了!一個共產黨員,到了這個時候還不敢站出來講話，一個銅板也不值!我不是亂放炮，我是經過認真思考的。要我看，路線鬥爭要消除後果要很長時間。現在的文化大革命的後遺症，10 年、20

[378] 范碩，〈周恩來支持葉劍英等進行“二月抗爭”始末〉,《淮陽師院學報》，頁 60。
[379] 范碩，〈周恩來支持葉劍英等進行“二月抗爭”始末〉,《淮陽師院學報》，頁 60。

年不治！[380]

2 月 16 日當晚，會議剛一結束，張春橋、姚文元、王力急忙月到釣魚台去向江青匯報。江青聽了他們幾個人的報告，暴跳如雷的表示這是一場新的路線鬥爭，陳毅、譚震林、徐向前是錯誤路線的代表，葉劍英、李先念、是附和錯誤路線。接著她親自打電話給毛主席辦公室，說張春橋、姚文元有要事報告，請求毛主席連夜接見。毛澤東召見了他們。他們詳細地集中地匯報了老帥們和副總理們的言論。起初毛澤東還輕鬆的笑，覺得老帥們還是「很不理解」。張春橋和姚文元見毛澤東發笑，一時摸不著頭腦，弄不清毛澤東的意思，心裏不免緊張了起來。但是，當他們匯報到陳毅的「黑話」時，毛澤東的臉色突然陰沉了下來，隨即越聽越火，雷霆震怒，說:「難道延安整風也錯了嗎?還要請王明他們回來嗎?」[381]這時，張春橋一夥繃緊的臉才鬆弛了下來。 2 月 18 日上午，江青又帶著王力去林彪處，向林彪匯報了懷仁堂會議的情況和毛澤東的指示。2 月 18 日深夜至 19 日拂曉，毛澤東召來了李富春、陳毅、譚震林、李先念四位副總理和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三位元帥開會。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大發雷霆，對老帥們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會議確定陳毅、譚震林、徐向前「請假檢討」，並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評陳毅、譚震林、徐向前。這一次，毛澤東是真的發火了。我們從他在這次會上說到的「上井岡山」和提及「王明他們」的話語中可以看出這一點。在這之前，毛澤東說「上井岡山」這句話並不是第一次。在 1959 年的廬山會議上批判彭德懷時，他就曾經說過:「看來我只好上井岡山了」。[382]對於王明（1904-1974），毛澤東是比較討厭這個人的。每當到了一次較大的政治鬥爭的關鍵時刻，或當毛澤東內心極度痛苦、情緒極度憤怒時，他就要在政治局或相當一級的幹部中間提及王明「左」傾路線對他的打擊。1959 年的廬山會議中，他幾次講黨內路線鬥爭，重提王明路線的錯誤。他說:「結疙瘩要解開，辦法是談開，傾箱倒櫃而出。整人，目的是要三五七天睡不著覺，不觸及靈魂深處不行。中央蘇區整我，也睡不著覺。」

380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337。
381 袁德金，（毛澤東與陳毅）《湖北檔案》，頁 18。
382 袁德金，（毛澤東與陳毅）《湖北檔案》，頁 20。

[383]可以看出，講出「上井岡山」和「王明他們」的話語，正是毛澤東表達自己憤怒的極端之辭，也是他確實發火的表現。毛澤東的這一舉動更加助長了江青、張春橋一夥的瘋狂。他們立即氣勢洶洶，殺氣騰騰，向陳毅等發起了猖狂的圍攻，企圖置他們於死地。康生用一種兇狠的目光逼視著陳毅，並用拳頭連敲桌面，肆無忌憚地斥吼陳毅身兼兩職，穿針引線，把文武幫都串連起來了，在這次政變的預演中，充當了聯絡員的角色，起了特別惡劣的作用！面對圍攻，陳毅從來都無所畏懼。聽了康生的斥責後，他面無懼色，神情坦然，只以數語嚴肅地回答:「我從來沒搞過反革命串連，更沒有策劃過政變陰謀！」[384]2 月 28 日，毛澤東在陳伯達送去的一個材料上批道:「從上至下都有這種反革命復辟的現象值得注意。」[385]從此，江青、張春橋一夥更加囂張，他們在會上，一次次對陳毅、譚震林等進行了批鬥。康生說誣指他們是十一中全會以來發生的一次最嚴重的反黨事件、是一種政變的預演、一種資本主義復辟的預演！而陳伯達也附和打擊陳毅他們是反對文化大革命，炮打以毛主席爲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是自上而下的復辟資本主義、是顛覆無產階級專政！至此，他們把「懷仁堂二月抗爭」變成了「二月逆流」。3 月，江青、張春橋一夥又在全國範圍內掀起大規模的反擊所謂「二月逆流」的浪潮。4 月下旬，毛澤東在成功地平息了黨內對文革運動的反對聲浪之後，有意鬆動一下與黨內元老派的關係，親自出面找他們談話，表示「團結」的願望，並有意的提到碰頭會上的發言，對運動有意見，是老帥發牢騷，是陽謀，不是陰謀。周恩來來馬上見機而作，擬定了參加五一節慶祝活動的名單，將「大鬧懷仁堂」的幾位主角一一列上，報請毛批准，希望通過這種在天安門城樓上的「亮相」，多少改善一下他們的政治處境。但是在五一節過後，周恩來又擔心這幾位「炮筒子」又因此而「翹尾巴」，再度惹事闖禍，隨即又給陳毅等人寫了一封信。這封信的全文如下：

陳毅、震林、先念、秋裏、谷牧五同志並告富春同志：

---

[383] 袁德金，(毛澤東與陳毅)《湖北檔案》，頁 20。
[384] 易春秋，〈老帥們在“文革初期抗爭”〉，《黨史縱橫》，期 9（2004 年），頁 15。
[385] 范碩，〈周恩來支持葉劍英等進行“二月抗爭”始末〉，《淮陽師院學報》，頁 62。

五一團結，不要又造成你們五位同志錯覺。否認二月逆流，再壓造反派，支持保守派，實行打擊報復，那就又來一個新的反復。你們在人民中，在黨內信用將要失盡。對黨、對革命來說，並沒有什麼了不起。這也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對革命小將們將是深刻的一課。為著預防你們五位同志走入絕路，專此警告，勿謂言之不預。

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386]

周恩來在信中的用語雖然較重，但陳毅，譚震林幾位在經歷了「大鬧懷仁堂」的風波後，領教了毛澤東的翻臉動怒，看到了形勢逆轉後黨內文革派的囂張，都能體會到周在信中的一片苦心，知道禍從口出，處處謹慎多了，不敢再像以前那樣隨便亂放炮了。

第二節　陳毅與外交部風暴

在 1966 年 6、7 月間，全國大亂，中共各級黨委受到嚴重衝擊，一大半單位不是被沖垮就是處於癱瘓狀況。外交部黨委在陳毅的主持下，尙能維持著領導權。機關幹部嚴守工作崗位，保持了外事活動的進行。然而，在中央文革開始煽動學生下，外事口所轄的大專院校學生不斷製造事端，不但衝垮校黨委等單位、哄趕工作組，接著並計劃在北京召開的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上揚言要「揪走資派」。對文革小組幕後唆使學生企圖製造國際事端的陰謀活動，陳毅非常惱怒，在劉少奇主持的中央碰頭會上，他義正辭嚴地發聲抨擊造反派，他認爲既然中央把召集這次亞非作家緊急會議的任務交給他，他就要一肩承擔這個責任，揚言誰要是來衝擊這次大會，就是現行反革命份子。後來在周恩來的佈置下，採取了有效的預

[386]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16。

防措施，終於史亞非作家緊急會議在北京順利地召開。此時陳毅明顯的察覺中國共產黨的航船已偏離航道，他個人無力糾正方向。但是，他必須堅守自己的崗位，保持外事口的穩定。他在外交部全體工作人員大會上，曾經大聲的闡述自己的心境：「只要中央一天不撤我外交部長的職務，我就要頑強地表現自己，並企圖影響這個運動！」[387]

接著，外事口各單位不斷批鬥工作組，陳毅不避責任的一一為工作組承擔攻擊，並苦口婆心的講公道話。鑒於每次談話後，造反派攻擊陳毅的氣勢就越鬧越大，有很多人勸陳毅不要再出面駁斥，陳毅卻相當不以為然，因為他認為遇到問題如果只是逃避不面對、不解決，就不是共產黨員應有的態度。8 月 30 在外交部紅衛兵成立大會上，造反派要強加陳毅當所謂的「紅衛兵司令」。陳毅毅然的反駁說：「我這個人是不搞個人迷信的；學習毛主席著作不要空喊口號！」[388]8 月下旬，陳毅派人趕到外交部幹部宿舍，制止造反派的抄家行動。9 月下旬，國務院總結會上，陳毅匯報了外事口運動的情況，闡明自己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解。他認為「文化大革命」與過去多次的政治運動一般，目的應該是為了弄清楚思想，改革不合理的制度，因此他在外事口展開了自我批判。因此外事口各部門黨組成員，都學習部長的精神，在一定範圍內作了自我批評，最後外事系統各級領導幹部中，沒有一個真正被打倒，經過了群眾運動全部都可以安全過了關。[389]鑒於外事口既發動了群眾，又堅持了黨對運動的領導，與那些黨委被衝垮，作業亂成一團的部門相比，算是能夠維持正常運作。因此外事口的運動獲得國務院的好評。

外交部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熱潮中進入了 1967 年。在毛澤東與周恩來的安排下，陳毅作為對外事口各單位執行資反路線的責任人，於 1 月 24 日在人民大會堂公開自我批評，成為第一個經過檢查通過進而恢復工作的副總理。[390]接著，由上海奪權而起的「一月風暴」席捲全國，「外交部革命造反連聯絡站」，也

---

[387]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328。
[388]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330。
[389] 劉樹發主編，《陳毅年譜》，頁 1166-1167。
[390] 〈周恩來陳伯達在陳毅檢查大會上的講話記錄〉，1967 年 1 月 24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隨著這個風潮進行奪權，也獲得周恩來的支持。此時毛澤東對造反派指導的方針是：「領導運動、監督業務。」[391]而周恩來對「外交部革命造反連聯絡站」的認可，對造反派而言是一種鼓勵，更使得連絡站取得進一步的地位。當時的陳毅在與諸老帥交談中，都有一種決戰逼近的感覺。他們爲了顧全大局，只好一忍再忍，一退再退，可是現在看來已經被逼到只剩最後一塊陣地。老帥們無力改變主導者的決心，但是，他們能選擇誠實的面對自己的良知進而在不同場合站出來講了許多告誡青年人的話。但是，直接面對面地斥責造反派的重要幹部，還沒有人敢輕試。而脾氣率直的陳毅則首先跳了出來。第一個遭到陳毅怒斥的，是外交部已經奪得監督大權的造反派主要幹部，此人在機場向陳毅提出，在迎接外賓的見報名單上，必須把自己的名字排在陳毅後面，放在副外長的前面。陳毅聽了則是一口回絕，他認爲外長後面理所當然應排副外長的名字。此造反派主要幹部進而惱羞成怒，摔門而去。陳毅則憤慨的說：

> 革命 40 年，沒想到會弄成這種模樣，死了也不服氣，拼了老命也要鬥爭，我也要造他們的反！我過去也鬥過人家，人家也鬥過我，不要重複過去的錯誤，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早晨不知道晚上怎麼樣。大是大非問題不能哼哼哈哈，要我順風倒，我不幹！我的講話可能觸犯了一些人，我個人可能慘遭不幸，但是，如果我因此不敢講自己的意見，我這個共產黨員就一錢不值！我知道，只要我講話，就會有人說陳毅又跳出來了。對！快要亡黨亡國了，此時不跳，更待何時！[392]

陳毅還是終於忍不住跳出來放炮了，「三老四帥」在 1967 年 2 月中掀起「二月抗爭」的巨大波瀾，陳毅從此成爲「黑幹將」。從 3 月起反對「二月逆流」的風愈刮愈緊，這對陳毅主政的外交部產生了嚴重的影響。社會上出現了「炮轟陳毅」的大字報，外交部造反聯絡站在會上通過了〈關於炮轟陳毅的聲明〉。4 月中旬，外交部內連續召開「揭發批判陳毅大會」，經過辯論，提出「打倒劉、鄧，炮打

[39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 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年），頁 113。
[392]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337。

陳毅，徹底揭開外交部階級鬥爭的蓋子，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393]的口號。4 月 10 日「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成立」總部成立之初·組織了一系列的批陳活動，並與外事口的一些組織共同主辦了「炮轟陳毅，解放外事口」的大會。他們攻擊陳毅這個人不但是堅持資反路線，而且在外交和內政上有大量的「三反」(反對毛主席、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言行，最後聯絡站核心組代表大聲指控懷疑陳毅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而儘管連絡站拼湊整理種種控訴陳毅的材料，可是陳毅並未被打倒。關鍵其實在毛澤東並不是要真正打倒陳毅，毛澤東曾說過他贊成「打倒陳毅」的口號，但是他也又說：「我對陳毅也沒辦法，就是要紅衛兵給他一點壓力……將來保護陳毅也要靠紅衛兵。」[394] 接著，聯絡站進一步與高等院校聯合籌組「批陳聯絡站」，結果造成了外交部動亂陷入無法控制的局面。此乃由於青年學生的情緒易遭到挑動而陷入激進中，而中央文革又透過學生掀起一陣又一陣的動亂，在社會上橫衝直撞。尤其是當時的北京外語學院（簡稱北外）屬於教育部和外交部雙重領導，北外的造反派從運動一開始就盯著外交部，給陳毅貼過大字報。北外的工作組原來是外交部所派出的，曾嚴厲禁止部分學生要衝擊亞非作家緊急會議。可是工作組被毛澤東批判後，被壓抑的學生因此翻了身，造反的力量來得更大。他們衝撞外交部政治部，搜出黑材料這一系列行動，使得北外造反派更加有恃無恐。他們批評聯絡站造反精神不夠，曾經企圖到外交部奪權。周恩來和陳毅則是支持聯絡站，明確指示聯絡站不要讓學生到外交部奪權，但是造反派還是不甘心。等到反「二月逆流」之風一起，他們積極地參與奪權，打著反對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對毛主席的旗幟，進而把反「二月逆流」演繹成一場保衛毛主席和保衛中央文革的鬥爭。4 月 12 日聯絡站聯合組成「批判陳毅聯絡站」。聯絡站組織計有 800 多人出席成立大會，4 月 17 日，700 多名學生造反派到外交部聲稱要揪陳毅。下午 4 時左右，他們 揪著姬鵬飛（1910-2000）、喬冠華（1913-1983）等副部長要去國務院揪陳毅。4 月 17 日聯

[393]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 31-39。
[394] 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 年），頁 60。

絡站一連的聲明剛發表，當晚中央文革的陳伯達和戚本禹（1931-）在政協禮堂接見批陳聯絡站代表，就外事口文化大革命問題做了如下指示:

1、外事口無產階級革命派要分幾個步驟聯合起來。

2、外交部有關的國家機密不要到街上去貼大字報。

3、國際性活動不要去衝擊·要按照協定進行。

4、外交部長對外活動多，最好不要去妨礙他的對外活動。

5、關於外事、關於陳毅的大字報不要在街上貼，不要給帝、修、蔣幫的情報機構利用。

6、不要到中南海去揪陳毅。

7、要讓陳毅有改正自己觀點的機會。

8、要聽、看、幫。

9、外事工作是總理直接管的、領導的。[395]

這番話雖然是對造反派作了一些約束，但主要是肯定了對陳毅的造反。本來陳毅在 1 月份已經檢查過關，可以分擔周恩來的外事工作。可是現在又對陳毅提出所謂的「聽、看、幫」，要陳毅「改正自己的觀點」。換句話說陳毅得再接受檢查。既要批判陳毅，就要拿出一些材料出來。聯絡站不斷拼湊批判陳毅的材料，他們把炮製材料的重點放在這幾方面:一、所謂分化瓦解部黨委成員司；二、組織人員翻查檔案，企圖找出劉少奇和陳毅反毛澤東思想的案例來；三、在社會上搜羅反陳毅的材料。[396]可是分化瓦解部黨委也不是一件易事。4 月中旬，聯絡站核心組織一系列揭發陳毅的調查會、個別談話。當時外交部中一級的領導成員不是推託不瞭解實際情況，就是強調只負責業務，紛紛回避揭發陳毅。部黨委其他成員和大部分司級幹部並沒有揭發什麼材料，聯絡站也奈何不了他們，憤而指責他們「至今抱成一團」。[397]4 月 21 日下午、聯絡站召開全部「揭發批判以陳毅爲首的部黨

---

[395] 〈陳伯達戚本禹接見批判陳毅聯絡站等組織的談話〉，1967 年 4 月 17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396]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頁 108。

[397] 《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紀》（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 年），頁 50-51，轉引自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頁 109。

委在幹部問題上執行劉鄧資反路線大會」。[398]在大會上點名與會的部黨委成員一個個的上臺去揭發陳毅，稱之爲「幹部亮相」。大多數幹部都顧左右而言它，只有外交部副部長陳家康一人揭發了陳毅在部黨委會上曾說過所謂「乾綱獨斷」四個字。這句話是陳毅針對毛澤東發動文革不滿的抒發，算是一枚重磅炸彈。[399]陳毅因此被連絡站作爲反對文化大革命、反對毛澤東的罪名。

而自從「批劉批陳」開始後，外交部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陷入鬥爭的漩窩，不得安寧。1967 年 5 月 13 日發生一部份北外學生衝撞外交部是一次比較重大的事件。事情發生的癥結在於批陳聯絡站不滿只是召開批判會而已，他們進一步要求陳毅必須親自到會聽取批判。北京外國語學院、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的學生和歸國留學生多次提出同樣的要求，並且不顧周恩來一再禁止他們到外交部串連的禁令，他們反而紛紛要求到外交部來看陳毅的大字報。5 月 11 日上午、聯絡站與批陳聯絡站所屬的 10 個組織聯合發起上街遊行，要揪陳毅到群眾中來接受批判。5 月 12 日淩晨 1 時許，周恩來緊急接見了遊行發起單位，嚴厲批評他們的極端行爲，特別是外交部聯絡站帶頭遊行示威，要把陳毅同志揪走，周恩來表示堅決不能同意，他明確地說:：

> 揪陳毅，中央不同意。「打倒陳毅」的口號不能強加給中央，也不能強加給我。陳毅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外交部長，他還沒有罷官，還在參加外事活動，不能採取揪人的辦法。有錯誤可以批判，但揪人不行。[400]

周恩來不但嚴詞拒絕了把陳毅交給批陳聯絡站的要求，並且表示堅決反對亂扣陳毅「三反分子」的帽子，並告誡造反派不要專抓陳毅的「小辮子」。至於開批陳大會，周恩來推託條件還不成熟，還有待條件成熟時再做安排。可是造反派哪肯罷休，他們與周恩來不斷爭論。周恩來不得已最後與造反派達成幾項協定：一、批陳大會要等安排好了再開;二、先在外交部開小會，然後再到外語學院等單位

---

[398] 《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紀》頁 58，轉引自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頁 109。
[399] 鐵竹偉，《霜重色愈濃——陳毅元帥在文化大革中》（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6 年，頁 32-33。
[40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 1949－1976》，頁 152。

接受批判，大、中、小會再結合。[401]批陳聯絡站接著散佈說周恩來允諾將主持批陳毅的權力交給了遊行發起單位——造反派。這麼一來，引發了學生又一次衝擊外交部的「五一三事件」。[402]原來是外語學院的群眾組織是分成兩大派別的，參加批陳聯絡站的造反團與外交部聯絡站是同一派系；而外語學院的紅旗戰鬥大隊，則是另一派系，他們是運動初期的多數派。在毛澤東批判資反路線後，兩派都紛紛起來造反，中央也承認他們是造反派。但是，兩派群眾組織之間勢均力敵，更是勢不兩立。因此外交部聯絡站與造反團也與紅旗大隊互看對方不順眼，關係也不和睦。紅旗大隊眼看造反團和外交部聯絡站等因遊行而拿到了主持批陳大權，爲了表示不甘示弱，他們於 5 月 13 日淩晨衝進外交部黨委所在處，強行進入主樓，與擔任守衛的軍隊發生糾紛。到了上午，續有紅旗大隊二、三百人闖入大字報保密室，抄保密大字報。外交部工作人員上前勸說無效，反而遭受毆打。嚴重影響到正常外交活動。事件一發生後，外交部立即上報周恩來。周聞訊，幾次打電話並委託回國才兩個星期被稱爲「紅色外交戰士」的姚登山。姚登山此人原來是在印尼擔任中國大使館臨時代辦，他在印尼使館鬧「文革」，波及印尼華僑社會，受到印尼當局的攻擊，他爲了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因而挨了印尼不法之徒的打罵，他奉命撤退回國，一時中國和印尼關係惡化，他成了「紅色外交戰士」，並因此上了天安門接受毛澤東的接見。在照相時他居然站在中間，左手挽著毛澤東，右手挽著林彪。這張像一登報引起很大反響，很多人認爲他太自不量力了，可是大多數造反派、極左分子就把他捧上了天，認爲他受到毛澤東、林彪兩位統帥的重視，是他們造反派的當然領袖。[403]周恩來希望他說服學生撤出外交部，可是學生這時卻也拒不執行姚登山傳達的周恩來的指示。直至 14 日淩晨，副總理兼公安部長謝富治（1909-1972）親自來到外交部，當面批評了紅旗大隊的帶頭人，他們才撤離了外交部。5 月 16 日下午。中共軍隊進駐外交部，聯

---

401 杜易，《大雪壓青松——文革中的陳毅》，頁 152-153。
402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頁 114-115。
403 楊公素，《滄桑九十年：一個外交特使的回憶》（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 年），頁 230。

絡站召開歡迎大會。[404]這次駐軍是加強守衛，防止類似衝撞外交部的事件再次發生。但這也只是暫時性的作用。到了八月份外交部大亂中，一再發生學生衝入外交部的搗亂的事件。

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中的激進份子在喊出「打倒陳毅」口號後，曾試圖把矛頭指向周恩來。他們對周恩來不滿主要反應在周恩來對陳毅的態度上。在「二月逆流」後所出現的「打倒陳毅」的口號風潮，是得到中央文革的認可和支持的。陳毅因爲批評中央文革而獲罪，而中央文革在毛澤東撐腰下，對他是欲除之而後快。可是周恩來對陳毅的態度則完全不同，他雖然表示支持對陳毅進行批判，但也明確反對「打倒陳毅」這種口號的出現，他多次禁止群眾在他面前喊「打倒陳毅」的口號。周恩來和陳毅兩人之間的淵源與友好，本論文在第二章第三節中已有詳細的分析。因此毛澤東發動群眾批判陳毅，周恩來儘管內心痛苦，可是他又不能給群眾潑冷水。因此他要求群眾組織在批判陳毅時必須由他來掌控批判的具體進程。他雖然允許聯絡站查陳毅的檔案，但是批判陳毅的題目要事先報給他，大、中、小批判會的具體時間也由他安排。同時他更加注意保護陳毅的安全、他不斷強調要先批判，然後才能定性的原則。[405]因此造反派愈加的不滿周恩來，進而從五月中下旬開始，許多造反派組織四處張貼大字報、大標語，大造聲勢，在社會上掀起了炮打周恩來的浪潮。他們宣稱：「打周恩來是當前運動的大方向，不僅要揪出中國的赫魯雪夫，而且要揪出中國的柯西金，周恩來是老保，是二月逆流的總根子。」[406]其中外事口鬧得最凶，提出：「當前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已由學校轉移到外事口，要打倒陳毅，就必須動一動周恩來」[407]大有不扳倒周恩來誓不罷休的態勢。而此時周恩來的處境也相當難過。因爲在這年夏天，社會上除了有大打陳毅的巨大浪潮；此外周恩來早年被國民黨特務所製造的「伍豪事件」[408]也跟著餘波蕩漾；而這兩件事的背後，有一股倒周的勢力在暗潮洶湧，呼之欲出。

---

[404] 《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紀》頁 61-63，轉引自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頁 115。
[405]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頁 121。
[406]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24。
[407]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24。
[408]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20-223。

周恩來很清楚，由外事口發起的這股倒陳浪潮其實是沖著他來的，完全是中央文革一干人在幕後挑動的結果，如果他一任江青等人在打倒陳毅的問題上大作文章，很快就會禍及他本人，而他本人的命運則完全是掌握在毛澤東的手裏，朝不保夕，隨時可能會被拋出來，落得和劉少奇一樣的下場。因此周恩來的處境是狼狽之至，身心飽受煎熬。當時，在由清一色的文革派所組成的中央文革碰頭會中，周恩來十分孤立，經常遭受江青集體的圍攻。江青更是對他隨意訓斥、辱罵、奚落，但是無論江青怎樣對他當眾羞辱，周恩來始終咬緊牙關，默默忍了下來，不願逞一時之憤慨進而去刺激江青，讓她找到對他下手的機會。[409]不過，在保陳毅的問題上，周恩來卻竭盡全力，毫不退讓。因爲他深知唇亡齒寒的道理。這些年來，周恩來一直負責主管外交事務，陳毅是他的得力助手。他很清楚，一旦陳毅被打倒，造反派勢必會「順藤摸瓜」，打到他頭上來。毛澤東就曾對他說：「陳毅打倒了，你就差不多了」。[410]因此，此時在這一股「打倒陳毅」的浪頭上，周恩來決不能撒手不管、置身事外。此外，陳毅這個人在黨內的人緣相當不錯，他既無山頭，也未樹敵，他只是生性率直，好發議論，在文革中屢屢放炮，抨擊時政，而他的言論在黨內外群眾中深具影響力。因此令毛澤東十分惱怒，所以有意把陳毅交給造反派，採「打而不倒」、「燒而不焦」的辦法來教訓他一下。[411]在 1966 年 12 月底批判「資反路線」的時候，周恩來就盡力保陳毅過關，曾多次接見外事口和軍隊院校的造反派，苦口婆心地做工作，勸說他們不要揪住陳毅不放，說「陳毅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一肚好心腸，就是有時說話『走火』。你們不能把他一時失言、走火，都弄成『黑話』。」[412]強調把批判矛頭指向陳毅是「搞錯了方向」。[413]在「一月奪權」以後，他更是煞費苦心，再三修改了陳毅的檢查稿，並親自坐鎮主持國務院召開的萬人大會，保陳毅檢討過關。然而，陳毅並沒有因此

---

[409]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34。
[410] 毛澤東同碰頭會成員的談話，1968 年 6 月 3 日。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35。
[411]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35。
[412] 〈周恩來對"軍隊院校部隊文藝工作者紅色造反者揭發控訴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籌備處全體同志的講話〉，1967 年 1 月 4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41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 1949－1976》，頁 107。

安分守己。他本性難改，對文革中種種荒謬、錯誤的現象，他不吐不快，不斷抨擊，因此也不斷惹禍上身。更甚者，陳毅在檢討過關後，在接見造反派時時卻又反悔，說他作檢討是江青等人所逼，非出自於他的本意；然後又在三老四帥「大鬧懷仁堂」時充當主角，翻出歷史舊賬，把文革中的整人與延安整風相提並論，觸到毛澤東的痛處，造成毛在盛怒下，責令陳毅請假檢討，清理思想。[414]儘管陳毅惹出的禍事一件又一件，可是周恩來無論造反派如何軟硬兼施，他都死守住這一條：「你們想打倒陳毅，不能強加於我，在這個問題上，我是不會輕易舉手贊成你們的。」[415]但是，造反派自恃背後有中央文革的支持，根本不理睬周恩來的勸說。他們借反擊「二月逆流」的形勢，對陳毅大加撻伐。七月中下旬，外事口的造反派採取聯合行動，組成「揪陳大軍」，在外交部門前安營紮寨，靜坐示威，聲言若是不把陳毅交給他們批鬥，決下收兵。造反派此舉嚴重妨礙文革期間僅有的一點外交活動。而中央文革一干人蓄意推濤作浪，輪番前往慰問「揪陳火線」上的造反派，稱讚他們在外交部門前安營紮寨，是革命行動，大方向是正確的。公開與周恩來唱反調。到了 8 月初，中央文革直接插手外交部的運動，造成外交部的大亂，而這次大亂的起因根源於兩次講話:第一次是 8 月 4 日關鋒和戚本禹對姚登山的講話，而這次的講話則又引出另一次關鍵性的「王力八七講話」。8 月 4 日，北京召開「首部新聞界、電影界支持香港同胞抗暴鬥爭大會」。中央文革成員關鋒和戚本禹出席了大會，而「紅色戰士」姚登山也出現在大會上。戚本禹向姚登山提出革命小將在外交部門前安營紮寨，是革命行動，更表示今後的希望就寄託在革命小將身上等等之類支持聯絡站造反的話。聯絡站核心組為此而興奮不已。因為中央文革過問外交部運動，表示聯絡站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大有提升他們地位的現象。因此聯絡站的對立面之一的「外交部造反總部」得知姚登山傳達關鋒和戚本禹的講話後，心生忌妒與不滿，遂將整個情況寫信報告中央文革和周恩來。而周恩來本人對總部的信倒是沒有回應，但是中央文革很快就表態了。

[414] 逄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 1949-1976》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年），頁 1483。
[415] 〈周恩來與外交部各組織代表的談話〉，1967 年 5 月 11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在武漢「七・二０事件」[416]被打傷回來，頭上還頂著光環，出足風頭的文革小組成員王力（本名王光賓，1921-1996），在八月七日召見姚登山與外交部造反派代表。聯絡站核心組成員向王力陳述外交部運動的情況，認爲外交部運動阻力很大，幹部不敢站出來亮相、「打倒陳毅」的口號受到批評，整風中有人批評聯絡站奪權過頭，部黨委對抗中央文革。王力不時插話，提出一些看法和意見，很明確地表示了中央文革對外交部文革的意見。[417]大力爲造反派撐腰打氣，贊同「打倒陳毅」而且露骨地批駁了周恩來對外交部運動一再堅持的觀點，並對造反派說：「有人說你們方向、路線錯了，揪陳的大方向當然對。我看沒有什麼過火的地方」、「部黨委的班子沒有動吧?這麼大的革命，班子不動還行！那麼『文明』啊?這是幹革命！」[418]王力大力公開挑動造反派去奪中央的外交大權。第二天王力還給姚登山寫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姚登山同志:

我們接到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八月五日的一封信，並附了你講話的個摘要。這封信和材料，關鋒、成本禹同志和我都看了。我們認為，革命造反總部這封信的精神是不好的，不對頭。戚本禹同志講的幾句話，是正確的。你講的話，也是對的·這些話引起群情激昂，高呼口號，是好事，是革命的景象。這些，為什麼一定要加以反對呢？鬥爭的矛頭究竟要指向誰呢？在要陳毅到群眾中檢查的問題上，總理同文革小組的同志是一致的，企圖從中找什麼裂痕是徒勞的。現將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的信和附件送去。

王力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419]

王力煽動奪取外交部大權，想要批倒陳毅，其實矛頭是直指周恩來的。[420]身處權

416 梅雪，〈武漢“720”事件始末〉，，《黨史天地》，期 6（2003 年），頁 4-9。
417 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年），頁 813。
418 〈王力對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代表姚登山等同志的談話〉，1967 年 8 月 7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419 《中央文革小組王力同志給姚登山同志的一封信》（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 年），轉引自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頁 171。
420 王力，《王力反思錄》，頁 816。

力鬥爭渦流中心的周恩來當然明白這是個危險的政治信號。他後來曾說:「王力，實際上要姚登山當外交部長，有人說他自己想當總理，也許想當副總理，還有比他大的人想當總理。」[421] 因此在那個多事之秋，凡是造反派的「批陳大會」，周恩來都一定出席，爲了保護陳毅的安全，他就這樣一次次地陪著陳毅挨鬥。而周恩來對陳毅的種種保護措施，當然遭到林彪、江青集團的忌恨。故而「王八七講話」一出籠，江青、康生、陳伯達就拍手叫好。8 月 8 日，王力將自己「八七講話」內容分別向江青、陳伯達作了詳細匯報，江、陳均表示支持。「王八七講話」在外事口，有如火上加油般造成野火四燒！8 月 10、 11、 15 三日，造反派在外交部和人民大會堂連續三次舉行陳毅批判會，姬鵬飛、喬冠華也以陪鬥的身份一起挨批。8 月 15 日下午三四點鐘左右，北京人民大會堂的大禮堂成了萬人批判陳毅大會的場所。謝富治和「文革」小組成員坐在大會主席臺上，此外還有一批造反派幹部也列坐其次。周恩來當時出於安全的考量，用心良苦的在大禮堂一樓的前幾排位置特意安排了數十名徒手的 8341 警衛部隊成員就座，以防意外。但是周恩來前腳才剛走，造反派就違背事先與周恩來達成不得張掛或呼喊「打倒陳毅」之類的標語、口號的協議。突然間，「打倒三反分子陳毅」、「打倒二月逆流黑幹將陳毅」等大標語一下子從會場二、三層樓同時垂掛下來。造反派受此刺激，再也坐不住了，他們站起來狂呼「打倒陳毅」!忠於職守的 8341 部隊警衛趕緊挺身而出要保護陳毅，無奈寡不敵眾，造反派仗著人多勢眾，衝上了主席臺，揪住陳毅，甚至把陳毅的眼鏡也打落了下來。周恩來聞訊後怒不可遏，立刻來到一片混亂的會場。他與主席臺上的造反派幹部嚴正交涉，企圖說服他們遵守協議，但一切無濟於事。周恩來氣得當場心絞痛發作，斷然宣佈散會並厲聲斥責謝富治:「搞臭了陳毅同志誰來當外交部長?你來當外交部長？」[422]

到了 8 月 19 日外交部造反派不顧周恩來一次又次地嚴厲批評與警告，砸爛了外交部政治部，「查封」了外交部大印，悍然宣佈「奪取」部黨委領導權。緊

---

[421] 宗道一，〈王力“八七”講話與外交部“奪權”鬧劇〉，《文史精華》，期 11（1998 年），頁 55。
[422] 宗道一，（文革中的陳毅與周恩來〉，《文史精華》，期 12（2001 年），頁 36。

接著，造反派又強行封閉所有副部長辦公室，姬鵬飛、喬冠華等人被關進外交部地下室寫「檢討」。造反派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業務監督小組」的名義行使部長職權，簽發來往電報。在造反派奪權後，外交部發往駐各國使領館的電報中竟出現「打倒劉(少奇)、鄧(小平)、陳(毅)」的口號。整個外交部上下頓時陷入一片混亂，外交業務癱瘓停頓。一向由毛澤東、周恩來執握的外交大權完全落入造反派手中!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 18 年來從沒有發生過的嚴重事件。[423]

更甚者，在八月二十七日淩晨，周恩來在已經十八個小時連續軸轉而不得喘息的情況下，又要強打精神接見外事口的造反派，談批陳問題。造反派不聽勸阻，執意堅持要按照他們所開的條件批鬥陳毅，否則就要攔截陳毅的汽車，組織群眾衝擊會場。對此，周恩來已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他憤然的表示：「你們誰要攔截陳毅同志的汽車，我馬上挺身而出!你們誰要衝擊會場，我就站在人民大會堂門口，讓你們從我身上踏過去!」[424]這天，由於連日勞累和過於激憤，周恩來的心臟病發作，終於病倒下來。

周恩來爲了保護陳毅陷入了苦戰，然而周恩來一向是深諳政治上的攻守之道，他在苦苦等待一個適合出手反擊的時機。而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於出現了一個讓周恩來出手反擊的機會。那就是「中央文革」干預了外交，引起了嚴重的外交交涉。在王力的「八七講話」使得原本已經開始失控的外交亂局益發不可收拾。自「一月奪權」以來，外交領域受到嚴重的衝擊，中國的外交活動幾近癱瘓，自陳毅以下的外交部副部長、司長，大使難逃被批鬥的厄運，而中國的外交政策也變得更左，把國內搞的一套搬到國外去，宣傳文革，散發毛語錄，鼓動當地人起來革命，造成中國對外關係的全面緊張。在短短的幾個月時間裏，就同緬甸，印度、印尼等十幾個亞、非、歐國家發生了外交糾紛，有的甚至被迫中斷兩國的外交關係。[425]8 月 22 日，由北京外語學院、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機床廠等 10 餘所大專院校及其他單位造反派組織在 7 月聯合成立的「首都

[423] 宗道一，〈文革中的陳毅與周恩來〉，《文史精華》，頁 36。
[424] 宗道一，〈文革中的陳毅與周恩來〉，《文史精華》，頁 37。
[425]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頁 132-163。

無產階級革命派反帝反修聯絡站」在英國駐華代辦處門口舉行萬人聲討大會。周恩來得到報告，緊急召見造反派負責人，制止他們的行爲。雙方一直爭執到深夜。直到周恩來得到造反派負責人保証不進人英國代辦處的允諾下他才離去。可是到了 22 時 40 分，在中國外交部「最後通牒」照會規定的時間一過，圍攻英國代辦處的數千群眾卻強行衝進代辦處，失去理智的群眾在東、西兩院同時放火焚燒辦公樓和汽車。造成了中共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涉外事件「火燒英國代辦處」[426]。沒想到在中國國內這樣一鬧，在英國倫敦的中國代辦處便遭了殃。英國人瘋狂地報復中國外交官，結果，雙方發生激烈衝突。而獲悉英國駐華代辦處被燒後的周恩來震怒了!此時此刻，面對這種目無中央、極端無政府主義的行徑，周恩來已經無法再座視不管了。23 日淩晨 3 時，英國駐華代辦處的沖天大火才剛被撲滅，周恩來就在人民大會堂緊急召集外事口各造反派組織代表，周恩來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向他們宣佈了以下幾條:

一、外交部「奪權」是非法的，不算數的。黨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國防、財政等大權在中央，不能奪，你們在外交部「奪權」，是目無黨中央、國務院。

二、「打倒劉、鄧、陳」的口號是錯誤的，以「外交部業務監督小組」的名義向駐外機構散佈這個口號更是錯上加錯。

三、封副部長們的辦公室，隨意點名、發「勒令」，造成數日外交工作失控，甚至「斬而不奏」，這是頭腦發熱，目無中央。如果再不向你們指出這一點，我們就要犯罪了!

四、火燒英國代辦處一事說明現已不能控制局面這是典型的無政府主義。對外關係中的任何重大步驟，如提抗議、發警告等，都是應由政府決定的行動，不能由群眾說了算;火燒英國代辦處，就使我們在外交上輸了理。

五、你們其中有人「炮打」我，搞我的材料，我不怕「打倒」!盡管現在批評你們，對於這些天外交工作上的失誤，還需要由中央來負責。這個責任，我

---

[426] 宗道一，〈1967 年夏季中國外交部的奪權鬧劇（二）〉，《黨史博覽》，期 8（1990 年），頁 43 。

是不會推的，要報告主席，我們犯了錯誤，沒有領導好……。[427]

接著，周恩來終於要展開反擊了！8 月 25 日淩晨，參加完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的周恩來，單獨約見剛從上海毛澤東下榻處回到北京的楊成武（1914-2004）代總參謀長。他向楊成武講述各省的亂象、「王力八七講話」煽動造反派奪外交部的權、火燒英國代辦處等一系列事件的看法後，他心急如焚地對楊成武說:「這樣下去怎麼得了?我擔心的是連鎖反應。現在，一個是中央的領導不能動搖，一個是解放軍的威信不能動搖!……外交部王力八七講話，你交給主席就行，只談情況，你不要評論，不要露任何個人看法，就客觀地如實地反映情況，一定不要加任何評論、叫主席自己決斷。」[428] 8 月 25 日上午 9 時，楊成武飛往上海，如實的向毛澤東做了彙報並將文件交給毛澤東。第二天，8 月 26 日上午，毛澤東召見楊成武，對他說:

王力這篇講話極壞。現在叫王八七，膨脹起來了，會寫幾篇文章，膨脹起來了。要消腫。王的錯誤極大。我的看法:此人書生氣大些、會寫幾篇文，章、不大懂政治。王的破壞性大些。關鋒聽王力的話。王力的興趣不是什麼部長、副總理。這個人愛吹。[429]

接著毛澤東又緩緩的說出:「王、關、戚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430]最後，毛澤東還在王力的「八七講話」稿上批了五個字:「大大大毒草」[431] 。

接著、在釣魚臺 16 號樓，周恩來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會上，周恩來宣達了毛澤東的指示。8 月 30 日，王力和關鋒在釣魚台中央文革駐地同時被宣佈隔離審查，後來被關入秦城監獄。戚本禹則在翌年一月，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也做了同樣的處置。[432] 而這時的江青一夥人雖然對周恩來、陳毅恨之入骨，無奈毛澤東已經

[427] 〈周恩來接見造否派代表時的講話紀錄〉，1967 年 8 月 23 日，轉引自金沖及，《周恩來傳 1949~1976》，下冊，頁 966。

[428] 權延赤，《微行——楊成武在 1967》（廣州：廣東旅遊出版社，1997 年），頁 179。

[429] 權延赤，《微行——楊成武在 1967》，頁 180-190。

[430] 逄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 1949-1976》下冊，頁 1503。

[431] 宗道一，〈1967 年夏季中國外交部的奪權鬧劇（三）〉，《黨史博覽》，期 9（1990 年），頁 13。

[43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 1949－1976》，頁 152；張子申，《楊成武將軍訪談錄》（北京：中國文聯出

下達了指示，陳伯達不得不宣佈:「外事大權歸中央，由周恩來負責。」[433]就在王力、關鋒兩顆毒瘤被摘除的第二天，周恩來再次召見外交部造反派和部黨組成員，姚登山也到會參加。周恩來重申:「外交大權屬於中央，中央授權給我，別人不能說，我管。」[434]周恩來嚴厲批評姚登山散佈「打倒劉、鄧、陳」的口號，以及故意對抗中央的態度!而那時候的姚登山尚不知王力已經進了秦城監獄！幾天後，姚登山也被隔離審查。[435]周恩來開始著手全面解決外交部的問題。他徹底肅清兩個多月來極左思潮在外事口的影響，並對外交部「奪權」鬧劇、「打倒劉、鄧、陳」口號、「火燒英國代辦處」等極端行動、進行組織上的清查。於是，整個外交大權重新回到黨中央、國務院手裏。

第三節　　陳毅與國際形勢座談會

自從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以後，陳毅的外交生涯就彷佛宣告終結。除了受批之外，根本無事可做。周恩來深知陳毅及其他受批判老帥的痛苦，經過周密思考，向毛澤東提出讓幾位老帥到工廠「蹲點」，做些調查研究。關於「蹲點」地點選擇，周恩來反覆的比較，因爲這些單位必須是自己能力所及，要有把握保護這些老帥生命的安全，又要不讓大權在握的中央文革小組找藉口再做文章迫害老帥們。最後，他選定了 6 廠 2 校，並且把 6 廠 2 校支左的中央警衛團領導幹部找來，一一親自交待，必須絕對保証這批老帥的安全。因此陳毅從 1969 年 2 月初起，到北京市郊南口機車車輛修理廠開始「蹲點」，他住在工廠，參加工廠的勞動和班組會，每週給中央以及毛澤東寫一份調查報告，他工作十分認真。3 月起，毛澤東指示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 4 位老帥每星期召開一次「國際形勢座談會」，周恩來要陳毅負責主持，對目前國際形勢問題，發表見解。此時

版公司，1995 年），頁 43-45。

433 宗道一，〈1967 年夏季中國外交部的奪權鬧劇（三）〉，《黨史博覽》，頁 13。

434 宗道一，〈1967 年夏季中國外交部的奪權鬧劇（三）〉，《黨史博覽》，頁 13。

435 宗道一，〈1967 年夏季中國外交部的奪權鬧劇（三）〉，《黨史博覽》，頁 13。

處在 60 年代時空背景的中共國際外交環境，恐有進一步惡化之虞 。在 1969 年 1 月 20 日，尼克森（**Richard Milhous Nixon**，1913-1994）就任美國總統時，中美關係不但毫無進展，並且由於美國介入越戰的層面不斷擴大，美國的飛機、軍艦不時侵入中國的領土。尼克森於 3 月 14 日的記者招待會上說:「中國共產黨對我國人民的威脅以及一次意外進攻的危險是不能忽視的。」[436]爲此，他決定建立反彈道導彈系統，以對付中共的潛在威脅。與此同時，中蘇關係也更加惡化。重要指標之一就是在 1969 年 3 月 2 日蘇聯邊防軍入侵中國的領土珍寶島，造成中共邊防軍死傷的「珍寶島事件」。[437]珍寶島事件進一步激發中蘇緊張局勢。3 月 22 日，毛澤東曾發自內心地說：「我們現在孤立了，沒有人理我們了」。[438]不難想像，這就是他後來所說：「兩霸我們總要爭取一霸，不能兩面作戰」、「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可以利用矛盾，這就是我們的政策」[439]的一個導語。而此時由於中共國內如火如荼的在進行「文化大革命」，整個中國正處在一片混亂之中；顯然，分析戰爭的可能性和採取可行的對策來保衛國家安全，已成爲十分急迫的任務。在此背景下，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於 4 月 1 日至 24 日在北京舉行。在「九大」的政治報告中，對國際形勢嚴峻的分析，使毛澤東一方面必須慎重思考世界性戰爭以及可能針對中國的侵略戰爭的問題;另一方面則是如何適時的調整中國的對外政策，使之更加現實化。其實，與此同時，中國的外交決策還有一個系統在參與運作，那就是以林彪（1907-1971）爲首，黃永勝（1910-1983）、吳法憲（1915-2004）、李作鵬（1914- ）、邱會作（1914-2002）等人爲主的「軍委辦事組」。可是在 1969 年 2 月 19 日，毛澤東召開會議，在會中，他要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人研究國際形勢。毛澤東認爲四位老帥與林彪集團相來比較，老帥們更熟諳外交與國際事務，因此他們的國際觀點會更穩健，更成熟。所以，毛澤東決定又重新起用四位老帥參與大政決策，其實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的。

也因此從 1969 年 3 月 1 日起至 10 月 18 日，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步入紫光閣武成殿。從這天起，老帥們一共座談了 23 次，給中共中央送上了

---

[436] 尼克森，《尼克森回憶錄》，中冊（香港：商務印書館，1978 年），頁 13。
[437] 張強，〈60 年代中國外交戰略演變與調整的緣起〉，《黨史研究與教學》期 5（2001 年），頁 43。
[438] 王永欽:〈1969 年—中美關系的轉折點〉《黨的文獻》，期 6（1995 年），頁 118。
[439] 裴堅章，《毛澤東外交思想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 年），頁 181 一 192。

數次報告。[440]當時,陳毅雖然已被剝奪了參與外事工作的權利,但他還是堅持每天閱讀大量的內部參考資料,到南口廠蹲點時，也隨身帶著參考資料去抽空閱讀。因此,他對國際形勢的發展瞭若指掌。開座談會時,通常是陳毅發言的次數最多。4 位老帥的座談會在黨的「九大」召開前,總共開了 4 次。九大召開前夕,陳毅綜合了大家的意見,寫了一份書面匯報,就當前國際形勢中錯綜複雜的矛盾和發展動向提出看法,報送毛澤東。在 1969 年 4 月,根據毛澤東的意見, 自 1967 年所謂「二月逆流」以來一直靠邊站的四位老帥，均被選爲中共九屆中央委員;而九屆一中全會上,葉劍英又被選爲政治局委員。[441]在「九大」會後,毛澤東仍要 4 位老帥分別去 4 工廠蹲點外,同時注意研究國際形勢,由陳毅負責提出書面意見。當時 4 位老帥不理解的是，毛澤東審定的九大政治報告才剛剛發表過,其中對國際形勢已作了詳細闡述,爲什麼還要他們研究呢?如果依照之前的書面報告照抄照搬,能算是研究嗎？如果想提出某些不同看法,那又談何容易?即使真如此,也擔心會不會被認爲是同與「九大」政治報告唱反調?

周恩來他非常重視老帥們對戰略問題的研究,而且他也希望藉著這次研究能讓在「二月逆流」中闖禍的四人，有將功贖罪的機會。他對 4 位老帥說明毛澤東之所以要他們研究當前的國際形勢,是因爲國際形勢的主觀認識要符合客觀世界,當客觀世界變了,主觀認識也要隨之發展變化。[442]最後周恩來還根據陳毅的要求,指派了原駐英代辦熊向暉和外交部歐美司司長姚廣作爲助手,參與討論和幫助作紀錄。[443]

因此在 1969 年 6 月 7 日,陳毅主持召開了九大以後的第一次形勢座談會。他在開場白時說了以下的話:

> 主席、總理要我們議議國際形勢, 讓我牽頭，總理要我們每月討論二三次, 時間一般定在每週六下午, 討論半天, 開會時間由我來通知。平時各自抽空看材料, 開會時交換意見，要看的材料很多, 但有價值的不多, 一些單位的調研報告, 差不多都是上面怎麼說, 跟著怎麼說, 這些二手貨可以不看，要看, 還是

[440] 余萬里，〈通向緩和的道路——1968 1970 年中國對美政策調整的進程〉,《國際論壇》, 期 3（1999 年）頁 47。
[441] 斯夫，〈1969 年四老帥受命研究國際形勢內情〉,《黨史博覽》, 期 9（2003 年）, 頁 32。
[442] 王永欽，〈1966-19765 中美蘇關係紀事〉,《當代中國史研究》, 期 4（1997 年）, 頁 118。
[443] 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2006 年）, 頁 180-181。

要看第一手資料。國際形勢千頭萬緒, 什麼都議也不行, 要抓重點, 抓要害。現在北邊蘇聯磨刀霍霍, 會不會向我們發動大規模進攻?南邊美國虎視眈眈, 會不會把侵略越南的戰火向中國燒?這是關係黨和國家安危的大事, 我們要做出明確回答, 不能模棱兩可, 含糊其辭。總理的指示很重要:第一、腦袋裏不要有框框;第二、要密切注意世界戰略格局的發展變化，一次議不出名堂, 就多議幾次;議有所得, 加以整理, 再請大家覆議。意見比較一致, 上報總理，總理為我們把關，如果總理認為有可取之處, 他會呈送主席參考。討論的過程和內容要保密, 這是總理規定的紀律, 大家都要遵守。[444]

接著，從 6 月 7 日至 9 月 16 日,在陳毅的主持下,老帥們先後開了 16 次「國際形勢座談會」,討論的重點是中、美、蘇三大力量之間的鬥爭問題。4 位老帥通過閱讀大量參考資料和外交部送的有關電報檔,從戰略的角度,認真分析研究當時的國際形勢,在取得一致認識的基礎上,先後寫了兩份有獨特看法和建議的調究報告。在 7 月 11 日送上的第一份報告是〈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在當時由於〈人民日報〉不斷揭露蘇聯軍隊入侵中國領土的訊息時,都更加強調蘇聯與美國的勾結是以反華爲重點，一再宣傳美國與蘇聯企圖聯合日本來反對中國。上述宣傳報導的給人的印象大多是大規模的侵華戰爭已迫在眉睫，無可避免。但是在 4 位老帥在〈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中的報告卻不持這樣看法。他們認爲美、蘇一方面以中國爲敵,另一方面,他們又互相以對方爲敵。尼克森認爲中國只是「潛在的威脅」,而不是現實的威脅。對於美、蘇現實的威脅反而是在它們相互之間。對於其他各國,現實的威脅,更是來自美帝、蘇修。美帝、蘇修互相勾結和互相爭奪,往往在反華的掩護下進行，而且並不因爲它們的互相勾結而使它們的矛盾有所和緩，相反,它們的互相敵對更爲劇烈了，所以在可以預見的時期內,美蘇單獨或聯合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的可能性都不大，原因乃在美國不敢輕易進攻中國的主要是中美之間隔著遼闊的太平洋再加上美國入侵朝鮮、越南兩次戰爭的失敗，加深了美國內外的困境，況且美國戰略重點在西方，而此時美國又陷入南越的泥淖中，使得它在西方的地位大爲減弱，他更不願單獨和中國開打，讓蘇聯作收漁翁之利。至於蘇

[444] 斯夫，〈1969 年四老帥受命研究國際形勢內情〉，頁 32。

聯方面，由於蘇聯把中國當成主要敵人,它對中國安全的威脅比美國大，但若是真要和中國大打出手,蘇聯還是有他的顧慮和困難的。而其中最大顧慮是來自中國、美國都是以蘇修爲敵。蘇聯絕不敢同時進行兩面作戰。[445]

在 9 月 17 日,上呈的第二份報告是〈對目前局勢的看法〉和陳毅個人所寫的對打開中美關係的設想。在 9 月 17 日之前，也就是從 7 月 29 日至 9 月 16 日,4 位老帥對中、美、蘇三國間相繼發生的重大「新情況」,先後進行了 10 次分析研究。在這段此期間,中蘇、中美之間發生了以下幾起重大「新情況」，引起了 4 位老帥的重視：

第一、從 6 月 18 日至 8 月 8 日,中、蘇國境河流第 15 次航行例會，在蘇聯的伯力舉行。雙方就中、蘇國境河流航行的某些問題達成了協議,並簽訂了會議紀要。

第二、蘇軍於 8 月 13 日入侵新疆裕民縣鐵列克提地區,製造了新的流血事件。隨後,蘇聯領導人對中國進行戰爭威脅,公然威脅要對中國進行核子武器攻擊,並揚言轟炸中國核基地,且在中、蘇邊界調集了大批軍隊,進行軍事演習。在此態勢下,中共中央於 8 月 28 日向全黨下達了加強戰備的命令,準備反擊蘇聯的進擊。[446]

第三、在此期間,美國總統尼克森多次發表談話，表示願同中國改善關係。7 月 21 日,美國國務院還對外宣佈,放寬美國旅客購買中國貨物的限制,以及放寬美國公民去中國旅行等限制。

第四、由於蘇聯害怕中美關係出現緩和,可能影響到它在全球的地位。7 月 26 日,蘇聯外交部第一副部長約見中共駐蘇聯代辦，要求舉行中蘇之間的高級會談。[447]9 月 9 日,李先念在河內參加胡志明逝世的追悼會時，柯西金（Aleksey Nikolayevich Kosygin，1904-1980）通過越南向中國方面傳話,希望路過北京時,在機楊會晤周恩來。後來經報毛澤東同意後,於 9 月 11 日上午飛抵北京，周恩來在機場與他展開會談。當時周恩來與柯西金主要談了以下三方面的內容:

> 第一、理論和原則問題的爭論, 不應影響兩國的國家關係，兩國的問題只要心平氣和地處理, 總可以找到解決辦法。

---

[445] 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頁 186-198。

[446] 曲星，〈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中蘇關系惡化的戰略、理論與利益背景〉,《外交學院學報》期 1（2000 年）, 頁 42-45。

[447] 曲星，〈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中蘇關系惡化的戰略、理論與利益背景〉，頁 42-45。

第二、在邊界沖衝突問題上, 中國是被動的，今年發生衝突的地方都是爭議地區，你們、我們要打仗, 我們現在國內的事情還搞不過來, 為什麼要打仗? 我們領土廣大, 足夠我們開發, 我們沒有軍隊駐在國外, 不會侵略別人, 而你們調了很多軍隊到遠東，你們說我們想打核大戰, 我們核武器的水平, 你們清楚。你們說, 你們要用先發制人的手段摧毀我們的核基地, 如果你們這樣做, 我們就宣佈, 這是戰爭, 這是侵略, 我們就要堅決抵抗, 抵抗到底。

第三、中蘇之間的原則爭論不應妨礙兩國關係正常化, 中蘇不應為邊界問題而打仗，中蘇邊界談判應在不受任何威脅的情況下舉行。中蘇雙方先應就維持邊界現狀, 避免武裝衝突, 雙方武裝力量在邊界爭論地區脫離接觸的臨時措施等問題達成協議。此外, 雙方還就重派大使, 恢復兩國政務電話, 擴大貿易及改善通車、通航的問題達成協議。[448]

9 月 13 日,4 位老帥專門討論了周恩來與柯西金談話的內容和中蘇雙方達成的協議，他們一致的認爲周恩來對柯西金的談話實現了毛澤東的戰略和策略。柯西金現在急欲與中國領導人進行會談,其實是想與中國緩和緊張的關係,進而借中國來壓壓美國。果然，美國情報部門急於瞭解柯西金此行在中國的詳細情況。陳毅則預測:「中蘇首腦會談震動全世界，而一旦舉行中美首腦會談, 一定更會震動全世界」。[449]雖然周恩來與柯西金才剛會談完不久，沒想到，中蘇之間戰爭的氣氛又捲土重來，因此有些人就認爲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蘇聯大舉侵略中國前放的煙幕彈。而持這種觀點者的立論在於：一、柯西金、周恩來的談話中，未保証今後不向中國發動核戰爭;二、柯西金返回莫斯科時，蘇聯的主要人物均未出場，只派二流人物到機場迎接，說明柯西金不代表蘇聯政治局的意見;三、外電報道，9 月 10 日蘇聯駐聯合國代表團一位成員對美國一位代表提到：如果中國對蘇聯的敵對態度仍持續下去的話，一場軍事對抗將是無法避免;四、9 月 12 日《人民日報》在一篇名爲〈核訛詐救不了新沙皇的命〉的文章中透露，蘇聯戰略火箭部隊隨時準備行動，將出其不意的對敵人打擊。五、9 月 16 日，倫敦《新聞晚報》揭露：如果中蘇爆發戰爭，全世界只會在戰爭爆發以後才會知曉，並且提到蘇聯可能對新

[448] 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頁 197。
[449]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 年 8 月），頁 346。

疆羅布泊的核試驗基地進行攻擊。[450]由上述種種跡象顯示，中蘇之間可能隨時會爆發戰爭，但是在 9 月 17 日,4 位老帥聯名上報的〈對目前形勢的看法〉中則持相反的看法。4 位老帥指出：國際鬥爭雖然既現實又複雜,但是中心是中、美、蘇三大力量的拉鋸，目前最主要的問題在於蘇聯有無可能進攻中國，而當中蘇之間關係惡化之際，柯西金突然來到北京，其到底有何居心？老帥們提出了以下 4 點深具說服力的看法:

第一、蘇修確有發動侵華戰爭的打算,其戰略目標是同美重新瓜分世界。最近蘇變本加厲地制造反華戰爭輿論,公然對中國進行核威脅,陰謀對中國核設施發動突然襲擊,表明蘇領導集團中的一批冒險分子,想乘中國文化大革命尚未結束,核武器尚在發展,越南戰爭尚未停止時,依靠導彈和原子彈,對中國打一場速戰速決的戰爭,幻想把中國搞垮,消除其心腹大患。

第二、蘇雖有發動侵華戰爭的打算,並且作出了相應的軍事部署,但它下不了政治決心,因對華作戰是有關生死存亡的大問題。它感到並無把握。迄今美國的態度不但未能使它放心,而且成為它最大的戰略顧慮。美絕不願見到蘇聯在中蘇戰爭中取勝,建立資源，成為人力超過美的大帝國,美多次表示要同中國改善關係,這在尼克森訪問亞洲前後達到高潮,蘇深怕中國聯合美對付它。7 月 26 日,尼克森出訪亞洲的第一天,蘇迫不及待地向中國交出其部長會議給中國政府的聲明,充分表現了蘇惶惑不安的心情。它對中、美可能聯合的擔心,增加了它大舉進攻中國的顧慮。

第三、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基於實用主義的需要,試圖改變對中國的戰爭邊緣政策,打出和談旗幟,借此擺脫內外困境,並探詢中國意圖,作為蘇決策的依據。

第四、周總理會見柯西金的消息轟動了全世界,使美、蘇和各國反動派的戰略思想發生混亂。中國堅持打倒美、蘇,柯西金反而親來北京講和,尼克森反而急於同中國對話。在中、美、蘇三大力量的鬥爭中,美對中、蘇,蘇對中，美都要加以運用,謀取它們最大的戰略利益，而對美、蘇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

[450] 斯夫，〈1969 年四老帥受命研究國際形勢內情〉，頁 35。

也包括用談判方式進行鬥爭。原則上堅定, 策略上靈活，蘇要求舉行邊境會談，中國已表示同意;美要求恢復大使級會談，中國也可以選擇有利時機給予答復，這種戰術上的行動, 可以收到戰略上的效果。[451]

在該報告定稿後,陳毅又專門向周恩來提出他對打開中美關係的設想。他這個報告主要是分析柯西金來華的目的以及蘇聯有無可能大舉進攻中國的問題。關於打開中美關係這一議題，由於美國尼克森出於對付蘇聯的戰略考慮,因此急於拉住中國，所以我們要從戰略上利用美、蘇之間的矛盾,進而打開中美關係,並採取因應的措施。陳毅向周恩來提出幾點獨特的看法:

第一、在華沙會談恢復時, 中國主動重新提出舉行中美部長級或更高級的會談, 協商解決中美之間的根本性問題和有關問題，估計美方會樂於接受，如果我們中國不提, 估計美國也會向中國提出類似的建議。如果真的這樣, 中國應該接受。

第二、只要舉行高級會談, 本身就是一個戰略行動，不提先決條件, 並不代表中國在台灣問題上改變立場,台灣問題可以在高級會談中逐步謀求解決, 還可以商談其他帶戰略性的問題, 而這方面不是大使級會談所能做到的。

第三、恢復華沙會談不必使用波蘭提供的場所, 可以在中國大使館裏談, 以利保密。[452]

在陳毅欲將此報告呈送出去前，工作人員擔心造反派再抓陳毅的「辮子」，打他「與資產階級頭目握手言歡」，可是陳毅卻果決的說：「我堅持我的看法，必須盡早恢復中美大使級談判，打開中美關係。這個觀點一定要報告給毛主席！」[453] 而周恩來在收到報告後,立即將報告和建議呈送毛澤東批閱。

後來國際形勢的發展，果然如四帥們預測般，在 1969 年 10 月 10 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季辛吉（Henry Alfred Kissinger，1923-）在會見巴基斯坦空軍元帥時，透露美國將停止兩艘驅逐艦在台灣海峽的例行巡邏，以作為緩和與中共之間關係的示意。此外，在 11 月 19 日，美國續透過羅馬尼亞向中國暗示美

---

[451] 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頁 198-200。
[452] 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頁 200-201。
[453]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340。

國將從台灣撤軍，表示美國的對華政策有重要性的變化。[454]接著，在 1969 年 10 月 20 日,中蘇兩國副外長在北京的談判開始後,美國尼克森總統更不願落人後，急起直追。12 月 3 日,美國駐波蘭大使在華沙文化宮舉行的時裝展覽會上,美國大使向中國譯員表達尼克森總統想要和中國進行重大的具體會談。而毛澤東、周恩來在看了駐波蘭使館的報告後,就參照陳毅的建議,指示雷陽代辦邀請美國大使到中國使館會談。1970 年 1 月 20 日,雷陽代辦與美大使在中國駐波蘭大使館進行了中美華沙談判第 135 次的會談，[455]會談前，周恩來也根據陳毅的建議，指示工作人員加強防止竊聽的工作。美大使在會談中提出,美國政府準備派代表去北京或接受中國政府的代表到華盛頓直接討論一些問題，雷陽也奉命表達,兩國間的會談可以繼續在大使一級進行,也可以在更高一級或通過雙方同意的其他管道來進行。1970 年 2 月 20 日,第 136 次大使級會談在美國駐波蘭大使館舉行，雷陽奉命表達:美國政府如果願意派部長級的代表或總統的特使前往北京，探討中美關係根本原則問題,中國願意接待雙方商定。至於第 137 次會談，原本定於 5 月 20 日將舉行，後來因為美國於 3 月 18 日,策動了柬埔寨右派發動政變,建立右派政權，接著，又在 4 月 30 日,美軍入侵了柬埔寨。5 月 18 日,中國宣佈,鑒於美國悍然侵柬,按原定日期於 5 月 20 日舉行第 137 次中美大使級會談已不適宜再舉行。此後,中美大使華沙會談未再舉行。[456]1970 年 5 月 20 日,毛澤東發表了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聲明。6 月底,美國政府被迫將美軍撤出柬埔寨。1970 年 2 月，尼克森向國會提交對外政策報告書中指出：「不應該繼續孤立擁有七億多人民的中國於國際大家庭之外」。[457] 1970 年 7 月，中國也釋放了善意，將羈押 11 年之久的美國間諜遣回，中國此舉，被尼克森看作是中美之間「外交小舞步」的恢復。而此時，中國更作出了一個重要的決定，邀請寓居瑞士的美國新聞記者斯諾（**Edgar Snow**，1905- 1972）來中國進行訪問。邀請斯諾來中國訪問，一開始就帶著不同尋常色彩，中共中央為此急電催促駐法國大使黃鎮

[454] 陶文釗主編，《中美關係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頁 511-512。
[455] 宮力，《跨越鴻溝——1969-1979 中美關係的演變》(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年)，頁 49-51。
[456] 宮力，《跨越鴻溝——1969-1979 中美關係的演變》，頁 49-51。
[457] 尼克森《尼克森回憶錄》（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 年），頁 229。

（1909-1989）親自登門說服斯諾接受中國方面的邀請。[458]就如斯諾他本人所言：「中國領導人從不公開做無目的的事」[459]他來到中國後，果然受到了特別的接待。在 1970 年中國國慶慶典的天安門城樓上，斯諾成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個在天安門城樓上公開露面的美國人，這是毛澤東要給全世界，特別是美國的一個信號：「中國要和美國和解」[460]接著，尼克森向《時代週刊》記者說:「如果我死前有什麼事情可做的話, 那就是到中國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們去。」[461]到了 10 月下旬，尼克森在歡迎羅馬尼亞總統訪美的宴會上意味深長地說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稱。11 月下旬，尼克森想要派遣特使訪問北京的意願，分別透過巴基斯坦總統和羅馬尼亞部長會議副主席兩人，將訊息帶到了北京。對於美國方面所提派遣高級使節秘密訪華的建議，周恩來表示在美國有誠意解決台灣問題的基礎上，中國方面歡迎總統特使前往北京，他還更進一步表示:如果尼克森總統本人有意願來訪的話，中國也將表示歡迎。12 月 10 日，毛澤東對斯諾說:「尼克森如果想到北京來，你就捎個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開，坐上一架飛機就可以來嘛。談不成也可以，談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麼僵著？如果尼克森願意來，我願意和他談。」[462]一周以後，《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了毛澤東在天安門與斯諾的合影，報紙右上角的「毛主席語錄」欄裏刊登了一句話:「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國人民都是我們的朋友」。[463]儘管，毛澤東此舉在當時並沒有立即收到預想的效果，但這是中國明確地向世界發出了信號:中國已經決定走向通往中美緩和的道路。[464]到了 1971 年 5 月 30 日,周恩來在全國外事會議上專門提到毛澤東在 4 月份期間,批准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是高明的一著棋。周恩來此話一出，在全世界也引起了相當大的震動。果然，一個多月後，經毛澤東同意尼克森派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季辛吉於 7 月 9 至 11 日先行秘密訪華。周恩來和葉劍英先後同他進行了 6 次會談，雙方並於 7 月 16 日同時發表公告,宣佈周恩來代表

---

[458] 宋之光等著，《將軍、外交家、藝術家——黃鎮紀念文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 年），頁 431。
[459] 哈裏什・卡普爾，《覺醒中的巨人》（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7 年）頁 97。
[460] 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頁 215-216。
[461] 尼克森《尼克森回憶錄》頁 230。
[46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 年），頁 584 -586。
[463] 《人民日報》，1970 年 12 月 25 日，版 1。
[464] 余萬裏，〈通向緩和的道路——1968~1970 年中國對美政策調整的進程〉，《國際論壇》，期 3（1999 年）頁 51。

中國政府邀請尼克森總統於 1972 年 5 月以前的適當時間來中國進行訪問，而兩國領導人的會晤,是爲了謀求關係正常化,並就雙方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465]該公告發表後,又一次震撼了全世界,也具體實現了陳毅在 1969 年 9 月 13 日所說的預言:一旦舉行中美首長會談,一定更會震動全世界。由此看來，陳毅對國際局勢判斷的功力令人不得不佩服。而在當時，熊向暉也曾參與了周恩來同季辛吉的會談，在會後他去醫院探望罹患癌症的陳毅,在病榻上的陳毅很高興地對他說：「尼克森為了美國的利益, 居然比我的設想更不合常規, 這倒出乎我意外，……只有毛主席才會下這個決心, 只有主席才敢於打美國這張戰略牌，主席下了這著棋全局都活了。」[466]

其實，陳毅等四老帥奉毛澤東之命所召開的「國際形勢座談會」，早在 1969 年 10 月 17 日就大功告成而悄悄的落幕了。在當天，陳毅接到了請柬而出席了在北京體育館所舉行的表演晚會。表演結束後，在休息室裏周恩來依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宣達在 10 月 20 日之前，在北京的老幹部全部以「戰備疏散」的名義疏散到外地去：朱德去廣東、陳雲去江西、陳毅去開封、聶榮臻去邯鄲、徐向前去石家莊……。徐向前考慮自己身體比陳毅強些，石家莊醫療條件較開封好，向周恩來提出，自己去開封，讓陳毅去石家莊的建議。[467]10 月 18 日上午，陳毅轉達了周恩來的指示，要四帥前往的「戰備疏散」之地，都是戰略要地，四帥到達當地後，繼續在工廠「蹲點」，也分別研究國際形勢，一旦戰爭爆發，應該協助當地首長指揮作戰。陳毅最後留下一句話：「總理已作了周到佈置，並且再三囑咐，一定要帶夫人去，北京的住處保留，至於我們的國際形勢座談到此結束！」[468]

1972 年 2 月 21 日，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在掌聲中，他熱情的伸出雙手與周恩來握手，他這一握代表了中美之間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開始了。[469]但令人惋惜的是，長期關心中美關係發展的陳毅，已沒有機會看到這歷史性的一刻。但是毛澤東根據陳毅等四老帥建議，作出打開中美關係的重大的意義在於：

---

[465] 外交部外交史編輯部,〈打開中美關係的歷史進程〉,《黨的文獻》, 期 3（1991 年）, 頁 81。
[466] 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 頁 205。
[467] 劉樹發主編,《陳毅年譜》, 頁 1215。
[468] 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 頁 204。
[469] 外交部外交史編輯部,〈打開中美關係的歷史進程〉, 頁 81。

它緩和了中國在國家安全問題上所面臨的極度緊張形勢，中國因此擺脫了長期的孤立狀態，使得日後中國的對外政策是建立在世界發展的現實基礎之上的。而實踐証明，由陳毅所負責在 1969 年召開的「國際形勢座談會」對國際形勢的發展與研判是精確無誤的。

第五章　　結論

中共九屆二中全會臨近結束時，陳毅曾向黃永勝提出是否能讓他回去北京檢查身體，但是遭到了拒絕。陳毅妻子張茜見丈夫身體日漸消瘦，腹痛加劇，心中著急，催陳毅連夜給周恩來寫信，請求批准返京治病。周恩來接信後立即復函同意。1970 年 10 月 21 日，陳毅和夫人張茜回到北京。此時，陳毅只有軍委副主席的職務，當天便與解放軍 301 總院聯系。醫院直到 26 日才來了住院通知。因爲黃永勝正在住院，聽說陳毅要來住院，生氣的表達反對立場！醫院負責人便不敢收治陳毅，一直拖到黃永勝出院。住院難，診治更難！陳毅此時已年逾古稀，且近兩個月來體重驟降，這本是患有腫瘤等嚴重疾病的重要徵兆，理應及時組織會診。然而，陳毅住院後，醫院負責人卻交代醫生陳毅主要是治療高血壓和一般身體檢查，反復的向醫護人員「敲警鐘」說陳毅是「二月逆流」黑幹將，要他們在思想上劃清界限！1971 年 1 月 16 日，周恩來接到 301 醫院報告說陳毅闌尾炎亟急性發作，需要立即做切除闌尾的手術。周恩來批准了，並派自己的保健醫生陪張茜一起前往醫院。晚上手術剛開始後幾分鐘，手術室裏突然慌亂起來。原來，腹腔打開後，醫生們才發現陳毅的闌尾是好的，真正的病因，是結腸癌，並已侵及肝臟。醫生所能做的是把已經轉移的部分盡力切除乾淨而已。

1971 年的「五・一」節的夜晚，陳毅最後一次登上天安門城樓，會見毛澤東、周恩來及來賓。而此時的陳毅，癌症已轉移至肺部。他在 9 月份暫時離開 301 醫院，來到了北戴河療養的陳毅和朱德、聶榮臻 3 位元帥渡過他生命中最後一個生日。不久「九・一三」事件發生，[470]在中央召集的老同志座談會上，陳毅帶著病痛兩次作長篇發言，滿腔義憤地將紅軍創建初期林彪的歷史真實面目作了有系統的揭發！經過這次竭盡生命的搏鬥，陳毅躺下來了，從此再沒下過床。1972 年 1 月 6 日深夜，陳毅永遠停止了呼吸和心跳。

---

[470] 霞飛、呂冰，〈林彪爲何倉惶逃出〉，《黨史博采》，期 9（2004 年），頁 32-38；于南.，〈驚心動魄的“九·一三”之夜──毛澤東、周恩來機智處置林彪叛逃事件述實〉，《黨的文獻》，期 4（1994 年）頁 89-92。

由於當時的政治氣氛，陳毅的追悼會只能由中央軍委出面組織，政治局委員不一定要出席，因此參加追悼會的人數事先定爲五百人。關於追悼會的這一規格是按照中央有關檔規定的，而悼詞連頭帶尾也僅 600 字，簡歷還占去一半篇幅。陳毅的追悼會將於 1 月 10 日下午 3 點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就在當日下午 2 點左右，出現了轉機!毛澤東在午休後坐起身，向進來的工作人員說要調車，想要去參加陳毅的追悼會。周恩來聞訊後立即毫不猶豫地採取了一系列應變措施。他首先撥通中央辦公廳的電話，聲音洪亮有力的說:

> 我是周恩來，請馬上通知在京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務必出席陳毅同志追悼會;通知宋慶齡副主席的秘書，通知人大、政協、國防委員會，凡是提出要求參加陳毅同志追悼會的，都能去參加。[471]

就這樣，周恩來依據毛澤東參加陳毅追悼會的「新情況」，迅速作出了提高追悼會規格的決定，並在一個多小時的時間內，迅速完成了大量複雜的工作。等到毛澤東在八寶山下車時，周恩來早已用電話調來報社、電台的記者、攝影師，頃刻之間，鎂光燈閃鑠不停，毛澤東清淚兩行握著張茜的手，緩慢、沉痛的說出: 「我也來悼念陳毅同志，陳毅同志是一個好同志！」又對陳毅的孩子們說: 「要努力奮鬥喲！陳毅為中國革命、世界革命作出貢獻，立了大功勞的，這已經作了結論了嘛！ 」[472]

由於毛澤東的出現，使陳毅的追悼會圓滿結束，在國際、國內產生了巨大的震動，因爲毛澤東此舉，在可行的範圍的最大限度內，爲陳毅恢復了名譽。而周恩來在得知毛澤東突然決定要參加陳毅的追悼會，馬上聯想到毛澤東是有意要爲陳毅恢復名譽，但毛澤東事臨到會前一小時才決定，反映出毛澤東既要維護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又要解放一些老幹部矛盾的心理。他非常瞭解他的心態，機敏果斷的應變安排，終於聽到毛澤東親口說出肯定陳毅的話，這無疑是對自「二月逆流」以來蒙受打壓的陳毅及其他老帥來說，多年的冤屈終於得以昭雪。

---

[471] 王陽，〈從陳毅元帥的追悼會如何正確領會領導意圖〉，《秘書之友》期 10（2003 年），頁 9。
[472]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346。

回顧陳毅的一生，1919 年考取官費留法勤工儉學，1923 年成為正式共產黨員，1927 年由前委書記周恩來任命為第十一軍二十五師第七十三團團指導員，參加南昌起義軍的戰鬥，第一次經歷戰火的考驗。南昌起義部隊失敗的緊要關頭，他挺身而出，協助朱德將剩餘的不足千人的部隊帶到湘南參加起義，並於 1928 年春，上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合。井岡山上，毛澤東是紅四軍黨代表，朱德是軍長。陳毅先任師長，後任軍委書記，也是紅軍最早的創始人之一。當時的重大決策都是毛、朱、陳一起研究，他們三人是最親密的戰友。此後，陳毅擔任過軍政委、軍長和江西軍區總指揮等職。1934 年，紅軍主力長征時，帶傷的陳毅留下來與項英一起領導南方游擊戰爭。1937 年，全面抗戰開始後，陳毅出山，改編南方游擊隊為新四軍，並任一支隊隊長，率部挺進江南抗日前線。1941 年，皖南事變後，他任新四軍代軍長。1943 年，他赴陝北參加整風，又在中央軍委協助工作，並在中共「七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國共內戰開始後，他負責指揮華東戰場，任華東野戰軍（後稱三野）司令員。1948 年夏，他任中原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同劉伯承、鄧小平一起率中原野戰軍參加淮海戰役（國軍稱為徐蚌會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陳毅是上海市首任市長，領導對舊城的改造和經濟恢復工作，如今外灘邊聳立的陳毅塑像，代表了上海人民對這位老市長的懷念。1954 年，陳毅奉調北京，後來到外交部擔任外交部長，曾陪同周恩來出訪亞非十幾個國家。「文革」開始後，陳毅以敢放炮抵制「左」的錯誤聞名全國。他是黨內公認作自我批評最多，否定自己最多的領導人之一，[473]但是，對於自己的革命堅定性，他從來沒有懷疑和否定過。他坦蕩地說：「到底自己是左派還是右派，自己說了不算，造反派說了也不算，還是要歷史來做結論！」[474]後來，即使陳毅在 1967 年 2 月「大鬧懷仁堂」時，說了一些關於「延安整風」觸痛了毛澤東，當眾掀了毛澤東底的話，進而被打為「二月逆流」，從此不斷被打壓，可是陳毅還是不改其大炮的性格，在 1967 年下半年又在造反派「批陳大會」中發表了一篇名為〈我這個

---

[473]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339。
[474] 滌生，〈陳毅發表一篇特殊演講始末〉，《黨史縱橫》，期 8（2006 年），頁 11。

外交部長〉的特殊的演講，他的這個演講是直接批判「文革」錯誤極爲露骨的演講，同時也是一份公開反對「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宣言，揭露了林彪、江青等人的本質。陳毅的演講稿被紅衛兵記下來傳到中央文革，江青認定這是對中央文革的攻擊，是反對「文化大革命」。同時，她也認爲這也是一個「大毒草」，正好可以借此打倒陳毅。於是，江青把陳毅演講記錄稿送給毛澤東。江青以爲毛澤東會和她一樣發怒的，毛澤東一發怒，就會同意打倒陳毅。然而出乎江青的意料，毛澤東看了這份材料後，笑了笑，並沒有表態。反倒是後來在 1968 年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有意讓陳毅當「九大」的代表。陳毅當時即表態說:「我不當九大代表，我受過許多批判，不夠格!」[475]毛澤東聽後說:「我看你當九大代表是夠格的，你可以作為「右」的代表！」[476]不久，康生所擬議的九大中央委員名單中，沒有列入陳毅的名字，毛澤東提出意見要把陳毅列入。[477]而張春橋本想把陳毅排斥在九大代表之外，但毛澤東的意見要不僅是要讓陳毅當九大代表，還要他當中央委員，因此張春橋不得不把陳毅列入九大代表之列。但張春橋猜測毛澤東是開玩笑成分居多。於是，他就利用毛澤東和陳毅開得這句「右的代表」的玩笑話來大做文章。在九大之前，他在上海和南方一些九大代表中製造輿論說:「陳毅是作為右派代表來參加九大的。」[478]這樣，陳毅就戴著這頂「右派代表」的帽子，出席九大。雖然張春橋等人用盡手段惡整陳毅，但是在「九大」上，陳毅仍當選爲中央委員、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同年 3 月至 10 月毛澤東還讓陳毅負責「國際形勢座談會」頗有讓「二月逆流」黑幹將的陳毅戴罪立功的意味。1970 年年 8 月下旬，陳毅到廬山參加黨的九屆二中全會。這次會議的第一項議程就是討論修改憲法問題。在這之前召開的幾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反對設國家主席一職，但林彪爲了鞏固「接班人」的地位，卻拼命要設國家主席，江青等人則想借助毛澤東壓住林彪等人的氣焰。而此時已經脫離政治權力中樞一年多的陳毅

[475] 滌生，〈陳毅發表一篇特殊演講始末〉，《黨史縱橫》，期 8（2006 年），頁 12。
[476] 滌生，〈陳毅發表一篇特殊演講始末〉，《黨史縱橫》，期 8（2006 年），頁 12。
[477]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339。
[478] 徐景賢，〈張春橋“九大”整陳毅的經過〉，《湖北檔案》，期 3（2004 年），頁 18-23。

因不瞭解黨內鬥爭新情況，又被迫表態，陳毅只好作了發言，大意是:

據我所知，毛主席不願當國家主席。如果他改變了初衷，願意當國家主席，我贊成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毛主席是天才，是經過幾十年鍛煉出來的天才，群眾中鍛煉出來的。總之，天才這個解釋，主要是從實踐中經過鍛煉，鍛煉了人的才能。這樣解釋天才是對的，生而知之，天生之才，這是錯誤的，不符合馬列主義，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現在還有人出來否認毛主席天才，這個問題不簡單。[479]

陳毅這個發言被收進華北組 2 號簡報，被「概括」成「陳毅同志發表了擁護陳伯達講話的意見」，最後康生向林彪匯報時總結了四句話：「吳法憲造謠、汪東興點火，陳伯達起哄，陳毅跳出來。」[480]陳毅莫名其妙的被康生到處煞有介事地講成：「廬山這場鬥爭是「二月逆流與八月紅流合流」是所謂的「二陳合流」（陳伯達、陳毅）。」[481]一時間，陳毅被列爲陳伯達的「同謀」，遭受到更加猛烈的圍攻和批判。此時的陳毅萬萬沒想到身體上的病痛尚未治療，精神上又遭受難以言狀的沉重打擊。事後，有人建議陳毅去找毛澤東，徹底澄清事實，陳毅從容地搖搖頭說:「中國有句古話『止謗莫如不言』，有許多事，你越去解釋，越說不清楚。我現在不說，我相信事情最終會大白於天下！」[482]陳毅說完這話沒多久之後，果然應驗了。1971 年發生了震撼政壇的「九．一三」事件，經此劇變，毛澤東在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擊，整日臥床不起，冥思苦想如何挽回「文革」的敗局。因此毛澤東在政治上刻意作出姿態，安撫那些曾因「大鬧懷仁堂」而被打入冷宮的軍方老帥們。從一九七一年秋冬開始，他不斷在小範圍內吹風，爲「二月逆流」正名，把文革中幾位老帥挨整的賬全都算在林彪的頭上，提出：

不要再講「二月逆流」了！它的性質是老帥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大鬧懷仁堂，缺點是有的。你們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講就好了！……

---

[479]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342。

[480]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 年），頁 804。

[481]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342。

[482]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陳毅傳》頁 342。

你們那時為啥不來找我嘛?你們寫寫，我批上幾句嘛![483]

1972 年 1 月，陳毅病逝。在追悼會前，毛澤東在周恩來、葉劍英等黨內軍中的一干老人的陪同下接見了陳毅的家人。談話中，毛澤東表情悲戚，肯定了陳毅的一生，而把陳毅抑鬱而死的責任完全推給林彪，並稱：「我們的老帥，他一個也不要，要是林彪的陰謀搞成了，是要把我們這些老人都搞掉的。」[484]就在毛澤東這樣的心理背景因素之下，1 月 10 日他突然抱病親自參加陳毅追悼會，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僅參加過兩次追悼會中的最後一次。對毛澤東此舉的用心，周恩來自然心知肚明，因此他順水推舟，儘量擴大此事的影響，在政治上盡量爲「二月逆流」老將的平反造勢。隨著哀樂聲傳出，全國同悲，毛澤東也跟著嗚咽，同時人們也看到了糾正「文革」錯誤的曙光。

[483] 〈毛澤東在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的人員時的講話〉，1971 年 11 月 14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484]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367。

參考書目

一、中文參考書目

(一)史料彙編與專書

丁凱文《重審林彪罪案》上、下冊（香港：明鏡出版社，2 004）。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 (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合編,《毛澤東軍事文集》 (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83~1949）》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 1893~1949) 》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 1898~1949)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上卷、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六大以來》，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 年）。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年譜組編，《毛澤東軍事年譜 1927~1958)(南寧市: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

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不盡的思念》（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

毛毛著，《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臺北市:雙大旅遊出版社，2000)。

毛澤東，《毛澤東文集》 (北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1999)。

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年）。

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年譜組編，《毛澤東軍事年譜（1927-1958）》（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

毛澤東，《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共中央文獻研出版社，1994 年）。

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

王朝彬，《三反實錄》 (北京市:員警教育出版社，1992)。

尼克森，《尼克森回憶錄》，中冊（香港：商務印書館，1978）。

田玄編，《元帥交往實錄系列—陳毅》(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石言、吳克斌《陳毅北渡》（北京 : 戰士出版社, 1983）。

安建設編，《周恩來的最後歲月(1966~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

安徽省軍區政治部主編，《新四軍在安徽》（合肥市：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

何長工，《何長工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 年）。

何曉魯，《元帥外交家》（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5）。

何曉魯、鐵竹偉，《從沙場走向十里洋場》（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6）。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

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5)。

宋之光等著，《將軍、外交家、藝術家——黃鎮紀念文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

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2002 年)。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 (臺北市:時報文化，1994)。

李智舜編著，《毛澤東與十大元帥》(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

李智舜編著，《毛澤東與十大將》(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

杜易，《大雪壓青松——文革中的陳毅》（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

林長盛，《解放軍的武器裝備》(香港:明鏡出版社，1996)。

林中斌，(核霸:透視跨世紀中共戰略武力》(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99)。

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 1949~1976)上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2003)。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 1898-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 1949-1976)、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中共機密文件彙編》(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78)。
星火燎原編輯部，《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帥名錄》，第一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
洪學智，《抗美援朝戰爭回憶》(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0)。
科學時報社編，《請歷史記住他們》(廣州市:暨南大學出版社，1999)。
胡繩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 1966-1976》下冊（北京：華文出版社，2002）。
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 1966-1976》上冊（北京：華文出版社，2002）。
計高成，《陳毅在鹽城》（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1）。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中國人民解放軍六十年大事記》(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8)。
哈裏什・卡普爾，《覺醒中的巨人》（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7）。
孫文光，《陳毅文學系年》（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
袁偉主編，《毛澤東軍事活動紀事 1893-1976)(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高文閣，《台灣與大陸風雲四十年》（長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一冊（台北：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暨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出版，1973）。
徐焰，《台海大戰上編：中共觀點》（臺北：風雲時代出版有限公司，1992）。
宮力，《跨越鴻溝——1969-1979 中美關係的演變》(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張子申，《楊成武將軍訪談錄》（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5）。
張日新、李祖榮，《紅軍時期的陳毅》（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1）。
張世明編著，《共和國元帥陳毅》(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林彪秘書回憶錄》（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
曹宏，《第三野戰軍》（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8）。

許滌新，《人民的忠誠戰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冊(臺北:聯經出版社，2004)。

陳明顯，《晚年毛澤東 1953~1976)(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

陳毅，《陳毅軍事文選》（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6）。

陳毅，《陳毅詩詞選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 年）。

陶文釗主編，《中美關係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馮小敏主編，《現代上海研究論叢》（上海市 : 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4）。

楊公素，《滄桑九十年：一個外交特使的回憶》（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

楊尚奎，《陳毅在贛南》（北京：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1978）。

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的關係（1920~1960）》，（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

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一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研究》(臺北市:東大圖書公司，1995)。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陳毅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彭德懷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賀龍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

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當代中國的核工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裴堅章，《毛澤東外交思想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

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2006）。

管文蔚、《陳毅在大江南北》（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1981）。

齊茂吉，《毛澤東和彭德懷、林彪的合作與衝突（1954-1971）》（台北：新新聞出版社，1997）。

劉樹發，《陳毅年譜》上、下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廣日編，《元帥交往實錄系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蔣洪斌，《陳毅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曉亮、文軍主編，《十大元帥之謎》上冊 (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羅英才，《陳毅非常之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4）。

譚震林、粟裕等著，《陳毅》（香港 : 廣角鏡出版社, 1976）。

鐵竹偉，《陳毅元帥的最後歲月》（北京 : 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2002）。

鐵竹偉，《霜重色愈濃——陳毅元帥在文化大革中》（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3）。

權延赤，《微行——楊成武在 1967》（廣州：廣東旅遊出版社，1997）。

（二）期刊

于南，〈驚心動魄的“九一二”之夜━━毛澤東、周恩來機智處置林彪叛逃事件述實〉，《黨的文獻》，期 4（1994 年）頁 89-92。

孔令銅，〈從《含羞草》到《手莫伸》〉，《中國監察》，期 13（2006 年），頁 63。

王永欽，〈“回去後要請毛澤東復職”〉，《湘潮》，期 4（2001 年），頁 29。

王永欽，〈1966-19765 中美蘇關係紀事〉，《當代中國史研究》，期 4（1997 年），頁 118。

王永欽:〈1969 年—中美關系的轉折點〉《黨的文獻》，期 6（1995 年），頁 69。

王陽，〈從陳毅元帥的追悼會如何正確領會領導意圖〉，《秘書之友》期 10（2003 年），頁 9。

王愛東，〈炮擊金門背后的政治、外交斗爭〉，《貴州文史天地》，期 1（1999 年），頁 69。

王翠平，〈周恩來使用過的收音機〉，《文物春秋》，期 6（2005 年），頁 73。

田春德，〈試論對外宣傳工作的戰略地位〉，《長春師院學報》，期 4（1995 年）頁 86。

白羽車，〈陳毅兩次遇險記〉，《文史天地》，期 7（2006 年），頁 13。

石維行，〈毛澤東周恩來與“三反”、“五反〉，《福建黨史月刊》期 2（2002 年），頁 23。

外交部外交史編輯部，〈打開中美關係的歷史進程〉，《黨的文獻》，期 3（1991 年），頁 81。

曲星，〈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中蘇關系惡化的戰略、理論與利益背景〉，《外交學院學報》期 1（2000 年），頁 42-45。

朱經紅，〈陳毅三進上海〉，《黨史天地》，期 3（2001 年），頁 29。

朱寨，〈陳毅市長的藝術風格〉，《文藝研究》期 6（1980 年），頁 32。

余萬裏，〈通向緩和的道路——1968 1970 年中國對美政策調整的進程〉，《國際論壇》，期 3（1999 年）頁 47。

吳慶彤，〈三老四帥與二月抗爭〉，《縱橫》，期 11（2002 年），頁 14。

李大清，（陳毅同志對古田會議的歷史貢獻），《龍岩師專學報》，期 1（2002 年），頁 9。

李元健，（贛南四整），《福建黨史月刊》，期 12（1999 年），頁 13。

李永春、肖志偉，〈蔡和森赴京與湖南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開展〉，《湖南科技大學學報》，期 1（2005 年），頁 38。

李旭，〈高饒反黨聯盟事件後的饒漱石〉，《黨史博覽》，期 11（2004 年），頁 50-54。

李清泉，〈關於第二次日內瓦會議的簡要回顧〉，《江淮文史》，期 4（2001 年），頁 32。

李許念婉初稿、萬賡年校編，〈蔣經國密使李次白到上海與陳毅談和〉，《傳記文學》，期 4（1998 年）頁 60。

李維漢，〈回憶新民學會〉，《回憶與研究》（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 1986 年 4 月）頁 18。

李學明，〈毛澤東說陳毅——天才的統一戰線的執行者.〉，《四川統一戰線》，期 11（1997 年）。

李曉勇，（萬隆會議上的周恩來）《百年潮》，期 2（2005 年），頁 20。

李覺，〈我國第一科原子彈爆炸的要聞〉，《百年潮》期 10（2004 年），頁 23。

沈志華，〈蘇聯對中國研製核子武器的幫助與制約〉，《二十一世紀》，期 28，（2004 年），頁 15。

何春陽，〈炮擊金門的國際較量〉，《文史精華》期 5（1999 年），頁 18。

易春秋，〈老帥們在“文革初期抗爭” 〉，《黨史縱橫》，期 9（2004 年），頁 15。

周蕙、儲文瑞，(陳毅與黃花塘事件）上，《江淮文史》，期 2（1994 年），頁 71-86。
孟慶凌，〈建國初期“一邊倒”外交戰略解析〉，《遼寧教育行政學院學報》．期 11（2006 年），頁 12-15。
孟慶春，（“九月來信“也是周恩來自身對中國革命特徵的正確分析），《理論探討》，期 5（2006 年），頁 157。
宗道一，〈1967 年夏季中國外交部的奪權鬧劇（二）〉，《黨史博覽》，期 8（1990 年），頁 43 。
宗道一，〈1967 年夏季中國外交部的奪權鬧劇（三）〉，《黨史博覽》，頁 13。
宗道一，〈王力“八七”講話與外交部“奪權”鬧劇〉，《文史精華》，期 11（1998 年），頁 55。
金學桂〈陳毅在鹽阜〉，《影劇月報》，期 3（2006 年），頁 39。
姚會元，(陳毅領導上海解放之初的經濟恢復工作)，《當代中國史研究》，期 3(2003 年)，頁 23。
姚會元，〈穩定市場穩定人心——陳毅穩定上海市場的卓絕貢獻〉，《上海師範大學學報》，期 4（2002 年）頁 29
施春生，〈陳毅組織爭奪里昂大學始末〉，《黨史博采》，期 10（2001 年），頁 10-15。
段照明，(三灣改編對當前我軍思想政治工作的啓示)《黨史文苑》，第 2 期（2005 年），頁 37-38。
胡兆才，(陳毅對黨的三次重大貢獻)《龍岩師專學報》，期 1（2002 年），頁 9。
胡兆才，《陳毅對黨的三次重大貢獻〉，《黨史文匯》，期 6（1994 年），頁 16。
胡志剛，〈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由來和發展〉，《黨史文苑》，期 4(2006 年)，頁 59。
胡志剛，〈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由來和發展〉，《黨史文苑》，期 4(2006 年)，頁 59。
胡居成，(從"小淮海"到"大淮海"——淮海戰役中的粟裕大將)，《中國糧食經濟》，期 6（2006 年），頁 46。
胡居成，(陳毅與外國領導人交往二三事)，《黨史陳覽》，頁 18。
范碩，〈周恩來支持葉劍英等進行“二月抗爭”始末〉，《淮陽師院學報》，期 2（1999

年），頁 59。

苗生，〈李次白——台灣首位探訪大陸的謀合信使〉，《文史春秋》，期 6（2001 年），頁 9。

卿臻，〈從“中間地帶”到“三個世界”看毛澤東國際統戰思想的價值取向〉，《廣西經濟管理幹部學院學報》，期 3（2004 年），頁 77-78。

唐天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強大生命力〉《瞭望》，期 24（1994 年），頁 38-42。

唐舒，（陳毅在上海），《人才開發》，期 3（1999 年），頁 4。

殷伯達，（上海市長），《揚州文學》，期 3（2006 年），頁 64。

徐晶晶，（給上海人民的見面禮），《黨史文匯》，期 7（1996 年），頁 38。

徐景賢，〈張春橋“九大”整陳毅的經過〉，《湖北檔案》，期 3（2004 年），頁 18-23。

袁德金，（毛澤東與陳毅），《湖北檔案》，期 3（2004 年），頁 9。

袁鷹，〈陳毅元帥的詩人風範〉，《炎黃春秋》，期 5（2003 年），頁 10–11。

馬於強，（試述井岡山的“八月失敗”及其經驗教訓），《井岡山師範學院學報》，期 1（2004 年），頁 53。

張昆生，〈陳毅的外交智慧〉，《觀察與思考》，期 12（2003 年），頁 19。

張強，〈60 年代中國外交戰略演變與調整的緣起〉，《黨史研究與教學》期 5（2001 年），頁 43。

張輝，〈從“中間地帶”理論到“三個世界”理論論毛澤東的國際統一戰線思想〉，《桂海論叢》，期 3（2004 年），頁 41。

梁志明.，〈亞非人民的國際盛會:背景與成就——亞非會議 50 周年紀念〉，《當代亞太》期 5（2005 年）頁 48。

梅雪，〈武漢“720”事件始末〉，《黨史天地》，期 6（2003 年），頁 4-9。

盛永年，〈風雨至交——毛澤東與陳毅的友誼〉，《黨史縱橫》,期 7（1994 年），頁 4。

陳士榘，（三大紀律、六項注意的由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下），（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年 9 月），頁 198。

陸冰，〈淺談皖南事變發生的必然性〉，《鄭州工學院學報(社科版》，期 1，1996

年，頁 46。

陸庭恩，〈論萬隆會議及其影響〉，《西亞非洲》，期 3（2005 年），頁 14。

焦東華，〈周恩來與柯西金會晤在北京機場〉，《湖北檔案》，期 10（2004 年），頁 40-43。

喻國榮，(中央“九月來信”與紅四軍建設)，《長沙交通學院學報》期 4（1996 年），頁 29-31。

喻國榮，〈中央“九月來信”與紅四軍建設〉，《長沙交通學院學報》,期 4（1996 年）頁 29。

斯夫，〈1969 年四老帥受命研究國際形勢內情〉，《黨史博覽》，期 9（2003 年），頁 32。

程瑾　、朱仁.〈共和國拒絕腐敗——“三反”、“五反”決策內幕〉，《黨史博覽》,期 3（2002 年），頁 18。

馮錫剛，〈詩可以療疾—陳毅詩話〉，《黨史文匯》，期 9（2006 年），頁 27–30。

馮錫剛，〈詩可以療疾—陳毅詩話〉，《黨史文匯》，期 9（2006 年），頁 27–30。

會軍、汪洋，(1950 年：上海拉響空襲警報)，《炎黃春秋》，期 62（1997 年），頁 47。

滌生，〈陳毅發表一篇特殊演講始末〉，《黨史縱橫》，期 8（2006 年），頁 11。

熊宣忠,〈試論"古田會議"的現實指導意義〉，《福建黨史月刊》,期 7（2005 年），頁 72。

趙新燕，〈警鐘長鳴反腐倡廉——“三反”、“五反”給我們的啓示〉，《雁北師范學院學報》，期 1（2003）頁 23-25。

趙學功，(論艾森豪威爾政府在朝鮮戰爭中的核訛詐政策)，《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期 4(1997 年)，頁 46-47。

齊茂吉，〈五 O 年代毛澤東對台灣問題的思考與轉變〉，《兩岸發展史研究》，期 1（2006 年），頁 111。

劉正英、卓愛平，〈元帥外交家〉，《黨史縱覽》，期 7（2002 年）,頁 11。

劉勉玉，〈略述留守中央蘇區紅軍的九路突圍〉，《南昌大學學報》，期 4（1994 年），

頁 75。

劉建飛，〈意識形態對新中國“一邊倒”決策的作用〉，《國際論壇》，期 5（2000 年），頁 42。

劉斌，〈20 世紀 20 年代前後湖南青年在法國的工學實踐〉，《西南交通大學學報》，期 5（2004 年），頁 115–121。
劉斌，〈20 世紀 20 年代前後湖南青年在法國的工學實踐〉，《西南交通大學學報》，期 5（2004 年），頁 115–121。
施春生，〈周恩來反對中法秘密大借款〉，《黨史縱橫》，期 5（2003 年），頁 22-25。

歐陽吉平、石旭光，（項英與陳毅的兩次分歧），《黨史博采》，期 2（2002 年），頁 46。

潘鉱，（青松艇且直——記上海市第一任市長陳毅）《黨史縱覽》，期 4（2001 年），頁 11。

蔡佳禾，〈冷戰與 60 年代南亞新國際格局的形成〉，《黨的文獻》，期 1（1994 年）頁 56。

鄭垣，（革命搖籃井岡山）《中國城市金融》，期 2（2006 年），頁 52。

鄧澤村，〈從“九月來信”對“二月來信”的糾正看黨的品格特性〉，《龍巖師專學報》，期 2（2005 年）頁 39。

蕭思科，〈歷史上的“朱毛之爭”〉，《領導科學》,期 4（2000 年）,頁 42。

謝益顯，〈新中國五十年外交偉業及其啓示〉《外交學院學報》，期 1（2000 年），頁 18。

霞飛、呂冰，〈林彪爲何倉惶逃出〉，《黨史博采》，期 9（2004 年），頁 32-38。

鞠景奇，〈陳毅早期武裝鬥爭思想〉，《鎮江師專學報》，期 2（1994 年），頁 74。

雙驚華，〈1964 年中法建交衝擊波〉，《歷史教學問題》，期 2（2006 年），頁 58。

藝涵，〈譚震林“大鬧懷仁堂”〉，《中國人才》，期 4（1997 年），頁 28。

羅英才，（陳毅在黃花塘事件），《縱橫》，期 3（1999 年），頁 27-33。

二、英文參考書目

Michael J.Mazarr, *Missile Defences and Asia Pacific Security*,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9.

John Wilson Lewis & Xue Litai, *China Builds the Bom,,*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Wladyslaw Wszebór Kulski, *DeCaulle and the World: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Fifth French Republic*,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66.

三、報紙

《解放軍報》，2001 年 9 月 3 日。

《光明日報》，1992 年 5 月 30 日。

《人民日報》，1970 年 12 月 25 日。